

六合叢書

钱边缀琐

王培军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

吕大年 高峰枫

人说朱贪王爱，我耽亚槩欧铅。何必多情秦七，政同语妙坡仙。
白驼山上毒物，碧海波中药师。欲说使君与操，请看鹤骨龙姿。

——读《钱锺书集》

目录

- 《围城》中两个妙喻的来历 1
- 钱锺书小说里的几个典故 5
- 《也是集》的书名及其他 14
- 随手札 26
- 寒食帖考 57
- 庾信愁赋考 59
- 读钱偶笺 64
- 读《管锥编》札记 70
- 读《槐聚诗存》 92
- 钱边缀琐 135
- 钱锺书与钱穆、陈寅恪 180
- 钱锺书与余嘉锡的“撞车” 190
- 钱锺书与吕思勉 201
- 钱锺书与鲁迅 220
- 武王《几铭》“口”非阙文证补 238
- 后记 252

《围城》中两个妙喻的来历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年版）苏轼小传的注七里，引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名言说：“比喻是天才的标识。”（见 Bekker 编校本亚氏全集的第二卷 1459a）钱先生最擅长比喻，所以于亚氏的说法，应是“心有戚戚焉”，而拙于打比方的人，却不见得一定赞同了。

不管怎样，我对钱先生的妙喻络绎，是欢喜赞叹、衷心钦服的。也许可以说，从古至今，擅长用比喻的人里，还没有及得上钱先生的。不过有时候，钱先生的妙喻也有来历，用黄山谷的话说，就是“夺胎换骨”、“以故为新”，并非一律“自作语”。我因近来校读孙原湘的《天真阁集》，读来读去，不免就生起厌倦来，遂去翻看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诗集（*The Complete Poems*），借以作为调剂，意外地在《爱之定义》（*The Definition of Love*）一首诗里，看见下面几行：

别人的爱是斜线，终会以一个角度相交；我们的爱是

平行线，在无穷远处，也不能够遇合。(As lines (so loves)
oblique may well/Themselves in every angle greet: / But ours so
truly parallel,/Though infinite, can never meet.)

我马上想起钱先生在《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二章的开头，说到方鸿渐和苏文纨的关系的那几句：“他们俩虽然十分亲密，方鸿渐自信对她的情谊到此而止，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不错，钱先生的妙喻，一定是从马维尔借来的。马维尔是英国 17 世纪的诗人，在玄学派的诗人里，虽然不及约翰·堂恩(John Donne)有名，却也是有数的人物。钱先生在《谈艺录》(中华书局版)里，曾征引过他一次，只是不是这首《爱之定义》。

钱先生还有一个比喻，是从叔本华(Schopenhauer)脱胎的，我很久前就注意到了，现在就放在一起说。《围城》的第 199—200 页，方鸿渐感慨人之间不易相处：“聚在一起，动不动自己冒犯人，或者人开罪自己，好像一只只刺猬，只好保持着彼此间的距离，要亲密团结，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

Diogenes 版叔氏文集的第十册《附录与补遗》(*Parerga und Paralipomena*)里，有一篇《杂喻》(*Gleichnisse, Parabeln und Fabeln*)说：“在寒冷的冬日，有几只豪猪为了御寒，就互相挤在一处。可是，不久彼此感觉刺痛，于是只好分开了。然

而为求得温暖，它们又再度聚拢，同样的事便又发生。经过多次的反复，它们终于明白：彼此之间，能保持适当的间隔，才能够相互容忍，过得舒适平安。”（Eine Gesellschaft Stachelschweine drängte sich, an einem kalten Wintertage, recht nahe zusammen, um durch die gegenseitige Wärme, sich vor dem Erfrieren zu schützen. Jedoch bald empfanden sie die gegenseitigen Stacheln; welches sie dann wieder von einander entfernte. Wann nun das Bedürfnis der Erwärmung sie wieder näher zusammen brachte, wiederholte sich jenes zweite Uebel; so daß sie zwischen beiden Leiden hin und hergeworfen wurden, bis sie eine mäßige Entfernung von einander herausgefunden hatten, in der sie es am besten aushalten konnten.）

这一譬喻确是深刻的，钱先生一定异常赞赏，所以多年之后，在论《山海经图赞》时，又再次涉笔引及了。钱先生用典雅的文言，译了开头几句：“隆冬之日，豪彘冻欲僵，乃依偎取暖，而彼此相刺痛，乍亲接即急分离。”（见《管锥编》第1239页）其所用的版本，则是德森（Deussen）编本。不过，在钱先生引它之前，1926年，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里，就已引用过了（见新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33页）。钱先生稍稍落了后。我以前写过一篇《钱锺书与鲁迅》，搜了不少的例子，以见二人的共通处。现在的这个例子，应该补上。

在这一节之前，叔氏还论及《伊索寓言》，借小孩子口批评说：“这不是我们该读的书，它太幼稚、太愚蠢了，让我们

相信狐狸、狼和乌鸦会说话，那可没门！”（Das ist kein Buch für uns ! ist viel zu kindisch und zu dumm. Daß Füchse, Wölfe und Raben reden könnten, lassen wir uns nicht mehr aufbinden.）《写在人生边上》里，有一篇《读伊索寓言》，也说：看了这本书，“觉得有好多浅薄的见解，非加以纠正不可”；“它把纯朴的小孩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见解也是相一致的。只是“*Parerga und Paralipomena*”的书名，钱先生译作“哲学小品”（见《一个偏见》），似乎是过于别致了。

（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4月17日）

补订：《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六百三十五则节录叔本华此节（第二册第1236页）。林语堂《增订伊索寓言》第四则“冬天的豪猪”（载《十日谈》1933年第2期，后收入《披荆集》），亦用叔本华此喻。又《谈交友》亦用平行线之喻，见《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钱锺书小说里的几个典故

钱锺书先生的小说，有如前人所说的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只是我辈后学腹笥太俭，多不能知其用事来历，所以于钱先生的匠心独运，在领会上便打了折扣。数年前，有学者专就《围城》一书，考证钱先生小说里的典故，惜乎可喜的创获并不多，对读者的帮助殊为有限。我自己读书寡陋，更无资格饶舌，冒充解人作“郑笺”，不过平日偶有所见，曾随手记诸简端，今摘出聊为谈助，以当“写在钱锺书的边上”，或亦如钱先生妙译所云，“小遗于大海中，当不无小补”。

在《围城》第三章，钱先生写了几次聚会，其中一次，董斜川说旧体诗，极有解颐妙语：“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把地理名词来包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杜甫），王广陵（宋王令）——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梅尧臣）；二谷：李昌谷（李贺），黄山谷（黄庭坚）；四山：李义山（李商隐），王半山（王安石），陈后山（陈师道），元遗山（元好

问)；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陈三立)。”如所周知，董斜川的原型，是钱先生的好友冒效鲁，但是这一段话，不过是钱先生的雅谑，未必真是冒的诗学见解。因为所谓“三陵”、“四山”，亦有来历，既非钱先生杜撰，也与冒氏关系无多。张佩纶《涧于日记》(壬辰上)云：“《随园诗话》载王楼村先生诗学‘三山’，谓香山(白居易)、义山、遗山也。晦若(于式枚)因之改香山为虞山(钱谦益)。余皆不以为是。余亦有‘三山’，则义山(李商隐)、半山、眉山(苏轼)耳。香山与义山太不类，遗山亦不足学，由半山以溯昌黎(韩愈)，由眉山以规李杜，此学诗之津梁，通唐宋之界，而上无晚唐波靡之音，下断西江粗直之派，则亦诗之中流也。”张佩纶所说“三山”，虽本诸袁枚《随园诗话》(见卷九)，但具体之人颇有变更，这自是其诗学不同所致。《谈艺录》(补订本)第80页云：“近人张篔斋(佩纶)笃好荆公(王安石)，至以半山配义山、眉山为‘三山’。”当可为《围城》之笈。后来汪辟疆论诗，又受到张说的影响，更添为“六山”，其《读常见书斋小记·六山》云：“白香山，真挚；王半山，深婉；李义山，缛丽；陈后山，孤往；韩玉山(韩偓)，凄咽；元遗山，精警。予尝谓学诗必寝馈唐宋，自李杜王韩苏黄而外，尚有‘六山’。必精研熟读，方足以博其趣而抉其微者，即此‘六山’是也。”(《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钱先生所举的“四山”，没有超出汪说范围。据此，我似可来个“大胆判断”：董斜川虽主要用以影冒，可也夹有汪辟疆的口吻。钱先生在《石语》里，就曾提到过汪，说彼此见

过面、有过交谈。当然，汪辟疆诗学属于同光派，是亦步亦趋追随陈三立的，不过其于唐宋诗之间，也还未此疆彼界，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是应该提醒的。而所谓的“三陵”之说，则始发于胡汉民，见其《不匮室诗钞》卷五《答大厂见谢言诗之作叠恻韵》（友人吴念庵先生告，参见刘衍文先生《寄庐茶座》第248—249页）。又，近人屈向邦《粤东诗话》卷一亦载胡说，可见其影响）。在那几句妙论之前，董斜川还说道：“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年来，算他最高。”这也不是董的臆造，而是那时候老派人的公认。如张慧剑《辰子说林》即云：“故诗人陈散原先生，为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口气之间，何其相似乃尔。汪辟疆《展庵醉后论诗》云：“散原能生，能造境。能生故无陈腐诗，能造境故无犹人语。凿开鸿蒙，手洗日月，杜陵而后，仅有散原。”（《读常见书斋小记》）推挹程度更过于董。至所谓“陵谷山原”各家，大都是晚清诗人“挂在口边”的，其中只有“二谷”之昌谷，在老派诗人那里，不算得怎么时髦，也许是钱先生自己喜欢，顺手拉来凑个数的。

大家在等苏文纨来时，董斜川“要了一枝秃笔”，埋头写自己的得意佳句，其中如“好赋归来看妇靛，大惭名字止儿啼”，是本冒效鲁的《还家作》：“妇靛犹堪看，儿啼那忍嗔。”（《叔子诗稿》）有人早为之溯源，但不免有所误解，把董自赞的“上句梅圣俞，下句杨大眼”，照搬过来赞冒诗了。其实冒诗下句，虽是同样说到“儿啼”，但同“杨大眼”不相干，所谓“杨大眼”，典出《魏书·杨大眼传》（略云：“传言淮泗、荆沔之间，有童

儿啼者，恐之云‘杨大眼至’，无不即止”），意不过“李逵姓名止小孩啼哭”。又如“不须上溯康乾世，回首同光已惘然”两句，则本诸陈宝琛《沧趣楼诗集》卷六《瑞臣属题罗两峰上元夜饮图》：“不须远溯乾嘉盛，说著同光已惘然。”这也已为人指出（见刘永翔先生《沧趣楼诗集·前言》），不必再提。但是下面这两句：“数子提携寻旧迹，哀芦苦竹照凄悲。”似尚未见有人提及。方鸿渐“没有读过《散原精舍诗》”，感到不解，心想：“‘数子’明明指朋友，朋友并非小孩子，怎可以‘提携’？”“数子提携”云云，照我的个人揣测，应该是蕴藏了散原诗本事的，即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所云：“立秋后一日，陈士可毅招同樊山、笏卿、子封、实甫、君立、鸿甫、治菴，燕集宣南畿辅先哲祠。实甫言伯严（陈三立）在武昌，重九日张文襄（张之洞）招同登高，伯严有诗，末二句云：‘作健逢辰领元老，夕阳城郭万鸦沈。’‘元老’自指文襄，文襄批驳‘领’字，谓何以反见领于伯严也。余言伯严早以此事告余，笑文襄说诗之固，‘领元老’岂吾领之哉。”此事，为当日诗坛一大公案，如樊增祥《广雅堂诗跋》（《樊樊山集》）、由雲龙《定庵诗话》卷上、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皆载其事首尾，言之津津。后来吴宗慈撰《陈三立传略》，钱先生为之编订诗集的胡先骕，犹且抵书与之讨论，云：“（散原）先生诗句云：‘作健逢辰领元老。’以南皮之元老，而先生竟泰然领之，其胸中浩然之气可想。”（《国史馆馆刊》创刊号）仍蹈张之洞之误而不知。钱先生小说带及这个轶事，用意是开散原诗的玩笑，因为，散原老人

的诗，虽被董斜川称为“五六百年来第一”，但钱先生于其诗，却是不很喜欢，批评说“以艰涩自文饰”（《容安馆札记》）。陈诗的题目为《九日从抱冰宫保至洪山宝通寺钱送梁节庵兵备》，见《散原精舍诗》卷下，末句作“下窥城郭万鸦沉”，当是最后的定稿。而董斜川诗的另外两句：“秋气苏身一雁过，鬓丝摇影万鸦窥。”似乎就摇曳着陈诗的影子。

董斜川所提到的樊樊山（增祥），也是光宣诗坛的一大家，董说了他的一个笑话是：“光绪初年做京官的时候，有人从外国回来，送给他一罐咖啡，他以为是鼻烟，把鼻孔里的皮都擦破了。他集子里有首诗讲这件事。”这件事确非子虚乌有，不过时间有些不对，并非所谓的“光绪初年”，而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送者也不是“从外国回来”，而是樊山的老朋友袁爽秋，即那位因强谏被慈禧杀头的袁昶。樊樊山的诗，题目叫作《爽翁惠咖啡余误为鼻烟》，见《樊山续集》卷十，全诗云：“苦说茄菲是淡巴，荳香误尽勇卢家。也如白雪楼中叟，不识人间有芥茶。”自注：“李于鳞按浙，徐子与致芥茶，李嫌叶大梗多，以赏皂役。”按诗题的“爽翁”，即是袁昶，袁字“爽秋”，故云。樊诗里所说的“勇卢”，是“鼻烟”的代指，“勇卢”一词，见于《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一引《龙鱼河图》：“鼻神名勇卢。”而用之以代指鼻烟，则始于晚清赵之谦《勇卢闲话》，其书收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樊诗用典自出于此。“白雪楼中叟”，则是指明代“后七子”的李攀龙。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李所以构“白雪楼”，大概是因为王世贞赞其诗文，比之

“峨眉天半雪”（《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三《李于鳞先生传》：“于鳞归则构一楼，田居，东眺华不注，西揖鲍山，曰：‘它无所溷吾目也。’”），李遂居之不疑。李攀龙的自负也是出了名的。

小说里的褚慎明，是影射钱先生的同乡，即曾研究相对论、且与爱因斯坦真通过信的许思园，这是喜欢“钱学”的人都知晓的。钱先生据此添枝加叶，说褚慎明“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写信给他们，说自己如何爱读他们的书”，惹得他们“高兴得跟疯子一样”，“回信赞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又说“不过褚慎明再写信去，就收不到多少覆信，缘故是那些虚荣的老头子拿了他第一封信向同行卖弄，不料彼此都收到他这样一封信，彼此都是他认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不免扫兴生气了。”这一段里所写的情事，颇似传说中林徽音之所为，据陈巨来《安持人物琐记·陆小曼》云：“不久，林女突来一电（与徐志摩），内容云：独处国外生活苦闷，希望你能写一电对吾多多有以安慰，使吾略得温暖云云。志摩得电后，大喜欲狂，即写了一长电，情意缠绵，以谓可得美人青睐了。次日即亲至电报局发电，哪知收电报之人忽笑谓志摩云：‘先生，吾今日已同时收到了发给这位黛微丝的电稿四分了，你已是第五个了呀！’志摩不怩云：‘你不要胡说，这女士只有本人一个朋友呀。’这收发员遂立即出示其他四人电文示之。志摩一看，天啊，都是留美的四个老同学也（小曼说时只记得一人为张似旭，徐三人已忘了）。志摩气极了，即持了林之来电去询张似旭，你为何也去电的，当时张还以为志摩得了风闻，故意去冒他的，

坚不承认。志摩乃出林电示之，张似旭大怒，亦出原电示之，一字未易也。于是二人同去其他三人处询问，都是初不认承，及出电互相同观，应是一个稿子也。五人大怒，遂共同签名去一电大骂之，与之绝交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陈氏此文所记，也未必全然可据，并且即使可据，钱先生也肯定没有读过，但我想林夫人的轶事流播人口，钱先生当不致无所闻，而且其《猫》中更是影射了林，那么把林的一个轶事，变化之而写进自己的小说，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在影射当代名人最多的《猫》里，所涉及的文坛学界名流，除林徽音、梁思成外，还有林语堂、周作人、沈从文等，而建侯父亲的那句格言，更是借了林语堂的俏皮话。建侯的父亲，“曾做出洋游历的随员，回国以后，把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传家格言：‘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遗憾矣！’”林语堂《自传》第九章《论幽默》说：“我说的笑话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是：‘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这话我是在巴西一个集会上说的。”（按张潮《幽梦影》：“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林语堂喜读此书，所谓“理想生活”云云，必从此来）林语堂的这个笑话，虽然“已经传遍了世界”，但论及《猫》一文，还未见有人提及，而将其捉置一处的。爰默的父亲，也是“前清遗老”，照那时遗老的脾气，免不了满腹牢骚，但是，他虽“文理

平常，写字也不出色”，却“只要盖几个自己的官衔图章，‘某年进士’，‘某年布政使’，他的字和文章就有人出大价钱来求”，“他才知道清朝亡得有代价，遗老值得一做”。同为晚清遗老的陈曾寿，在钱先生写小说那时，也曾作过一首诗，痛骂此类情形，题为《闻近日求人书者，以进士为贵，戏作一绝》云：“北江著论妙机锋，院体山癯本不同。树倒已无堪蚀叶，书空犹自见青虫。”（《苍虬阁诗续集》卷上）所谓“树倒”云云，自是指清朝之亡，而所谓的“青虫”，则是唐人骂进士的话，详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

（原刊《书屋》2007年第11期）

补订：“作健逢辰领元老”之“领”字倒装，即“元老领”也。《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一册第389页：“江书（按指江庸《趋庭随笔》）又言天津某寓公喜吟诗，沅叔诵其赠陈姓警句：‘谱牒遥传驴堕宋，文章今见鳄驱韩。’在坐某曰：‘韩驱鳄，未闻鳄驱韩也。’沅叔正色曰：‘安知鳄不报仇耶？’一座捧腹。按宋人多此类语，如东坡《甘露寺》云：‘泗水逸周鼎，渭城辞汉盘。’《试院煎茶》云：‘分无玉盃捧蛾眉。’《石遗诗话》记散原诗‘作健逢辰领元老’，见嘲张文襄，谓元老安得为人所领。云云。亦倒妆句法，正与此同。同光体中，此类语病甚多。”参观《随手札》“董斜川诗”条。

又《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246页论王广陵：

“当时具眼，只有王介甫，后世知音，差存刘潜父，近日则胡展堂《不匱室集》长言咏叹，千秋万岁，差不寂寞矣。”胡诗题为《读王广陵集三十首》、《又读王广陵集十首》，见《不匱室诗钞》卷六。

《也是集》的书名及其他

钱锺书先生的博学，是世所共知的，我也因为这个缘故，才想在他书里觅些讹失，或别的什么“缺陷”，来作为饭后自炫的谈资。必须承认，这一种心理，是有几分可笑的。钱先生有一篇《释文盲》，揶揄不懂文学的学究，说好比《格列佛游记》里那位主角，“在大人国瞻仰皇后玉胸，只见汗毛孔，不见皮肤”。我读书不识大体，而津津于字沟字缝间，钱先生若地下有灵，恐又要“眼睛增添明亮”、“齿牙闪烁光芒”（《说笑》），而“冷然微笑”了。

一、《也是集》的书名

《也是集》是一册小书，收文四篇，在香港出版。后与《旧文四篇》合并，删去一篇，是为《七缀集》。在《七缀集》的附

录里，钱先生于《也是集原序》之后，添了一段“附识”，述及《也是集》的书名，说：

我后来发现清初人写过一部著作，也题名《也是集》。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五：“江阴李本（天根）《燭火录》三十二卷……引用书目，附录于左：……《也是集》，自非逸叟。……”即使有一天那部著作找到而能流传，世界虽然据说愈来愈缩小，想还未必容不下两本同名的书。

钱先生的这段话，也才不过寥寥数行，却几乎行行有错。

第一，“自非逸叟”的那本书，并没有失传，甚至不算冷僻。相反，其书在晚清民初，不止一次翻印，见于各种丛书，如《明季野史汇编》、《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等。研究晚明史的人，也许要认为是常见书。今人所编《四库禁毁丛书》史部第33册，就收入了。其次，那本书的书名，确切地说，也不是“也是集”，而是《也是录》。其详，可见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一字之差，虽不致“谬以千里”，但钱先生后面的说话，不免有欠圆满了。第三，那本书的作者，一般是题为“自非逸史”，其人真名为邓凯，各种目录书，都是作晚明人的。全祖望的《鮑琦亭集》、邵廷采的《思复堂集》等，均载有其人事迹。钱先生说是清初人，是没有检书、想当然的话。

顺带一提，在晚清的时候，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天津的大公报馆，也出版过一种《也是集》。作者为英华，字敛之，

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人。严复曾为此书作序，收入王栻编《严复集》。晚清的文献，是钱先生博览的一个方面，而尤其瘠瘳堂的诗文，是钱先生所烂熟的，但不知这一篇，竟何以筛眼走漏了。不然，最后一句的数目字，便该易为“三人行”之“三”了。

二、人生的妙喻

钱先生于写旧诗，相对于其谈艺，所用的功夫，自然是比较少的了。但“炼意炼格，尤所经意”，所以佳章隽句，也是所在多有。惜乎学人粗心浮气，偏嗜“浮烟涨墨”，于钱先生的气体清妙，反格格不入，鲜能领会，殊令人有真赏难逢之叹。在《槐聚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4页，有一首《新岁见萤火》，云：

守玄行无烛，萤火出枯草。……流辉坐人衣，飞熠升木杪。从夜深处来，入夜深处杳。嗟我百年间，譬冥行长道。

“从夜深处来”四句，是说人生世间，好比深夜的飞萤，生，是从不可知的大夜而来，死，则消失而仍归于大夜。这一种说法，是令人起生死之念的，钱先生作为诗人的敏感，在这几句诗里，也有了充足的表现。可是，这个写法，不是钱先生的创造，也非传统诗中所有，其渊源，应该是来自欧洲。英国

7世纪的史家比德 (Bede)，有一部传世之作，叫作《英吉利教会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Nation*)，其第二卷第十三章，有一节略云：

吾人世间，为时极短，生前若死后，俱神秘莫可知。亦如冬夜中，风肆雪虐，吾人相聚欢饮，壁炉之火，炽然而燃，而于此际，偶有一雀，自门外飞入，逗留片刻，遂复由窗飞去。当彼在屋中时，受屋之庇，略无风雪之侵，然亦祇此一瞬，倏忽之顷，自暗夜而来之雀，又复归于暗夜中矣。人生世间，亦略如是，一弹指顷耳。生之前，死之后，俱如大夜，不可知也。

(The present life of man, O king, seems to me, in comparison of that time which is unknown to us, like to the swift flight of a sparrow through the room wherein you sit at supper in winter, with your commanders and ministers, and a good fire in the midst, whilst the storm of rain and snow prevail abroad; the sparrow, I say, flying in at one door, and immediately out at another, whilst he is within, is safe from the wintry storm; but after a short space of fair weather, he immediately vanishes out of your sight, into the dark winter from which he had emerged. So this life of man appears for a short space, but of what went before, or what is to follow, we are utterly ignorant.)

这一节文字，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名篇，钱先生不会没读过，所以，说前面那几句诗脱胎于此，应该不是过分的话。

三、坨字读音

钱先生于谈艺论诗，是比较重视陈衍的，而其称引陈说，在近人中也最多。此自为学人所知，毋劳再说。我要说的，则是另外一事，即陈氏死后，钱先生作的挽诗，其中一联：“竹坨弘通学，桐江瘦淡诗。”自注云：

坨即宅字，古读入声。翁叔平《瓶庐诗稿》卷四《重九前一日用壁间韵》：通识岂无朱竹坨，微言况有顾亭林。自注道此。（《石遗先生挽诗》，见《槐聚诗存》第一六页）

翁叔平就是翁同龢。检《瓶庐诗稿》，诗题的“韵”字后，还有“酬星叔大司马”六个字，钱先生节去了；而翁注的原话则作：“坨字古读作入声，故借用。可笑可笑。”很显然，翁是为了格律，才通融读仄。钱先生援此注，用意正同。这也不算奇怪，从前诗人写诗，为了平仄押韵，不得已而“破读”，一定要有前例。钱先生的自注，便是为此。但我们知道，钱先生又曾笑吴宓，说他：“南华北史书非僻，辛苦亭林自作笺。”（《论师友诗绝句》）可是到他晚年，自定诗集，也连篇加自注，躬自

蹈之。这倒也罢了，只是这个自注，不免有些“少见多怪”：钱先生似乎忘了，“垞”字之读入声，并算不得僻典。况且，即使要援引，也用不到翁诗。况周颐《选巷丛谈》卷一（收入《阮盦笔记五种》）里，就有一节考证，云：

竹垞之垞，亦作窋。俗读若茶，及其阴平、去声，并误。《正字通》：按《均会》垞古作窋。王维诗有《南窋》、《北窋》，注：入声。《广陵诗事》引顾书宣诗：敝湖北垞旧山庄。注云：垞即宅字。又云：汪容甫（中）亦嗜朱检讨为竹宅。

据况氏的考证，我们说，钱先生要自注，该引王维诗注才是，因为这个例证更古；还有，翁同龢所说“古读”，也许就是指此而言。王维的那两首诗，是《辋川集》中名篇，见于《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三，清人赵殿成注“南垞”，云：

《集韵》：垞，直加切，小邱名。或疑古字书多不载垞字，而《玉篇》、《韵会》诸书，均以窋字为古文宅字，颇疑垞字即窋字之讹。《正韵》麻、陌二韵，窋、垞二字俱不收。姑从《集韵》作茶音读。

寻绎其义，是也承认入声读的，而“作茶音读”，只是“姑从《集韵》”。但其没有明文，想非况说所据。清代以还，《右丞

集》以赵注最通行，虽然通行，却也曾被四库馆臣讥为“掇拾类书”；而明代顾起经的注，我没有看到，我只见到宋刘辰翁批（《四部丛刊》本）、明顾可久注说本。在两个本子里，也都没有这个注。所以，“垞”字的古读注，我也不能肯定，是否当真如此。不过，况周颐多读异书，不会只抱着赵注，他的话，应该是有根据的。那么，退一步说，钱先生的自注，即使用不了王维诗，至少也该引况氏所考，而钱先生又熟读况书，何以竟舍况而取翁呢。

四、曹冲秤象

曹冲秤象的故事，是小学课本上就有，小学生都熟知的。不过，这个故事的来历，并不简单，其间涉及些许学问，钱锺书、陈寅恪两大家，都曾略耗日力于此，而有所考证、议论。如《管锥编》（中华书局）第1260页云：

苻朗《苻子》：“朔人有献燕昭王大豕者……大如沙坟，足如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又令水官舟而量，其重千钧。”按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清桂馥《札朴》卷三皆谓与《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载邓哀王冲量孙权致巨象事同。《杂宝藏经》卷一之四记天神问弃老国王：“此大白象有几斤两？”举朝

莫对；大臣归以问父，父曰：“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没齐画，即知斤两。”

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见《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亦及此事，引《魏志·邓哀王冲传》，又引宋叶适《习学记言》云“仓舒（按指曹冲）童孺，而有仁人之心，并舟称象，为世开智物理，盖天稟也”，谓：

是直信以为事实。何义门焯以仓舒死于建安十三年前，知其事为妄饰，而疑置水刻舟，算术中或本有此法。邵二雲晋涵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引《苻子》所载燕昭王命水官浮大豕而量之，谓其事已在先。（见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壹肆）然皆未得其出处也。考北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壹弃老国缘云：天神又问，此大白象有几斤？而群臣共议，无能知者。亦募国内，复不能知。大臣问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画水齐船，深浅几许，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没齐画，则知斤两。即以此智以答天神。

据《三国志》，曹冲封邓哀王，故云“邓哀王冲”。钱先生大概认为：曹冲称象，与燕昭王称大豕，略无不同，而与《杂宝藏经》所载，尤相似。钱先生一向主张：“东海西海，心理攸

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换言之，便是观其会通，而寻常的异同比较，则匪所思存。所以，钱先生拈出此事，并非要追溯源流，考其事之所本，不过聊徵“心同理同”之意。而陈先生的兴趣，大相径庭，钱先生之所不为，正是陈先生的精彩处。陈先生于考证事毕，有一节推论，剥茧抽丝，抉发其事流传的经过，并及比较文化的大义，云：

《杂宝藏经》虽为北魏时所译，然其书乃杂采诸经而成，故其所载诸国缘，多见于支那先后译出之佛典中。知卷壹之弃老国缘亦当别有同一内容之经典，译出在先。或虽经译出，而书籍亡逸，无可征考。或虽未译出，而此故事仅凭口述，亦得辗转流传至于中土，遂附会为仓舒之事，以见其智。但象为南方之兽，非曹氏境内所能有，不得不取其事与孙权贡献事混成一谈，以文饰之，此比较民俗文学之通例也。

我想，钱先生一向轻陈，嫌其文章不雅驯（见《与汪荣祖书》），所以，此文未必即寓目，否则考证既与闾合，照钱先生的脾气，是要用“奥卡姆剃刀”，自行割爱的了。况且，撇开创获先后，单以考论而言，陈文也是骊珠已得，题无剩义了，又何须钱先生的闭门造车，丰干饶舌？“通人之蔽”之讥，钱先生怕也是难免的。

五、褻語入正史

頑皮的小孩子學罵人，沒有不喜褻語的，錢先生小時頑皮，老了也玩心不改，著述中涉及褻語處，不一而足。如《談藝錄》（補訂本）第374頁，解釋李賀的“古時填渤海，今日凿崆峒”兩句，即是一顯例（按《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抄錄褻語尤多）。又如《管錐編》第966—967頁，論“褻語入正史”，云：

匈奴冒頓《遺高后謾書》：“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況周頤《蕙風簃二筆》卷一舉《戰國策》〔韓〕二宣太后謂尚子語、《後漢書·襄楷傳》章懷注引《太平經典·帝王篇》言廣嗣之術及《唐書·朱敬則傳》上書諫武后內寵，為褻語入正史三例。可以此《謾書》及《金史·后妃傳》海陵怒詰莎里古真語補之。

據錢先生考說，《謾書》“所有”“所無”云云，即“指牝牡”、“穉嫖語”也。最後一句，說“可以此《謾書》及《金史·后妃傳》補之”，是此節的用意，乃為補況書的遺漏，但他忘了況氏另有一書，即連載於《東方雜誌》中的《眉廬叢話》，已自增《金史·后妃傳》金海陵一事：

古以猥褻語入史書者，嘗匯記之，得四事：……一、

《金史·后妃传》：“海陵私其从姊妹莎里古真余都。莎里古真在外为淫佚。海陵闻之，大怒曰：“尔爱贵官，有贵如天子者乎？尔爱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过于我者乎？”又海陵尝曰：“余都貌虽不扬，而肌肤洁白可爱。”

所谓“海陵怒诘莎里古真语”，其详如此。况氏引此文后，复有论云：

以上四事，宣太后之言，托谊罕譬。古人质朴，不以此等语为讳，要亦无伤大雅。《襄楷传》注近于房中家言，通乎阴阳化生之旨，不得以猥褻论。唯朱敬则一疏及金海陵之言，则诚猥褻不堪，不当载之史册。

钱先生“知一不知二”，所增二事，可留者仅一，馀下半数，都只好还诸况氏了。近人多称况“记丑学博”，“拼命著书”，不仅自负词学，为有名的狂人，由此观之，其涉猎博杂，也可算名下无虚。

而况氏书所举之例，尤以《战国策》宣太后语，较为人所熟知。（但《战国策》并非正史，钱语稍不确。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二“秦宣太后事”条，云“此亦策士恨秦，造此语以丑之”，亦可参。又，今人李敖有一文，亦引其事，发挥古人“质朴”之义；所说与况同。）陈锐《衰碧斋杂记》中，为近人

叶德辉刻房中书作辩，也引到《战国策》中事，说：

吾友叶奂彬吏部《双梅影盒丛书》，刻《素女经》数种，时人以为诲淫。余谓此不过《杂事秘辛》之类耳。试读《战国策》韩二：“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一本作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此何说耶？又试读《仪礼》妇至成礼：“主人说[读如“脱”。后同]服于房，媵受；妇说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御衽于奥，媵衽良席在东，皆有枕，北止。主人入，亲说妇之纓。烛出。”敢问以下当作何语？周公诚圣人中之情者哉。

是由史及经，末一句，尤令人解颐。促狭如钱先生，读之必当莞尔。

（原刊《学林漫录》第17集）

随手札

燕子龕诗

钱先生颇轻苏曼殊，在《围城》中，他借董斜川之口，说苏曼殊的《燕子龕集》，有“日本女人头发油气”。此语可谓谑矣。又在《谈艺录》中，大加奚落：“此僧于文字海中飘零，未尝得筏登岸。”虽是刻薄的话，却非常之妙。

我从前读《燕子龕集》，也不喜欢，嫌其多摭拾陈言，少有用意深的，一卷读完，难得碰见什么佳句。有些诗，则几近于所谓“钝贼”。如《东居杂诗十九首》之十二：“六幅潇湘曳画裙，镫前兰麝自氤氲。”“六幅”句，是他心赏的谭嗣同的诗，只改易一字。（见其《燕子龕诗话》。谭诗则本唐人句：“裙拖六幅潇湘水。”）

而《本事诗》十首之八：“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则是其得意之句，并且刻为小印，到处乱钤。明人《济颠禅师语录》中俗句：“袈裟常被胭脂染，直裰时闻膩粉香。”（见

路工、谭天编《古本平话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版，上册第 20 页；又《欢喜冤家》第十一回亦见此诗，则较后矣）论用思，苏诗颇与之近，也许，就是从其“脱胎”，也说不准。据此，钱先生屡加讥评，就不是没道理的了。

“土匪名士”

陈衍说、钱先生记的《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说：“陈柱尊人尚好学，下笔亦快，惟大言不惭，尝与予言，其诗有意于李杜苏黄外别树一帜。余笑而存之。锺书曰：‘柱尊真可当“土匪名士”之号。’丈曰：品题极切。”

按“土匪名士”一语，为曾国藩讥评人的话；况周颐《眉庐丛话》云：“道、咸间，京朝士夫，大半好名，犹善俗也。或有科目进身，以不治古文为耻，乃捃摭帖括浮词，杂以案牘中语，牵合成篇，当时目为‘京报古文’。曾文正督两江时，开阁延宾，群才云涌，清奇浓澹，莫名一格。有同乡某太史，记问极博，倚马万言，惟矜才使气，自放于绳尺之外，文正戏以‘土匪名士’称之。”（载《东方杂志》第十一卷六号）曾国藩虽喜讲理学，有时令人生厌，但是这个考语，却很具幽默感。

补订：《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 263 页讥曹老人，谓之“土匪学人野名士”。又据陈柱尊《变风变雅诗话》，

钱先生与陈亦有过从；《变风变雅诗话》：“光华大学旧同事钱子泉（基博），力学绩文，其长公子默存（锺书）世兄，克承家学，尤工于诗，有吴梅村之哀艳，兼李义山之典则。近赠我《中书君诗刊》一册，佳什纷披，不克尽录，其与我最有关系者《无题》一首，序云：‘无题。义山《有感》云：楚天云雨尽堪疑。解人当以此意求之。’诗云：‘传言玉女未全讹，各蓄相思孰最多。人定金环深院叩，梦回珠屐曲廊过。身无羽翼惭飞鸟，门有关防怯吠狺。待与十年留后约，阴成子满奈卿何。’”（《越风》第二卷四期）

纸老虎

今语“纸老虎”，《管锥编》第155页曾考之，说：“韩、吴等（按指韩程愈、吴伟业）诗皆咏‘蜚虎’，今语有‘纸老虎’亦已见明季载籍。如《水浒》第二五回潘金莲激西门庆曰：‘急上场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交’，潘问奇《拜鹃堂诗集》卷一《五人墓》：‘竖刁任挟冰山势，缇骑俄成纸虎威’；清人沿用，如沈起凤《伏虎韬》第四折门斗白：‘闲人闪开，纸糊老虎来了！’”又第398页增补说：“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二〇《秋声馆》之七：‘一切有形如是，雪狮、纸虎、泥牛。’”

显然，这是因“纸老虎”一词，是当时的流行语，所以，引发了钱先生的“考据癖”，顺手来了点小考证。这与他小时考

证“巨无霸”，也没什么不同，均为一时兴起，谈不到多少深意。又如认此为钱先生的主业，那就更错了。钱先生说过，“李审言丈读书素留心小处”（见《谈艺录》第207页），他自己也有这脾气。

按清人范寅《越谚》，有一条云：“纸老虎，假威严。”知“纸老虎”三字，也是现成语，不仅钱先生所引“纸虎”。《越谚》一书，钱先生也仔细读过，并做了笔记，见《容安馆札记》第六〇九则（第二册第1066—1067页）、《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四册第484页。

小姐

“小姐”这个词，在宋代原是称妓女的，到了元明以后，才用来称官宦人家的千金。近一二十年，竟如梁启超所说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又“把历史倒演了一次”（语见《清代学术概论》）。所以，“小姐”这个称呼，是不能随便用的。

钱先生的《容安馆札记》第一六则中，批评王季思说：“王季思集评校注《西厢记》，参验稽决，力劬心细，洵王实甫功臣也。余偶披寻，尚有可补正者。第一本《楔子》：……‘祇生个小姐，小名莺莺’。王注引《新方言》谓：‘《说文》：妣，小女也。’按当引《陔馀丛考》。”指出王注不妥。但检今本王注的《西厢》，引《新方言》的数句，已经删去。

在另一处，又说：“《陔馀丛考》卷三十八、《越谚》卷中、《雨村诗话》卷十一皆谓宋时闺女称小娘、妓女称小姐。……章太炎《新方言》云：‘《说文》：妣，小女也。坼下切。今人谓处女为小妣，读如姐，以姐为之。姐为母称，非也。’章氏不熟词章，又谢本师，故浑忘俞曲园《茶香室丛钞》卷五云：‘唐李匡乂《资暇集》云：“公郡主，宫禁呼为宅家子。盖至尊曰宅家，公主以下加子字，亦犹帝子也。又为阿宅家子；阿，助词也。急语乃为茶子，亦云阿茶子；或削其子，遂云阿茶。”按元好问诗：“牙牙姣女总堪夸，学念新诗似小茶。”注云：“唐人以茶为小女美称。”尝不得其解，李氏说或近之矣。’”（见同书第一二则）

据此所说，明清人的“小姐”，其实该称“小茶”，或“阿茶”；又据俞樾考证，宋人的“小姐”，则该称为“小籍”，或“小姬”。俞氏的《曲园杂纂》卷二十七“妇女称姐”条说：“《说文》女部：姐，蜀谓母曰姐，淮南谓之社。是姐之本义。至魏时乐人称姐，又别一义。宋时尚延此称。《夷坚志》所载，有散乐林小姐、建康倡女杨小姐，皆是也。今俗以为仕宦家女之称，又一变矣。若女兄之称，是姊非姐，形声俱别，何得混而一之？”又同书卷三十六“小姐”条说：“赵甌北《陔馀丛考》云云，余按《懒真子》：文枢密所居私第名东田，有小姬四人，谓之东田小籍。疑‘小姐’本是‘小籍’。盖贵家歌姬辈必有簿籍记录，其年稚者，因有‘小籍’之名。今作‘小姐’，即‘小籍’之声转耳。”

又王国维的《东山杂记》中，也有“姐即母”条：“《广雅·释亲》：‘姐，母也。社、姐音略近，姐、即社也。’……南宋时，高宗犹呼韦后为‘大姐姐’。（见《四朝闻见录》）”（《王国维学术随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如此，则“姐”本是“母”，叫“小姐”、“大姐”，都没有道理了。近人《网庐漫墨》（载《民权素杂志》）中，亦有“小姐之称”一条，考小姐的称谓变化，大抵即同俞樾，无甚新意。

乍见相失

《围城》中写方鸿渐在轮船上，与赵辛楣说闲话，触起失恋之痛，用了一个比喻：“譬如黑夜里两条船相迎擦过，一个在这条船上，瞥见对面船舱的灯光里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脸，没来得及叫唤，彼此早距离远了。这一刹那的接近，反见得睽隔的渺茫。”

我少时读《世说新语》，很同意谢车骑的话，认为《毛诗》里最好的句子，一定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并且，我觉得写别离的最佳文字，也非此两句莫属。后来读了陈衍的《石遗室论文》，就改变了主意。《庄子·达生篇》：“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陈衍说“二语风神绝世”，我觉得对极了，可惜我不会“横说竖说”，来些“批评的解剖”。

《围城》的这个比喻，是另一种情境，但更令人“怅惘不

甘”。我近来发现，钱先生认为“声淫词冶”的清代孙原湘的诗里，也写到过这个情境。孙的《舟行杂诗》八首之六：“下水船如飞，乍见已相近。船中疑故人，遥遥不敢问。”（《天真阁集》卷二）“乍见”、“相近”，其后便是“遥遥”，正写出“电光石火”、“一瞥即逝”的意外相逢。而所谓的“故人”，与“但见双鲤鱼，不见故人书”之“故人”，都是指的情人，若作寻常朋友，便要意味大减了。

补订：《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18页录《宋景文笔记》卷中：“庄周曰：‘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兹远。’每读至此，令人萧寥有遗世之意。”

抔泥人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七十载：赵孟頫想纳一妾，管道昇夫人反对，就作一词说：“你依我依，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此词又见于清褚人穫《坚瓠集》十集卷二、徐钊《词苑丛谈》卷十一、沈雄《古今词话·词话》卷下等书。《坚瓠集》六集卷一“赵子昂词”条，则作赵赠管夫人，字句略异（按：《挂枝儿》卷二《泥人》一首，亦据之改作，冯梦龙评云：“此

赵承旨赠管夫人语，增添数字，便成绝调。”）。

这首小词历来传诵，没读过诸家书的，也自耳熟能详。近人吴梅《顾曲麈谈》第四章“谈曲”称之说：“此词各家笔记，多已载过，所以不忍弃者，以其词妙也。”可见很欣赏。但此词的用意来历，却似还没有追究的。

我读《朱子语类》，见释禅家言性“倾此于彼”之义，有一节说：“横渠说‘形溃反原’，以为人生得此个物事（按即‘物质之我’），既死，此个物事却复归大原去，又别从里面抽出来生人。如一块黄泥，既把来做个弹子了，却依前归一块里面去，又做个弹子出来。”（卷一百二十六）叹其取譬之妙。管夫人小词的“抔泥人”，不用说，是借了女娲之事（见《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但其“打散了又再捏”，这一层意思，必是本诸“理学家语”。

钱锺书先生在年轻时，曾作一诗赠杨绛，也用了宋明理学家的语录：“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钱先生很为此得意，告诉友人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见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如果这话当真，那么管夫人外，“用理学家语作情词”的，该也没有“第二人”。

补订：朱子之譬，早发于《淮南子·精神训》：“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犹陶人之埴埴也，其取之地而己为盆盎也，与其未离于地也无以异，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澜，而复归其故也，与其为盆盎，亦无以异矣。”又《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

七百六十二则亦引管夫人词，以与 Tasso（塔索）*Rime d'Amore* 中语比较。

“比干剖心碑”

《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98 页记其与钱先生吵架说：“我和锺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锺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这是书里有趣的片段之一。大家都知钱先生说英语纯正，据这一节记载，钱先生说法语则似乎稍逊，并且还“蛮不讲理”、“不肯认错”。

我联想起汪东《寄庵随笔》里记的一个刘师培的轶事，也是杀“赌茗翻书”风景的：“申叔擅经术……小学则非其所长。尤拙于书，笔画欹斜，类小儿初习学者。其妻訾之，申叔不服，曰：我书佳处，唯太炎知耳。妻问果佳否，先生诡答曰佳。复问学何种书，曰：俗人不晓，此乃‘比干剖心碑’也。”（上海书店 1987 年版）刘妻名何班，后改名震，小夫一岁，也能著述。当然，论到学识、人品，刘、何较之钱、杨，不能同年而语。

刘师培的字，大概可比辜鸿铭、周作人，都是“拙如儿

管”。1901年，刘师培参加扬州的府试，冒广生取了他的卷子，说他“字如花脚蚊，忽断忽续，丑细不成书”（见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章太炎为友护短，杜撰出“比干剖心碑”，比起那位法国夫人，是要可爱得多了。

庄子惧内

《庄子·至乐》说：“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明人据此推测，庄子一定“怕老婆”，方以智《药地炮庄》卷六引夏君宪说：“庄子一生旷达，必是被老婆逼拶不过，方得脱然，不觉手舞足蹈，著此书必在鼓盆之后。”其说殊可喜，所以钱先生在《管锥编》第1077页征引了。又据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第二卷第五章载，苏格拉底的妻子克珊西帕（Xanthippe），也是一位河东君，如此，庄子与其同行前辈恰好作配，东西辉映（苏格拉底卒后三十年，庄子生）。

早于方以智的明人张燧，于其《千百年眼》卷三中，也引过夏氏此语，但文字却稍异：“妇人好干家做功名，妇人之情也。庄子一生旷达，欲效曳尾之龟，必是被老婆逼拶不过，到此方得脱然，不觉手舞足蹈，《逍遥游》之作，或者其鼓盆之后乎。”

张字和仲，湖南人，其书刻于万历年，书前有万历四十二

年（1614）自序，时方以智才四龄，所以知道张引在前，方后来作了“削烦”。钱先生在《石语》中提过张书，是为了笑林绉的弟子朱羲胄，说：“朱氏笔舌蹇吃，绝无学问。答石遗书有云：‘张和仲纂《千百年眼》一千卷’，可笑。”（又《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六百十七则亦征引及之）《千百年眼》只十二卷，朱没读过，居然胆大妄说。

猫名妲己

钱锺书先生在《猫》里，把陆伯麟影射周作人，是明显不过的，尤其介绍陆的兴趣那一节，几可看作是知堂的“漫画像”。钱先生在《与黄裳书》中，赞扬黄先生的文章，曾拿知堂来作比，说：“深得苦茶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见《钱锺书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说及周文之病，也可与此节参考。

知堂所喜浏览的杂书，在钱先生的眼里，也许不过是“奇零小册”，无当大雅，所以，陆伯麟恭维爱默时，便有如此之说：“中国人一向也喜欢黑里俏的美人，就像妲己，古文作‘黜己’，就是说她又黑又美。”细味之，不无讥知堂耽读冷书之意。

但是这个说法，也有其来历，见明代张萱的《疑耀》卷三：“妲己，古书有作‘黜己’者。《说文》：白而有黑曰黜。《字统》：黑而有艳曰黜。二说皆不离一‘黑’字。则妲己之貌，

断非莹白矣。”

多年之后，钱先生在写《管锥编》时，又再次涉及此说：“《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不言仍氏之‘玄妻’乎，‘黜己’、‘媚猪’之流，见诸张萱《疑耀》卷三、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五；陶穀《清异录》卷三《兽》门记乌猫号‘昆仑姐己’，即‘黜己’之确解；黑不妨美。”钱先生本人，似乎也能欣赏“黑里俏”，譬如《围城》的开头，就写了一位“黑甜小姐”。

张萱的《疑耀》，是钱先生爱读之书，征引不止一次。并且，《茶香室丛钞》中引《疑耀》也不在少，足见其书的有趣。据《茶香室续钞》，此说并不昉自张萱，其始作俑者，或许该是杨慎。

《升庵外集》中有篇《字说》，说“黜己即姐己”，并引《字统》、《说文》为说。俞樾据之认为：“黜即姐之本字”，“不特其字，且可想见其容，亦奇闻也”。其实，在杨慎的《古音馀》卷五、《古音骈字》卷下，也发过此说，也引到了《字统》；俞书均未及。此外，方以智《通雅》卷二十也引到《字统》此条，说“姐己或作黜己”。可见此说在明代颇流行，也不仅《疑耀》载之。

考《字统》一书，原是后魏杨承庆所撰，后来失传了，清代的学者，如任大椿、马国翰、顾震福等人，均曾据《玉篇》、《广韵》等书所引，有过辑本（收入《小学钩沉》、《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不过，在这些辑本中，都不见杨慎所引的那条。我猜想，大概是因杨慎所引，羌无来历，所以为

清儒所不取。

此外，把猫取名“姐己”，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四“姐己”条也说过，可与钱先生所引的《清异录》同参：“明王志坚《表异录》云：后唐琼花公主有二猫，一白而口衔花朵，一乌而白尾，主呼为‘衔蝉奴’、‘昆仑姐己’。按姐己之名施之于猫，义亦未详。”猫名“姐己”，当然是因其姿媚，“义亦未详”云云，不免懵懂。至陆伯麟所说的，“黜己刚是‘Darkie’的音译，并且也译了意思”；则是钱先生的一时机智了，与知堂老人不相干。

补订：近人柴小梵《梵天庐丛录》卷二十七“姐己貌黑”条，也引及此说，并称：“予尝谓史传所传美人，未必真皆国色，……今知姐己无艳色，貌甚黑。……纣王之好之，亦曰嗜痴有癖耳。”字书解“黜”字，明明说“黑而有艳”，柴氏却别作解会，殊可怪也。又《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九十九则：“《金瓶梅》王六儿‘面皮紫膛色’（三十三回）；《艺文类聚》美人门：‘《左传》（昭二十八年）：昔有仍氏生女，黜黑而甚美，光可鉴，名曰玄妻。’梁玉绳《瞥记》卷三：‘《晋书·四夷传》：林邑国人皆裸露，以黑色为美。晋惠南风、刘鋹媚猪，皆以黑为美也。’张萱《疑耀》卷三：‘姐己古书有作黜己者，……《字统》：“黑而有艳曰黜。”……则姐己之貌，断非莹白矣。古云“元妻”，亦云其貌如漆，有光可鉴，……南汉主刘鋹得波斯女黑腠而慧艳，……赐号“媚猪”。……世

庙有尚妃者，貌亦黑，宫人称为“黑木娘娘”，宠冠一时。’（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五引杨升厂《字说》黜己略同）”（第二册第1583页）

钱能杀人

钱先生读《史记·货殖列传》，发了不少妙论，论“钱能杀人”，则是其一。《管锥编》第385页引明陈继儒《岩栖幽事》云：“李之彦尝玩‘钱’字傍，上着一‘戈’字，下着一‘戈’字（按就“钱”字繁体说），真杀人之物而不悟也。”又引清张潮《虞初新志》卷二〇汪价《三依赘人广自序》：“余与汉阳李云田偶过汴市，见有争钱而相搏者。云田曰：‘古人名钱曰刀，以其铄利能杀人也；执两戈以求金谓之钱，亦以示凶害也。’”

按李之彦是宋人，号东谷，其说见《东谷所见》（《说郛》卷七十七）：“钱之为钱，人所共爱，势所必争：骨肉亲知以之而构怨稔衅，公卿大夫以之而败名丧节，劳商远贾以之而捐躯殒命，市井交易以之而斗殴戮辱，乍来乍去，倏贫倏富，其笼络乎一世者，大抵福于人少而祸于人多。尝熟视其形模，金旁着两‘戈’字，真杀人之物，而世人莫之悟也。”陈继儒所引的，就是其从字形说的两句。

李之彦的这个说法，确有意趣，所以后来引者不少；但也许有人是暗合。如明张岱《快园道古》卷四云：“钱彦林曰：金

以杀人，戈以杀人，一‘金’从两‘戈’，安不杀人？”丁耀亢《家政须知》云：“钱之为言，戔也。其为字也，双‘戈’伏于‘金’旁，有争伐之意焉。”又李汝珍《镜花缘》第三十八回唐敖论钱道：“你只看那‘钱’字，身傍两个‘戈’字，若妄想亲近，自然要动干戈，闹出人命事来。”

“微波喜摇人”

陈与义的《夏日集葆真池上》诗，有一联说：“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陈与义集》卷十）钱先生《谈艺录》（补订本）第333页，称之为“名句”，并用来解山谷诗，说“世故澹洞，人生艰窘，拂意失志，当息躁忍事，毋矜气好胜；日久论定，是非自分”。但《宋诗选注》却不选，不知为什么。

按《荀子·解蔽》：“人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鉴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夫）形之正也。”（又按《韩非子·释邪》：“摇镜则不得为明。”意略同。但荀子语善譬，实近乎诗）陈诗本其意，而拟议变化，使人不觉。为《简斋集》作注的，似乎都没指出。

补订：《淮南子·俶真训》：“今盆水在庭，清之终日，未能见眉睫；浊之不过一挠，而不能察方员。人神易浊而难清，犹

盆水之类也。”即本《荀子》。

又宋何坦《西畴老人常言》：“人心如槃水也，措之正，则表里莹然，微风过之，则湛浊动乎下，而清明乱乎上矣。夫水方未动时，非有以去其滓污也，澄之而已。风之过，非有物入之也，挠动则浊起而清自乱也。”（《丛书集成》本）全袭《荀子》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四讥之，以为“颇近于禅”，不免误认。

据为已有

《谈艺录》（补订本）第245页说王安石：“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已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

按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七讥王士禛云：“渔洋于古人好句，巧偷豪夺，必须掠为已有而后已。”其口气，即为钱先生所仿。

长门赋

《管锥编》第918页说：“《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按傅玄《杂言》诗：‘雷隐隐，感妾心，倾耳清

听非车音’，可资比勘。皆谓雷转车声，而马赋曰‘象’，写乍闻时心情，倖望顿生，傅诗曰‘非’，写细聆后心情，倖望复灭。同工异曲。”

钱先生的“捉置一处”，在清张玉穀《古诗赏析》卷十傅玄《杂言》的“批尾”中，已经有过了：“此代宫人赋其望幸而不得也。既知其为雷，犹必倾耳清听，始知其非车音。即此摹写痴心，较《长门赋》语更为深曲。”（按：沈德潜《古诗源》卷七批云：“点化《长门赋》中语，更觉敏妙。”张曾助沈讎校，疑即从沈说发挥。张字荫嘉，吴县人。廩贡生。有集存世。）

早于沈德潜之说的，则又有明人孙能传。孙氏《剡溪漫笔》卷三“翻案用事”条云：“马卿《长门赋》：‘雷隐隐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傅玄《杂诗》：‘雷隐隐，感妾心，倾耳清听非车音。’诗本祖袭赋语，而赋疑其声之似，诗感其声之非，一字转换，陈而若新。”据《管锥编谈艺录索引》（中华书局1994年版），钱先生没引过孙书，或者是未见。至于《古诗赏析》之类，在钱先生眼里，一定是“底下俗书”，不值得翻的了。

苏文纨语

《围城》中赵辛楣、沈太太一致赞苏文纨的记性好，苏文纨便谦虚说：“好东西不用你去记，它自会留下很深印象。”这句话可称名隽，也见得苏小姐具有性灵，并不是“女学究”。钱先

生“乱点鸳鸯谱”，把她嫁给“肥诗人”，有些“辱没”她了。

清陆继辂《合肥学舍札记》卷一里，有一条倒说之：“凡诗，目中一过，久而不忘，必佳句也。”苏小姐不见得读过《札记》，却不妨与之“同调”。近人黄侃则谓：“古今的文章，有两种最容易记得，即最好与最坏的；不好不坏的文章，读十遍也记不得。”（见武西山《关于黄季刚先生》）又进一解，语意尤为周匝。总之，记不住的东西，一定是不值得记的，所以殊不必费气力，自讨苦吃。

论诗文如此，论人也不例外。唐代的许敬宗，见人多忘，有人质问他，他就说：“君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着，亦可识之。”（见韦绚《刘宾客嘉话录》）确实，眼睛自有鉴别，用不着拿尺子量。“何刘沈谢”，指何逊、刘孝绰、沈约、谢朓。

董斜川诗

《围城》中董斜川的几联诗，如“好赋归来看妇媪，大惭名字止儿啼”，“不须上溯康乾世，回首同光已惘然”，其出处已有人考过。又如“数子提携寻旧迹，哀芦苦竹照凄悲”，我从前以为是用了散原的“作健逢辰领元老，夕阳城郭万鸦沈”（《九日从抱冰宫保至洪山宝通寺钱送梁节庵兵备》），后来才知是错认了。

这一联的上句，其实是据陈的《过黄州因忆癸巳岁与杨叔乔屠敬山汪穰卿社耆同游》：“提携数子经行处，绝好西山对雪堂。”（见《散原精舍诗》卷下）其下句的“照凄悲”，则语本另一首《王义门陶宾南两塾师各有赠答之什次韵赘其后》：“二妙争传所吐辞，高花大柳照凄悲。”（见同前卷上）方鸿渐的疑惑是，“芦竹并没起火，照东西不甚可能，何况‘凄悲’是探海灯都照不见的”；他不知这是“散原字法”。

至于“秋气身轻一雁过，鬓丝摇影万鸦窥”，也是暗用《散原精舍诗》卷上《清明日墓上》：“绕郭雏乌亦自还，穿林惊雉更相攀。年年窥我鬓丝白，无数坟头夕照山。”“身轻一雁过”、“哀芦苦竹”，则用杜甫的诗、周邦彦的词，各改了一字，无须多说。

方鸿渐能看得懂的，还有一联：“清风不必一钱买，快雨端宜万户封。”上句用李白诗，人人所知；下句则用陈衍语：“此雨宜封万户侯，能将全暑一时收。”（《雨后同子培子封对月怀苏戡兼寄琴南》，见《石遗室诗集》卷三）知者也许不多。

钱锺书与张爱玲

钱先生提及张爱玲，见于水晶《两晤钱锺书先生》；其不喜张，尤见于陆灏《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不喜之故，大致可以想见，可不必深究。我以前读张的散文，很喜欢她的议

论，其中有几处，实可与钱先生“共语”。

张的《谈女人》：“有人说，男人统治世界，成绩很糟，不如让给女人，准可以一新耳目。”（见《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四卷第69页）《围城》里方鸿渐为了引唐晓芙注意，发的那节“奇论”：“女人学政治，那真是以后天发展先天，锦上添花了。……男人有思想创造力，女人有社会活动力，所以男人在社会上做的事该让给女人去做，……女人不必学政治，而现在的政治家要成功，都得学女人。”

张爱玲论新诗，也与钱先生投合。《围城》里鄙夷新诗的话，有好几处（具见第三章）；张的《诗与胡说》：“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同上书，第131页）

不过，我尤为感兴趣的，是他们批评纪昀、蒲松龄。张的《谈看书》：“多年不见之后，《聊斋》觉得比较纤巧单薄，不想再看，纯粹记录见闻的《阅微草堂》却看出许多好处来。”（同上书，第269页）钱先生《容安馆札记》第二十一则：“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修洁而能闲雅，《聊斋》较之，遂成小家子。乃郎汝侏轻家鸡而逐野鹜，苦学《聊斋》，何耶？”蒲、纪二家书，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里，原是各有千秋的，到了钱、张眼里，却如此径庭。不管怎样，这一批评，是有些“颠覆性”的。

顺带一说，汝侏为纪晓岚的长子，《阅微草堂笔记》卷

二十四云：“（儿）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钱先生所指即此。但“轻家鸡”之责，汝侒可以不受。因为纪文达初撰《滦阳消夏录》，在乾隆己酉（1789），而汝侒卒于丙午（1786），哪里见得着？钱先生是错怪了。

补订：罗继祖比较二书优劣，亦云：“《阅微》喜谈狐思，然文章实优于《聊斋》，《聊斋》文笔杂有唐人说部习气，而《阅微》有古文气韵。”见《枫窗三录》（大连出版社2000年版）第672页。又《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六百十七则：“影印《聊斋志异》手稿本四册，玩其改削处，确为留仙手笔，盖完稿缮写，复稍加润色者。留仙亲自誊清，亦偶假手他人，圈点评鹭，则不知出谁何矣。删易之句，皆较原稿为简雅，惜尖新纤俗，未能一一扫除。骈俪语更小家薄相，阑入叙事中，尤滥恶。如《公孙九娘》一则云：‘如蒙金诺，还屈玉趾。’岂非尺牍家习气耶。”亦可参观。

又周作人《〈聊斋志异〉》：“《聊斋志异》是中国旧说部中之佳作，与《阅微草堂笔记》并驾齐驱，代表古小说的两派，正如《阅微草堂》是近代化的志怪书，《聊斋》继承唐代的传奇文，集其大成，二百多年来他们在文坛上占着势力，那是并非偶然的。”（见钟叔河编订《知堂书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则无异于鲁迅，“兄弟阅于墙，犹足外御其侮”。

又林语堂《女人应当来统治世界吗》：“一位美国女人曾出了一个‘美妙的主意’：认为男人把世界统治得一塌糊涂，所以此后应把统治世界之权交予女人。”（《林语堂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上册第113页）

唐人故智

《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八十五则：“六年前，绛为英国文化委员会译小册，以稿示傅怒庵，怒庵谓过于拘谨。绛告予，予以此诀授之，绛如言。怒庵果堕计中，尚沾沾自负为观书月眼也。”钱先生的“供状”说，其所仿的，是意大利人一故技。

钱先生的尊人《韩愈志》第三篇“佚事状”引明张岱《史阙》所载韩愈事，与之绝似：“韩愈入试，陆宣公赞为主司，作《不迁怒不贰过论》。赞阅愈卷，黜之不叙。次年，宣公复主试，复试是题。愈复写旧作，一字不易，宣公大加叹赏，擢置第一。”（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7页。按，此事见《史阙》卷十，又《夜航船》卷六亦载之。早于张书、以我所知的，仅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唐韩昌黎应试，‘不迁怒不贰过’题，见黜于陆宣公。翌岁，宣公复为试官，仍命题。昌黎复书旧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称赏，擢为第一。”）不知为什么，钱先生竟一时忘了。

又《吕氏春秋·审分览》：“韩昭釐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

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釐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虽然其事没得逞，并且“猪不入画”，也不能与文章并论，但以原物欺人的做法，则没什么不同。所以也该一提。

盗我媚妾

《焦氏易林》坤之剥云：“南山大獾，盗我媚妾，怯不敢逐，退然独宿。”《管锥编》第二册第546页论此说：“猿猴好人间女色，每窃妇以逃，此吾国古来流传俗说，屡见之稗史者也。……张华《博物志》卷九：‘蜀中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名曰猴獾，一名马化。伺行道妇女有好者，辄盗之以去，而为室家。’《太平广记》卷四四四《欧阳纥》记大白猿窃取纥妾，先已盗得妇人三十辈；此篇知者最多，实《剥》林数句之铺陈终始而已。”

鲁迅辑校的《唐宋传奇集》附《稗边小缀》里，有一节论《补江总白猿传》（按《广记》题作《欧阳纥》，鲁迅据《顾氏文房小说》），说：“老獾窃人妇生子，本旧来传说。汉焦延寿《易林》（坤之剥）已云：‘南山大獾，盗我媚妾。’晋张华作《博物志》，说之甚详。唐人或妒询名重，遂牵合以成此传。”（见《鲁迅全集》第十卷；又，尚秉和《焦氏易林注》也引了《博物志》）所考略同，钱先生殆未睹，否则当“怵人我先”。

补订：汪辟疆辑《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1页：“按此传虽为诬询而作，然亦实有所本。汉焦延寿《易林》（坤之剥）曾云：‘南山大獾，盗我媚妾。’晋张华撰《博物志》亦云：‘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獾，一名化，或曰猓獾。伺行道妇人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人不得知。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有子者辄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有不食养者，其母辄死，故无不取养也。及长与人无异。’（任昉《述异记》所载略同）据此，撰者或有意牵合二说，而又具形象化出之欤。”汪书后出，必亦参诸鲁迅。

“势利眼”

《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并相六国，归，其家人皆“侧目不敢仰视”，“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以谢。”《管锥编》第一册第314—315页论此，因叹“世态炎凉，有如践迹依样”，并及小说院本“嘲诙势利翻覆”数例，认为“事有此势，人有此情，不必凿凿实有其事，一一真有其人”。司马迁吃了没钱的亏，一肚皮牢骚；钱先生“姓了一辈子钱”，只落得个空名。人世间的诸相，在他们的笔下，自然免不了要被“捌几下”。

按清石成金《传家宝全集》卷一“笑得好”中，有“看写

缘簿”条云：“有一军人穿布衣布靴游寺中，僧以为常人，不加礼貌。军问僧曰：‘我见你寺中甚为淡薄，若少甚的修造，可取缘簿来，我好写布施。’僧人大喜，随即献茶，意甚恭敬。及写缘簿，头一行写了‘总督部院’四个大字，僧以为大官私行，惊惧跪下。其人于‘总督部院’下边，又添写‘标下左营官兵’，僧以兵丁，脸即一恼，立起不跪。又添写‘喜施三十’，僧见以为三十两银子，脸又一喜，重新跪下。及添写‘文钱’二字，僧见布施甚少，复又立而不跪，将身一掬，脸又变恼。”（广益书局本）刻画小人势利，也可谓“穷形尽相”，钱先生却没微引，似有些可惜。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八、九册，有摘《传家宝》数纸，也没有录此条。

樊美人

樊樊山是董斜川挂在嘴边的“老世伯”，近代光宣诗人的“大作家”，在《光宣诗坛点将录》里，他被汪辟疆派作“双枪将董平”，赞语是：“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樊美人，殆若人之侑乎。”据他的友人陈衍说，他虽有些“绮语癖”，为人却并不风流：“樊山诗才华富有，欢娱能工……自喜其诗……尤自负其艳体之作，谓可方驾冬郎，《疑雨集》不足道也。……余辑有《师友诗录》，以君诗美且多，难于选择，拟于往来赠

答诸作外，专选艳体诗，使后人见之，疑为若何翩翩年少，岂知其清癯一叟，旁无姬侍，且素不作狎斜游者耶。”（《石遗室诗话》卷一）

近读《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才知陈衍这节话，也靠不住。《中文笔记》第五册第298页的一个眉批里，钱先生“发覆索隐”，侦破了樊山的“私情”。《樊山续集·自叙》：“妇家群从，并在门墙，竹延兄弟、绣漪姊妹，立雪受书，而称弟子。”钱先生批注云：“当时人传樊山通其妻妹，有小周后之事，《樗枰萃编》第12—20回所载范承吉与小华氏奸情是也。《梵天庐丛录》卷八亦纪之。然按其诗集，则有染者乃其内侄女，即绣漪也。此集卷四始见绣漪名，有《酬绣漪秋江两女侄赠别之作》第二首云：‘但收红泪酬师赐，不把青眵看世人。’语已可怪矣。卷十《问绣漪病》云：‘病中辛苦女文园，久不来过待月轩。’尚无狎语。卷十六而厥词遂放，其情难掩矣。卷十九附绣漪看月七绝，署名祝蕊，有云：‘一片秦台旧时月，为依移在绣帘间。’——总算没冤枉他做“风流双枪将”。

钱先生提及的《梵天庐丛录》，所记如下：“樊有妻妹，颜色殊美，樊不令嫁，时时作小周后之戏，妻颇难堪，遂与反目。在渭南时，姊妹争夕，共斗于大堂，邑人传为笑柄。……樊既强占其妻之妹矣，妻抵死不令居其室，妹乃出居于外，妻又访搜而搯之，妹不能堪，乃自嫁于某。樊怒，乃并其妻之女侄而亦占据，后竟彰明较著，列诸侧室，令仆役以姨太太呼之。”我从前以为“小说家言”，不大肯信，今得钱先生“言之凿凿”，

也只好“幡然改听”了。

评石遗诗

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里，说“无锡钱子泉”的“哲嗣默存”，“喜读余诗”；陈衍说、钱锺书记的《石语》里，陈衍又说：“世兄记老夫诗熟。”可以想见，陈衍于这位年轻人的恭维话，是颇为受用的；他绝不会料得到，“背地说的”原来是这样：“音节哑而不亮，尖而不圆，五古短篇、七绝多佳作，七律高调偶好，槎枒尤佳，似茶山、香山体则率颓矣。七古复初体皆佳，散原、海藏所不能为，有书卷、有议论、有聪明，惜格不高。七绝实渔洋体，学诚斋者不佳，不支空架是其特长。”（《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624页）

比这更不堪、陈衍见了必大怒的，是这位“世兄”长成后的批评：“石遗诗佳处，不过《江湖小集》、《桐江续集》，欲为清峭，则成率滑，欲为博奥，则成杂碎，调哑骨薄，七古尤不成语，有作意者语皆不妥。即如此首（按指《萧闲堂诗三百韵》），欲为排比铺张，哀感顽艳，而属对不工，使事不贴，支离竭蹶。”（《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五册第305页）对照着陈衍的“期许”：“以子之强志博览，不亟亟于尽发其覆，性情兴会有不弥广弥永独立自成一家者，吾不信也。”（见《石语》）我们凡夫俗子，觉得钱先生也太没人情了；不过，也许钱

先生认为，他是“人情归人情、批评归批评”，“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作低昂”（诸葛亮语）。

1937年，陈衍下世，钱先生做的挽诗说：“竹垞弘通学，桐江瘦淡诗。”自注：“先生诗学、诗格皆近方虚谷，时人不知有《桐江集》，徒以其撰诗话，遂拟之随园耳。”（《槐聚诗存》第16—17页）意见大致相同，只是语气之间，听起来多褒意。

补订：《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194—195页评方回诗：“其六十前诗不可得见，然六十后遽败坏至此，则早年拟议临摹之未有真得，可知尔已。卷二十七《赠叶宗贵一山》自负近诗‘颇通大道合自然，拙朴有馀巧不足’，吾睹其拙而滑矣，未睹其朴也，与随园、石遗晚岁诗殊相近。其斤斤说诗，修身不检，亦略似。惟袁、陈不讲道学（陈诗话续编欲改夏映厂赠诗‘程门’为‘苏门’，谓‘余不讲道学’），虚谷则居然朱子忠臣，斯其异耳。”又第256—257页录《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墨庄漫录》：予有友人相访，指案间荆公《日录》云：‘朴素不喜此书。’予问其说，客曰：‘凡称上曰某事如何，则曰予曰不然；凡称某事予曰如何，上曰极善。此尤可笑也。’”钱批：“按《石遗诗话》亦然。”

单眼皮

《猫》：“李太太从小对自己的面貌有两点不满意：皮肤不是上白，眼皮不双。……单眼皮呢，确是极大的缺陷，内心的丰富没有充分流露的工具，宛如大陆国没有海港，物产不易出口。进了学校，她才知道单眼皮是日本女人的国徽。”

在钱先生的手稿里，有一节“单眼皮考”，可为“旁笺”（语本《周易旁笺》）。《容安馆札记》第七百十七则：“黄庭坚《江城子》：‘省愁烦，泪休弹，哭损眼儿，不似旧时单。’（《全宋词》卷四十八）按杜安世《浣溪沙》：‘云如双鬓玉如颜，身材轻妙眼儿单。’晁元礼《滴滴金》：‘庞儿周正心儿得，眼儿单，鼻儿直，口儿香，发儿黑，脚儿一折。’（《全宋词》卷六十六）与吾国古画中仕女合观，则知近世方以重睑为美。”（第三册第 1743 页）

又第四十一则：“T. B. L. Webster, *Greek Art and Literature*, pp.7-8 引 Ibycus 诗中 ‘lovely-lidded’ (‘sleepy-eyed’)、复引 H. G. Payne, *Archaic Marble Sculpture*, p.38 说之云：‘The lids, thick and soft, disclose the eye beneath as the sad of poppy opens to disclose the flower.’ 当即《吕氏春秋·不屈篇》所谓‘烟视’，后世所谓‘星眼微饬’之态，然眼皮厚重，终身作此状，细思之，竟不知其佳处。”（第一册第 63 页）似乎是，钱先生是喜欢“单眼皮”的。

“不如偷不着”

《围城》第171页：“烤山薯这东西，本来像中国谚语里的私情男女，‘偷着不如偷不着’，香味比滋味好；你闻的时候，觉得非吃不可，真到嘴，也不过尔尔。”按《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十五则：“Ovid *Amores* Lib. II, xix, 33: ‘siqua volet regnare diu, deludat amantem.’ 按 Sir John Suckling 有 *Against Fruition* 二首，其一云：‘Tis expectation makes a blessing dear; /Heaven were not heaven, if we knew what it were.’ 其二云：‘Love’s camelion, that lives on mere air, /And surfeits when it comes to grosser fair.’ *Aglaura* I.V. 亦有一节，正与 Ovid 语相发明。此吾国‘偷著不如偷不著’之说也。”（第一册第178—179页）

又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658页《雪涛小说》：“盖闻里闾恶少有评风月之趣者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著不如偷不著。’”

蜂蝶慕香

吴文英《风入松》：“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名句传诵。《管锥编》第二册第629页引之，以说诗之“事物当对”（objective correlative），云：“不道‘犹闻’，而以寻花之蜂‘频探’示手香之‘凝’、‘留’，蜂即‘当对’闻香之‘事物’”

矣。”据一般常识，蜂蝶是不至慕手香的，梦窗此语，似乎有些“蛮做”。但细究之，亦有所本，并非随意的“杜撰”。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都中名姬楚莲香者，国色无双，时贵门子弟争相诣之。莲香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其香也。”梦窗之词，必用此典。又贺铸《踏莎行》：“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慕香”二字，也必是本此。

又《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九十六则：“梦窗《声声慢》云：‘膩粉阑干，犹闻凭袖香留。’按与《风入松》之‘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同意，而韵味远逊，此所以贵有 objective correlative 也。”（第二册第 1540 页）可以参观。

（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寒食帖考

稼轩《霜天晓角》词结云：“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为佳耳。”邓广铭《笺注》谓用晋人帖：“天气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为佳耳。”（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后来论者多沿袭其说。

钱先生《谈艺录》引宋张直夫《拙轩集》卷五《跋拣词》：辛待制《霜天晓角》词云云，用鲁公《寒食帖》：“天气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数日间，得且住为佳耳。”盖隐驳邓笺，以为非晋人语，乃颜鲁公帖也。其《手稿集》第六百三十六则，复直斥邓笺之谬：“邓注‘晋人帖’云云，妄甚。此颜鲁公帖也。……真卿此帖收入《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七。”参看《容安馆品藻录》。

余读稼轩词，于此蓄疑已久，不知邓笺据何书。钱先生纠之是也。近阅明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五“用晋人语入声律”条云：“晋人语一入声律，无不精妙。右军帖云……一帖：寒食近，得且住，为佳耳。辛幼安《玉蝴蝶》辞：‘试听呵，寒

食近也，且住为佳。’又《霜天晓角》云云，凡两用之，当是绝爱其语。”乃知此亦前人旧说，非邓氏发为谬论，特其未深考耳。钱先生之所纠，固有根据，然亦未考源流，邓氏若有知，亦恐未易悦服。

考真卿此帖，固见《全唐文》，然亦载《颜鲁公集》，钱先生未检。然要皆未足为据。盖此帖真伪，前人早有异辞，以为晋人帖者，亦非焦竑一人。宋李纲《梁溪集》卷八《学草书》云：“今日试临寒食帖，却疑羲献不难如。”是宋人已有作右军书者。明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二百六十一，收载此文，乃作无名氏《问行帖》，附按语辩云：“杨云此帖或以为真卿书，非也，乃真卿写晋人帖辞耳。或以为右军帖，亦无的证。故标以无名氏，附晋人杂帖云。”是此帖作者，并无定论。

又考鲁公此帖，虽寥寥二十许字，其用语却颇不同。收入鲁公集者，第三句作“寒食只数日间”，而以为晋人之帖者，则少三字作“寒食近”，复有一字之异。又据《玉蝴蝶》云：“寒食近也，且住为佳。”知稼轩所见未必非后者。至若邓笈之所据依，当是清徐电发《词苑丛谈》卷三所云：“天气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为佳耳。此晋人无名氏帖中语也。辛稼轩融化作《霜天晓角》词。晋人语本入妙，而词又融化之如此，可谓珠联璧照耳。”

（原刊《词学》第十五辑）

庾信愁赋考

姜夔《齐天乐·咏蟋蟀》起句：“庾郎先自吟愁赋。”夏承焘《笺校》云：“今本《庾子山集》无《愁赋》，前人谓白石此句杜撰。案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三十四）《文辨》，谓‘尝读庾氏诗赋，类不足观，而《愁赋》尤狂易可怪。’又刘辰翁《须溪词》《兰陵王·送春》亦云：‘更江令恨别，庾信愁赋。’似宋金人所见庾集实有《愁赋》。”新订版增云：“顷钱锺书先生见告：《愁赋》见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九下《愁乐门》。宋代王安石、黄庭坚、韩驹、薛季宣皆尝引此文。周邦彦《片玉集》五《宴清都》陈注亦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于此句下注云：“庾信有《愁赋》，今本庾集不载。《海录碎事》卷九下《愁乐门》：‘庾信《愁赋》曰：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另条：‘庾信《愁赋》：攻许愁城终不破，荡许愁门终不开。何物煮愁能得熟，何物烧愁能得然。闭门欲驱愁，愁终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周邦彦《片玉集》卷五《宴清都》词下陈注亦引下四句，‘闭门’作‘闭户’，余同。

是子山实有《愁赋》，当在庾集旧本中，故周姜云然。又《山谷内集》卷十九《四休居士诗》三首，注引《愁赋》凡十句，此下更有‘欷眠眼睫未尝搵，强戏眉头那得伸’两句。苏轼《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之三施注引《愁赋》：‘细酌榴花一两杯，荡彼愁门终不开。’按其次句与前引同，其首句又不似六朝人作，恐非赋之原文，附记于此。”

按上引夏笈俞注，徵引次第大略相同，夏笈自云出钱氏，则俞亦当从钱来，特未注明耳。检《宋诗选注》唐庚《春归》“无计驱愁得，还推到酒边”，有注云：“六朝时庾信有一篇《愁赋》（见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九下，倪璠注《庾开府全集》和严可均辑《全后周文》都没有收），里面说：‘闭户欲推愁，愁终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这篇赋似乎从汉代《焦氏易林》所谓‘忧来搔（亦作摇）足’、‘忧来扣门’等等（原注卷数，略）奇语推演出来，在宋代很流行。唐庚以外，像王安石、黄庭坚、黄叔达、沈与求、陈师道、晁说之、陈与义、贺铸、韩驹、曾几、朱翌、薛季宣、姜夔等等都用到它或引申它（以下为篇目出处，略），周邦彦《宴清都》、向子諲《生查子》、方千里《扫花游》、刘镇《水龙吟》、李彭老《踏莎行》、周密《长亭怨慢》、刘辰翁《兰陵王》等词里都把《愁赋》跟江淹《恨赋》或《别赋》并提；陈人杰《沁园春》又把它和张衡《四愁诗》并提。辛弃疾《稼轩词》丁集《鹧鸪天》：‘欲上高楼本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正用庾信语意。宋以后的作者就很少知道那篇赋了。”又《管锥编》第四册“愁赋”条云：

“庾信有《愁赋》一首，惟见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九《圣贤人事部》下，有‘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云云十数句，似非全文。严氏漏辑之，倪璠注《庾子山集》，祇不忍削除羸人之杨炯诸文，却了不知拾补。……晚唐、两宋诗词中常及之……不知何时佚失，遂尔淹没无闻。博雅如文廷式，其《纯常子枝语》卷四〇论周邦彦《玉楼春》，祇云：“‘庾郎愁’字乃是宋人常语。”据此，知搜得《愁赋》佚文，必为钱先生得意事。又据《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五百九十九则：“俞平伯校订《红楼梦》稿……余凡献替百许事。”又：“平伯诗学甚浅，其《读红楼梦笔记》中论第六十三回所引石湖诗，仅知‘铁门坎’为智永故事，余告以上下句皆用梵志诗，始恍然。”知俞氏著书，请益于钱，盖甚平常事也。

钱先生以辑考庾信《愁赋》，引为自喜之事，而不知庞石帚亦尝考此。其《养晴室笔记》卷一“庾信《愁赋》”条，引夏氏笺后加按云：“庾信《愁赋》，宋人注诸家诗集，尚引其文。《施注苏诗》（卷十八）《次韵乐著作送酒》有云：‘万斛羁愁都似雪。’《注》云：‘庾信《愁赋》：只将一寸心，能容万斛愁。’《冯注苏诗》（卷二十）云：‘王注：次公曰：“庾子山《愁赋》：唯将一寸心，贮此万斛愁。”’榴案王注与施注字句微异，因并存之。又此二句，见《海录碎事》。又任渊注《黄山谷集》、李壁注《王荆公集》，皆引此二句。后《次韵宋肇诗》王注又引作“庾信《赋》。”’《施注苏诗》（卷二十）《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其第三首有云：‘旅愁非酒不可开。’《注》云：‘庾信

《愁赋》：细酌榴花一两杯，荡破愁门终不开。’《冯注苏诗》（卷三十一）：‘榴案任天社注《黄山谷诗》、李雁湖注《王荆公诗》并引庾信《愁赋》：攻许愁城终不破，荡许愁门终不开。亦见《海录碎事》。’《渊鉴类函》卷二百六十五引庾信《愁赋》曰：‘攻许愁城终不破，荡许愁门终不开。何物煮愁能得熟，何物烧愁能得然？开门欲去愁，愁终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据此，知庞氏未睹《海录碎事》，否则无须转引《渊鉴类函》，且亦不提《宋诗选注》，当是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者也。

又前引钱氏语，谓宋以后作者鲜知此赋云云，实则南宋大家已有不知者。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云：“荆公诗云：‘闭户欲推愁，愁终不肯去。’刘宾客诗云：‘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韩舍人子苍取作一联云：‘推愁不去还相觅，与老无期稍见侵。’”按王句出《自遣》，见《王荆公诗注》卷四，正用《愁赋》成句，而陆游浑然不觉，则其未读《愁赋》可知，故至南宋时，知《愁赋》者或亦渐鲜矣。

又刘永翔先生见告，《管锥编》云“惟见《海录碎事》”，检《记纂渊海》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影宋本）、《类说》卷六十、《绀珠集》卷十三，均载其佚文，则知此赋虽失传，而宋人人类书中犹常见，固不必仅据叶廷珪书也。

（原刊《词学》第十七辑）

补订：陈锐《裒碧斋词话》“论姜张词之弊”条：“古人文字，难可吹求。……姜尧章《齐天乐》咏蟋蟀，最为有名，然开口便说庾郎《愁赋》，捏造典故。”汪辟疆《方湖日记幸存录》“词重想象贵清空”条，为姜词辨释，而云：“开口便说庾郎愁赋，即指《哀江南》一篇。以虚词笼罩全局，而通首之哀音愁绪，由蟋蟀与闻蟋蟀者引出更深之感觉，则非有此虚笔透露，不能揭一篇之主旨矣。是庾郎愁赋不必有蟋蟀典实，正可以意得之。”是均不知庾确有《愁赋》也。

读钱偶笺

《谈艺录》（补订本）第46—47页，论宋以后祖构昌谷诸家，独推谢皋羽“能立意而不为词夺”，并云：“试以长吉《鸿门宴》，较之宋刘翰《鸿门宴》、皋羽《鸿门宴》、铁崖《鸿门会》，则皋羽之作最短，良由意有所归，无须铺比词费也。”按杨慎《升庵诗话》卷十四“谢皋羽诗”条有云：“谢皋羽《晞发集》诗，皆精致奇峭，有唐人风，未可例于宋视之也。予尤爱其《鸿门宴》一篇：‘天云属地汗流宇，杯影龙蛇分汉楚。楚人起舞本为楚，中有楚人为汉舞。鹧鸪淬光雌不语，楚国孤臣泣俘虏。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终闻楚歌。’此诗虽使李贺复生，亦当心服。李贺集中亦有《鸿门宴》一篇，不及此远甚，可谓青出于蓝矣。元杨廉夫乐府追李贺，亦有此篇，愈不及皋羽矣。”

《谈艺录》（补订本）第52页：“惟《宫娃歌》之‘啼蛄弔月钩阑下’，《将进酒》之‘烹龙炮凤玉脂泣’，一则写景幽凄，一则绘声奇切，真化工之笔矣。”第376页复进而揭长吉

用“弔”字来历：“昌黎《秋怀》之五云：‘露泫秋树高，虫弔寒夜永’，即长吉‘啼蛄弔月’之‘弔’。钱仲文《效古秋夜长》云：‘檐前碧云静如水，月弔栖乌啼鸟起’，则‘弔’非谓哀伤，而谓引致，……‘月弔’之‘弔’通‘钓’，钩牵也，如唐彦谦《索虾》所谓‘钓诗’。”按此亦本杨慎。《升庵诗话》卷一“弔月”条：“钱起诗：‘月弔啼乌寒鸦起。’李贺：‘蟋蛄弔月曲栏下。’”杨慎以贺诗“弔”字本之考功，钱先生不以为然，以为是从昌黎诗来，而不知昌黎亦从孟东野《李少府厅弔李元宾遗字》“斜月弔空壁”来也。

《谈艺录》（补订本）第297页：“余曩遇南北数老宿，皆甚称陈太初沆《诗比兴笺》。取而观之，异乎所闻。”按所谓“数老宿”，陈衍必是其一。《石遗室诗话》卷三云：“蕲水陈太初先生沆之《诗比兴笺》，真能拨云雾而睹青天，缒幽深而出井底，由先生既深于诗功，核于史事，而胸次雅亮，文笔高洁，又足以发明之。学诗者不可不肄业及之也。”又第300页驳陈氏论庾信，有云：“陈氏所引杜诗，一见《咏怀古迹》：‘庾信哀时更萧瑟，暮年词赋动江关’，一见《戏为六绝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皆明指词赋说。若少陵评子山诗，则《春日怀李白》固云：‘清新庾开府。’下语极有分寸。”按陈氏引杜诗有误，“暮年词赋”当作“暮年诗赋”。杜集通行诸本，无不尽然，检黎庶昌辑《古逸丛书》、张元济辑《续古逸丛书》中杜诗宋本，亦无异文。且此首第六句作“词客哀时且未还”，少陵“老去渐于诗律细”，安

至隔句即用字重见？钱先生沿陈氏误而不察，故“皆明指词赋言”云云，遂成蹈虚之论。

《管锥编》第一册第67—68页论《诗经·卷耳》：“作诗之人不必即诗中所咏之人，妇与夫皆诗中人，诗人代言其情事，故各曰‘我’。首章托为思妇之词，‘嗟我’之‘我’，思妇自称也；……二、三、四章托为劳人之词，‘我马’、‘我仆’、‘我酌’之‘我’，劳人自称也；‘维以不永怀、永伤’，谓以酒自遣离忧。思妇一章而劳人三章者，重言以明征夫况瘁，非女手拮据可比，夫为一篇之主而妇为宾也。男女两人处两地而情事一时，批尾家谓之‘双管齐下’，章回小说谓之‘话分两头’，《红楼梦》第五四回王凤姐仿‘说书’所谓：‘一张口难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按俞平伯《读诗札记》论此诗云：“作为民间恋歌读，首章写思妇，二至四章写征夫，均系直写，并非代词。当携筐采绿者徘徊巷陌、回肠荡气之时，正征人策马盘旋、度越关山之顷。两两相映，境殊而情却同，事异而怨则一。由彼念此固可；由此念彼亦可；不入忆念，客观地相映发亦可。所谓‘向天涯一样缠绵，各自飘零’者，或有当诗人之旨乎？”其意与钱解若合符节，唯不及钱解之深且透耳。俞文初作于1923年，后1934年由北京人文书局出版，与钱书相隔已四五十年，钱先生必是无心闇合，而非有意相袭也。

《管锥编》第二册第489页：“黄庭坚《六月十七日昼寝》：‘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见沧洲白鸟双；马啮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沧洲结想，马啮造因，想因合而幻为风雨清凉之

境，稍解烦热而偿愿欲。二十八字中曲尽梦理。《楞严经》卷四谓重睡人眠熟，其家人捣练舂米，‘其人梦中闻舂捣声，别作他物，或为声鼓，或为撞钟’；《山谷内集》卷一一任渊注引此经而复申之曰：‘闻马齧草声，遂成此梦也。……以言江湖念深，兼想与因，遂成此梦。’任注补益，庶无贖义，以《楞严》仅言因而未及想，只得诗之半也。”按此因论梦顺笔及之，实则《谈艺录》第251—253页早揭斯旨，视此分析更加细致，《谈艺录》引言自谓“壮悔滋深，藏拙为幸”，后来“未尝稍及此书”，故此遂不言参见。后并详举与山谷机杼略同者七例，陆游名篇《十月四日风雨大作》却筛眼走漏：“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第二句是想，第三句是因，第四句兼想与因，合凑成梦，脉络无乎不同。

《管锥编》第三册第905—906页：“《七发》：‘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战国策》中游说，如《秦策》一苏秦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楚策》一说楚惠王、《赵策》二说赵王、《齐策》一说齐宣王等仿是，犹地理图也。词赋中写四至，则意在作风景画耳。卷二一司马相如《子虚赋》：‘其东则有蕙圃衡兰云云，其南则有平原广泽云云，其西则有涌泉清池云云，其北则有阴林巨树云云。’……后汉以还，张衡《西京赋》，冯衍《显志赋》、刘劭《赵都赋》、左思《蜀都赋》之属，相沿成习。他体亦复踵事，如张衡《四愁诗》、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王中《头陀寺碑

文》、苏轼《李氏园》及《登常山绝顶广雨亭》，而鲍照《书》尤振绝，一扫平铺板列之陋。吴质《在元城与魏太子笺》因地及史，不顾四方，缅怀百世，能破窠臼；习凿齿《与桓秘书书》师法之。苏轼《超然台记》中‘南望马耳常山’一节、又《赤壁赋》中‘西望夏口、东望武昌’一节，皆脍炙人口，实即吴、习两《书》机杼也。”按第1073—1074页，亦云习凿齿《书》师吴质《与魏太子笺》，谓见唐覲《延州笔记》卷四。又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〇、王懋《野客丛书》卷一四谓宋人诸记祖构习书。均可参看。又，此节之意，陈衍亦早发其端，钱先生特踵事增华耳。《石遗室论文》卷五云：“古人文字凡属地理者每言四至。《禹贡》言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左传》言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又言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云云，皆言其盛时也。若崤之战蹇叔送其子曰：‘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则望古洒泪之辞。东坡本之以作《凌虚台记》云：‘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其西则汉武之长杨五柞，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闳极伟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又本之以作《超然台记》云：‘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之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

息，思淮阴之功，而弔其不终。’又本之以作《赤壁赋》曰：
‘东望夏口，西望武昌。’皆抚今弔古，感慨系之。但屡用之，
亦足取厌。”

（原刊《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三辑）

读《管锥编》札记

此篇作于十年前，时余方读博士学位，有某君编刊物，要余撰一文，乃检诸笔记，汇而录之，都二万馀字，以塞责焉。后临时被削去，余亦事冗心烦，弃之篋衍，久不复视。庚寅、辛卯间，以友人怂恿，刺取十数则，敷为《随手札》，刊诸《上海书评》。此则其贖稿也。癸巳初春记。

第 15—16 页，泰卦为人中之说，始自元杨瑀《山居新语》，陶宗仪《辍耕录》、赵台鼎《脉望》、郎瑛《七修类稿》、王弘撰《山志》等，皆采其说。第五册第 3 页，又补引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一〇《食物纂要序》，云“亦袭人身九窍为‘泰卦’之说”。○按：杨瑀此说，明清间颇流行，如明陈师《禅寄笔谈》卷七、王肯堂《证治准绳·幼科》卷八十八“心脏门”（误为赵孟頫说）、傅山《霜红龕集》卷三十七《杂记二》、清阮葵生《茶馀客话》卷十八、薛传均《牒鯖小纪》“人中”条、郑光祖《醒世一斑录》卷三“人身”条，均袭之。又近人姚灵犀《思无

邪小记》引之，又补引蒋矩亭言（详下）。

又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 603 页《虫鸣漫录》：“论人身乃一泰卦，故人中在口鼻之间。蒋矩亭因余所论，添一笑谈，谓双窍单用，单窍双用。如耳听、目视、鼻嗅，只有一能；口能言而兼饮食，肾小便而兼生育。惟谷道虽一用，而可作龙阳，亦属双用。”

又，《逸周书·武顺解》：“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两”，谢墉注：“皆下体形象”；曹籀《古文原始》据此遂谓《说文》“中、和也”之“和”字乃“私”字之讹。则非人面之“人中”，而如《通志·六书略》五《论象形之感》所释“厶”、“了”二字，略同西方旧日恶谑之“人中”。○按：此节所论，当袭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曹籀《籀书》二卷……有释中字者一首，以中为男子之私，象形字，人尤以为怪异。余谓此实有据，惟籀不能援引，其所言多妄耳。《逸周书·武顺解》云：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两争曰弱，参和为强。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两，五以成室，室成以生民，民生以度。孔晁注云：有中必有两，故曰参；阳奇阴耦，五谓相配成室。近儒谢氏墉申之云：有中无中即谓男女，皆以形体言之。男成三，女成两，皆下体形象。……《左传》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汉书·律历志》曰：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凡此皆中字最初之诂。……以中字为象形者，

较之取△字为象形者，浅深迥判矣。”《籀书》凡八卷，并无释中字篇，此说唯见《古文原始》，不知越縵何所据。曹初名金籀，字葛民，浙江仁和人；生平事迹，略见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又所谓“曹老人”，为谭献轻曹语，见《复堂日记》卷二。

第70页，解《诗经·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云：《说文》：“媠：巧也，一曰女子笑貌；《诗》曰：‘桃之媠媠’”；王闿运《湘绮楼日记》：“《说文》‘媠’字引《诗》‘桃之夭夭’，以证‘媠’为女笑之貌，明‘芙’即‘笑’字。隶书‘竹’、‘艹’互用，今遂不知‘笑’即‘芙’字，而妄附‘笑’于‘竹’部”。盖“夭夭”乃比喻之词，亦形容花之娇好，非指桃树之“少壮”。李商隐《即目》：“夭桃唯是笑，舞蝶不空飞”，“夭”即是“笑”，正如“舞”即是“飞”；又《嘲桃》：“无赖夭桃面，平明露井东，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具得圣解。○按：杨荫杭《说笑（一）》云：“今经典中‘笑’字固皆应作‘芙’，然其本字则为‘媠’。《说文》：‘媠，巧也。《诗》曰：‘桃之媠媠’，女子笑貌，从女芙声。’观此知《说文》非无‘笑’字，‘媠’字即‘笑’字也。‘媠’‘巧’以迭韵为训，犹‘户’‘护’‘尾’‘微’之例。女子笑貌乃其本义。此笑貌之‘笑’，本亦作‘芙’；以当时惯用之‘芙’，解本字之‘媠’。”又云：“《论语》‘夭夭如’，皇疏释为‘貌舒’，貌舒有笑意。知《论语》‘夭夭’亦媠媠之借。《说文》引《诗》‘桃之媠媠’，正用‘媠’

字本义，犹后世诗家言‘桃花笑、桃李笑’耳。”（见杨绛整理《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3—384 页）翁婿之说，不谋而合。翁解“桃之夭夭”犹诗家言“桃花笑”，亦可当婿之所谓“圣解”也。

第 85—86 页，“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正义》：“狐色皆赤，乌色皆黑，喻卫之君臣皆恶也。”按今谚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按：吴騫《尖阳丛笔》引《读诗略记》云：“晋成公绥《乌赋》序曰：乌之为瑞久矣，以其反哺识养，故为吉鸟。《汉书》：御史府有‘朝夕乌’，去数月，而御史大夫罢。《唐书》：柳仲理每迁官，必乌集其第。是汉唐以前，皆以乌为祥也。狐为妖，以喻小人；乌为祥，以喻君子。赤者其色显，黑色其色晦。‘莫赤匪狐’，以喻显者皆小人；‘莫黑匪乌’，以喻晦者皆君子也。”吴氏按云：“晋何準宅女生之夕，群乌啼，女后为晋穆帝后，册立之夕，群乌复啼。是晋时亦以乌为吉鸟也。”别为一说，可参。

第 88 页，《诗经·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引《水经注》卷九《淇水》：“《诗》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以为楫；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馀万，以输军资。今通望淇川，并无此物，唯王刍编草，不异毛兴。”后来如宋莘《筠廊偶笔》、陈锡璐《黄嬭馀话》卷三、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二三《过淇川》第一首等皆道淇

奥无竹，均不知酈道元已早言此。○按：洪迈《容斋随笔》卷六“绿竹青青”条，引毛传、韩诗及郭璞区别王薊、蔕竹二物，云：“按此诸说，皆北人不见竹之语耳。《汉书》：‘下淇园之竹为捷。’寇恂为河内太守，伐淇园竹为矢百馀万。卫诗又有‘籊籊竹竿，以钓于淇’之句，所谓绿竹，岂不明甚？若白脚莎、菘豆，安得云猗猗青青哉？”实即暗袭《水经注》卷九。宋莘、程晋芳等不知者，洪迈早知且笔采及之矣。

第 117 页，苏轼《大风留金山两日》：“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冯应榴合注引查慎行曰：“下句即铃音也。”此二者声意参印，铃不仅作响，抑且能“语”。○按：严元照《蕙櫨杂记》云：“东坡诗‘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抱经先生曰：颠风句，曼声读之，便肖铃声。竹汀先生曰：颠当、断渡，皆双声字。”陈曾寿《读广雅堂诗随笔》云：“用事有二类：一神化无迹，一比附精切。……如东坡《大风留金山二日》诗：‘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用佛图澄事。而‘明日’句即是铃语，想入非非，尤妙在‘颠当’两字双声，恰是铃声，人巧极而天工错也。此等用典，不能复以用典论，我用典而非典役我也。”（《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三号）赏心所在，无乎不同。

第 145 页，《豆棚闲话》载《边调曲儿》：“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

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饿杀。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按：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折《滚绣球》云：“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亦所谓怨天、诅天之什，似当补引。

第180页，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狐突叹曰：‘……虽欲勉之，狄可尽乎？’……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尽敌而反，狄可尽乎？虽尽敌，犹有内讷，不如违之’”；《注》：“‘曰’，公词”。按观先丹木之语，则知晋侯必曾面命申生“尽敌而反”，狐突“敌可尽乎？”一语，亦即针对晋侯之命而发。先此献公面命申生一段情事，不加叙述，而以傍人语中一“曰”字达之，《史通·叙事》篇赞《左传》：“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事外”，此可以当之。○按：此论文章叙事“包蕴事实”之法，抉发作者文心，洵属中肯。可参观《读拉奥孔》（见《七缀集》）。然考钱先生此说，似亦非其创论，实从金圣叹批《西厢记》来，而所言更透辟耳。《西厢记》卷一“借厢”《粉蝶儿》“不做周方，怨杀你个法聪和尚”句，圣叹批云：二语写张生通夜无眠，盘算天明入寺见法聪，如何借厢，设为自问自答之语。及明日真见聪，“便发极云：不做周方，我必埋怨杀你！盖聪闻之则斗然惊焉。何则？张生固未尝先云借

房，则聪殊不知其‘不做周方’之为何语也。张生未尝先云借房，而乃发极云‘不做周方’者，此其一夜心问口、口问心，既经百千万遍，则更不计他人之知与不知也。只此起头一笔二句十三字，便将张生一夜无眠，尽根极底，生描活见。所谓用笔在未用笔前，其妙则至于此。”又云：“是惟《左传》往往有之。”（见《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四）据钱所引例观之，圣叹语固无虚也。

第 270—271 页，论“亡秦者胡”事，历举《北齐书·恩幸传》、《晋书·元帝纪》、《五代史补》等；又第五册第 152 页，复增引《宋书·索虏传》一事。○按：刘继庄《广阳杂记》卷二：“元以讖文有朱明字，乃于（衡山）朱明峰下，截断龙脉，引水过庙后，又建黑水祠以卫赤帝，不知太祖以朱氏起兵灭元，国号有明，应实在彼而不在此也。”亦“亡夏者桀”、“亡秦者胡”之类，可连类而及。

第 279 页，论引碑证史，“阎若璩《潜邱札记》卷二论六朝人始以金石遗文于经史正讹补阙，举《史记·儒林传》张晏注引伏生碑以证其名‘胜’等为例”，司马贞《史记索隐》“正用此法”。○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七：“墓碑最盛于东汉，别传则盛于汉魏之间。张晏注《史记》，据墓碑知伏生名胜；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据班固泗上亭长碑知昭灵夫人姓温；裴松之注《三国志》，亦多引别传。其遗文佚事，往往补正史所不

及。”已先发之。

第 280 页，论刘媪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引宋人《昭灵夫人祠》诗云：“杀翁分我一杯羹，龙种由来事杳冥。安用生儿作刘季，暮年无骨葬昭灵！”意谓汉高既号“龙种”，即非太公之子，宜于阿翁无骨肉情，运古颇能翻新。○按：孙原湘《矻山》结云：“竖儒何足知英雄，谓以俎肉弃乃翁。君不见蛟龙白日与媪遇，龙种何曾属太公！”（见《天真阁诗集》卷二）亦同此意。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四“一杯羹”条引孙诗，许为“奇论闢空，得未曾有”，不知宋人早发之矣。

第 301 页，论“将相买田宅”，用以自污，始《战国策·赵策》一腹击。○按：陈师道《后山谈丛》卷四：“乖崖在陈，一日方食，进奏报至，且食且读，既而抵案恸哭久之。哭止，复弹指久之，弹止，骂詈久之，乃丁晋公逐莱公也。乖崖知祸必及己，乃延三大户于便坐，与之博，袖间出彩骰子，胜其一坐，乃买田宅为归计以自污。晋公闻之，亦不害也。”洪迈《容斋随笔》卷八“谈丛失实”条则驳之，以为非事实。

又：“《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括得‘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其母论此为‘不可使将’之证：则观迹略同，用心处境迥殊。”○按：《李将军列传》：“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馀年，家无馀财，终不言家产事”。《卫将军、骠骑列传》：“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

灭，无以家为也。’”亦可参。

第 310 页，论韩非口吃。○按：《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汉书》曰：鲁恭王馀口吃难言。又曰：马相如吃而善著书。又曰：扬雄为人简易，口不能剧谈。郑玄《自序》曰：赵商子字子声，河内温人。博学有秀才，能讲难，而吃不能剧谈。……《新序》曰：周昌者，沛人……昌为人吃。《世说》曰：魏明帝口吃少言，而内明断。《世说》曰：邓艾口吃，语称艾艾。”宋赵崇绚《鸡肋》“口吃人”条：“韩非、司马相如、扬雄、周昌、鲁恭王、魏明帝、邓艾、宋孔颢、周卢柔、郑伟、隋卢楚、唐李固言、南唐孙盛。”清袁栋《书隐丛说》卷十九“口吃”条：“古来口吃人，周韩非，汉司马相如、周昌、杨雄、鲁恭王，魏明帝、邓艾、成公绥，宋孔颢，周卢柔、郑伟，隋卢楚，唐李固言、陆贽、陆羽、卢携、孟郊、丁棱，南唐孙盛。”又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五：“古今文人多口吃。近人如林墩谷、如鹤柴，今之相如、子云也。”

又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 157 页亦论此事，可参观。

第 319 页，写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冲冠”，是何意态雄且杰！《晋书·王逊传》：“怒髮冲冠，冠为之裂”，直类《史通》外篇《暗惑》所讥“文鸯侍讲，殿瓦皆飞”，拾牙慧而复欲出头地，反成笑柄。○按：“怒髮上冲冠”，非迁自铸语。《战国策·燕策》三：“复为忼慨羽声，士皆瞋目，髮尽上冲冠。”

又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 543 页陆以湑《冷庐杂识》：“《史记》蔺相如‘怒髮冲冠’，《晋书·王逊传》袭之，而增一语曰：‘冠为之裂。’则近拙矣。”（《冷庐杂识》卷一“形容失实”条：“史传有形容失实之语，如《史记·蔺相如传》记相如持璧却立倚柱，则曰‘怒髮上冲冠’；……描摹传神之笔。事虽虚而不觉其虚，弥觉其妙，此龙门笔法所以独有千古也。《晋书·王逊传》袭其语而增一句，曰‘怒髮冲冠，冠为之裂’，则近于拙矣。”《笔记》节抄之）知钱语本陆书。

第 352 页，李广射石事，引泷川《考证》、《韩诗外传》、《新序·杂事》、吴曾《能改斋漫录》、戴埴《鼠璞》、刘昌诗《芦浦笔记》、顾炎武《日知录》等。○按：谢肇淛《文海披沙》卷四“见石以为伏虎”条，黄生《义府》卷下“饮羽”条，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九“射石没羽有四人”条，俞樾《曲园杂纂》卷三十四“李广射石”条，亦俱及此事，钱先生漏举。

第 659 页，王梵志诗“城外土馒头”，为黄庭坚称引，人所熟知云云。○按：惠洪《冷斋夜话》卷十云：“梵志诗曰：城外土馒头，餂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鲁直曰：既是餂草，何缘更知滋味？易之曰：预先以酒浇，且图有滋味。”又《续墨客挥犀》卷一亦载此，自是袭《冷斋夜话》也。

又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 648 页《王梵志诗》：“又山谷诗注引‘城外土馒头’云云。”检山谷诗注，未

见；钱先生误忆。

第 738 页，动箎问国学博士，孔子弟子“达者七十二人，几人已着冠？几人未着冠？”博士不能答；动箎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按皇侃《论语义疏·先进》此章疏云：“或云……‘五六’三十人也……‘六七’四十二人也；……合为七十二人也，孔门升堂者七十二人也。”此解汉世夙有，《太平御览》卷五二六引《汉旧仪》：“礼后稷于东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按：乔松年《萝摩亭札记》卷二云：“北齐石动箎戏谓：孔门七十二贤，当是已冠三十人，未冠四十二人。盖以‘冠者五六’、‘童子六七’为谐语也。然《汉旧仪》载，雩祀舞人七十二，冠者三十人，童子四十二人。恰与动箎之言闇合。（宋程大昌说。）汉人注‘风乎雩’，谓‘雩、祭’，且谓‘浴沂，取象龙出水中’，其以三十与四十二分舞人已冠未冠之数，正取‘冠者五六’、‘童子六七’之义。”按程说见《考古编》卷八。又王国维《二牖轩随录》卷一云：“皇侃《义疏》所载一说，已作是解，其言曰：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人就三十，合为七十二人也。孔门升堂者七十二人也。乃知优人诙谐，亦有所本。又按《太平御览·礼仪部》引《汉旧仪》曰：‘礼后稷于东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为民祈农报功。’则

汉人已为此解，当为皇侃所引或说所自出。”其所考证，与程、乔略同，或即杂抄沿袭，非索隐发覆也。钱先生或未睹王录，然程大昌、乔松年书，固常涉猎浏览者，不知何竟漏却？又考此事，明人书亦多载之，如江盈科《雪涛谐史》、冯梦龙《笑府》、曹臣《舌华录》、张岱《快园道古》等，其源皆出于此。

第 753 页，余所见汉、唐镜皆铜铸，《广记》卷一六六《杨素》记破镜为两半，非有削金铁如泥之利器不办，已大非易事，《启颜录》言壁上镜堕地分二片，更难想象；旧藏古镜十数枚，尝戏一一掷诸地，了无损裂。疑冰莫涣，当见博古或博物者而叩之。○按：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五“日本刀”条：“温公《日本刀歌》有‘黄白间杂输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句。自注云：‘贾人云真输似金，真铜似银。’予尝见唐破镜，破处晶莹类白金，读此始恍然。”

第 793 页，师号“先生”，《管子·弟子职》中已九见，唐人诗文中惯用，相沿迄今。以下历举唐诗文例。○按：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四“先生释义”，已详考称师为“先生”之源流。其略云：《释名》言古者称师曰“先生”。《管子·弟子职》云“先生施教”，“先生乃作”，“先生乃坐”，“先生将食”，“先生已食”，“先生有命”，“先生欲作”，“先生将息”，“先生已息”，是也。师称先生见于书者，若《弟子职》。又《大戴礼·五帝德》云：“汝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列子·黄帝篇》云，神巫谓列

子曰“子之先生”。墨子弟子称墨子“先生”。孟子弟子乐正子曰：“先生何为出此言？”是也。钱先生所云“已九见”，即俞所详引者；所举唐诗文例，始补俞说所未及耳。

第 805 页，《鬼谷子·内捷》、《邓析子·无厚》皆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第 878 页亦谓此语出《鬼谷子·内捷》、《邓析子·无厚》及《抱朴子·广譬》。○按：此二句，亦《文心雕龙》所引之文。近人李详以为语本《抱朴子·广譬》，见其《黄注补正》。又其《媿生丛录》卷一：“《文心雕龙·知音篇》：‘古来知音，多贱今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按《抱朴子·广譬篇》：‘贵远而贱近者，常人之恒愆也；信耳而遗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叹息于韩非之书而想其为人，汉武慷慨于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终不能拔。或纳谗而诛之，或放之乎冗散。’彦和之言，与之相似。”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卷十则驳云：“自古致慨于此者夥矣，初不第葛洪、刘勰始有此论也。大抵读书识字之人，多识前言往行，事必师古，语必称先。”并博引《庄子》、《淮南子》、《论衡》等，而终未弋获其源。又范文澜、詹鍈注《文心雕龙》，亦均仅谓出《鬼谷子》，而不知《邓析子》亦载其语也。

第 918—920 页，论杨贵《报祁侯缙它书》，引《野客丛书》

卷二五论汉“丧葬过制”，后云：《晋书·索綝传》记愍帝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汉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对：“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充山陵。汉武帝殁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二陵是俭者耳。”是霸陵终未得“完”，且非如张释之所谏“中无可欲”者。白居易《新乐府·草茫茫》：“骊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盗掘坟陵破。……奢者狼藉俭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凭君回首向南望，汉文葬在霸陵原”；鲍溶《经秦皇墓》、《倚瑟行》等亦发挥此意。诗家兴到落笔，似仅读《三国志·魏文纪》，不读《晋书·索綝传》，故中唐人而为汉文、宣二陵未发前之魏、晋人语也。○按：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五“文帝薄葬”条云：“汉文帝遗诏，霸陵山中，因其故，无有所改，示从俭也。班固赞：‘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刘向亦曰：‘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谓知帝矣。观《晋·索綝传》，不能无疑。三秦人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晋帝问綝曰：‘汉陵中物何多邪？’綝对以‘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木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金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仆观此说，以谓武帝固应如是，多藏金钱财物，已见于贡禹所陈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贡禹‘杜陵宫人数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节俭，人无间言，临终遗至薄之制，微至铜锡不以

为饰，炳然载诸史册，以薄送终，而山陵中畜积如此之富，是不可晓。得非景帝违治命之意乎？又考《晋·愍帝纪》：‘建兴二年，盗发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采帛不可胜计，敕收其馀以实内库。’可验畜积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赋曰：‘咄嗟骊山之阜，惆怅霸陵之原。文若俭而无隙，嬴发掘其何言。’鲍溶诗曰：‘俭风本自张廷尉，霸陵一代无毁发。’白居易诗亦曰：‘骊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盗掘坟陵破。可怜宝玉归人间，暂借泉中买身祸。奢者狼狽俭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凭君回首向南望，汉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则霸陵初未尝发也，不知前说何以纷纭如此。”据此，知钱先生引《索綝传》、鲍、白二诗，与《野客丛书》全同，并议论亦取于王也。

第 1028 页，论郑玄《戒子益恩书》，谓：《后汉书》本传载此书，所言与《全唐文》卷三三〇史承节《郑康成祠碑》多不合；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七《金承安重刻唐万岁通天史承节撰后汉大司农郑公碑跋》、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皆据《碑》以纠《书》中讹脱。《书》云：“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邦”，《碑》无“不”字，一文之差，尤非等闲。《隋书·儒林传》刘炫自为《赞》曰：“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亦“薄言胸臆”，有曰：“家业贫窶，为父兄所饶，厕晋绅之末，遂得博览典诰”，显为仿郑《书》语，可证“不为父母”之误衍“不”字也。○按：钱先生此节之意，在以后人文字，为阮、俞

说添一证。实则《癸巳存稿》中，已引《北齐书·樊逊传》：“逊少学，常为兄仲优饶。既而自责曰：‘名为人弟，独受安逸，可无愧于心乎？’”《隋书·刘光伯传》自序：“性本愚蔽，家业窳，为父兄所饶，厕缙绅之末。”谓“其语皆仿郑书为之”，正钱先生所引《儒林传》赞之比。又按：陈鱣《元本后汉书跋》云：“今本《郑康成传》云：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是本无不字，与唐史承节所撰《郑公碑》合。吾师阮抚使《山左金石考》云：为父母群弟所容，犹言幸为亲包覆成就，盖不欲举亲之失如此。自后校书者因前不乐为吏，父数怒之，遂疑此书为父母群弟所容为不相合，辄妄加不字，踵谬至今。是碑远胜今本《后汉书》。鱣今得见元本《后汉书》，无不字，斯可宝二也。”（见《简庄文抄》卷三）以元本与唐碑互证。揆诸钱书体例，似亦当徵引之，以博其趣。

第 1046—1047 页，解“哀感顽艳”，斥况周颐为强作解事，谓顽、艳指人物而非状声音；又引陈维崧《杜辍耕哭弟诗草序》“感顽艳，察贞淫”，以为“尚未乖正解”。○按：卢文弨序吴騫《蠡塘渔乃》云：“取举棹相和之遗音，播扣舷抗声之绝调，童孺皆知，顽艳均感。”以“顽艳”对“童孺”，亦“未乖正解”。此序《抱经堂集》不收，见吴氏《拜经楼诗话续编》卷一引。又史泽山《麝尘集序》：“唐玉溪生集，托意遥深，感均顽艳。”（见史久榕《麝尘集》卷首）史，晚清人。

第 1063—1064 页，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子邻传》：“师但先去，某乃影随”，又卷二七《含光传》：“不空却回西域，光亦影随”；修词新颖，外书未见。○按：贾谊《过秦论》：“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景”即“影”字，“景从”即“影随”。又《文心雕龙·杂文》：“左思《七讽》以下，枝附影从。”云外书未见，蒙所未解。

第 1126 页，“书之楷与草，犹文之骈与散、诗之律与古，二体相较，均前者难作而易工，后者易作而难工耳”。○按：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吴冠山先生言：‘散文如围棋，易学而难工；骈体文如象棋，难学而易工。’余谓古诗如象棋，近体如围棋。”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第七条：“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近体诗易学而难工，古体诗难学而易工（按：此二句不可解，疑‘近体’、‘古体’当互乙；前引《随园诗话》亦然。章学诚《章氏遗书补遗·与邵二雲论文》云：‘古文之于制义，犹试律之于古诗也；近体之于古诗，犹骈丽之于散行也。’所比拟是也，可参）。小令易学而难工，长调难学而易工。”

第 1129 页，卢谿《尚书武强侯卢府君诔》：“谿罪重五岳，衅深四海，身不灰灭，延于家门。”按余三十岁前，常见人死讣告，《哀启》附以《行述》，遭亲丧者必有套语：“不自殒灭，祸延显考（妣）”等。千篇一律，不知俗成格定，当在何时。○

按：乔松年《萝摩亭札记》卷七云：“今世诂书发端，必用‘罪孽深重，不自殒灭’语。语见欧阳文忠与弟书。”又罗振玉《俗说》亦谓见欧书，见《雪堂类稿》甲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今检欧集不载此书，不知其所见何本。

又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137页：“按《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一日：‘陈幼铭革职，或为联云：‘不自殒灭，祸延显考。’一若明以来四百年俗套诂文，专为此用，亦绝世佳文也。’云云。正言散原耳。”是王闿运以为此套语，始于明也。

第1240—1242页，论习凿齿《晋承汉统论》，谓自刘知几《史通》称此论以来，“正统”、“闰位”遂成史论一大题目。又列举其“睹记所及”，自皇甫湜《正闰论》迄鲁一同《正统论》，凡二十余篇，以为读此便可“得其涯略”。○按：晚近学者论及“正统论”者，有蒙文通《肤浅小书》、柳诒徵《国史要义》。柳书尤详列各家之说，其所举书，虽未及钱先生之广，而筌路蓝缕，有足多者。钱先生同时学者，则有饶宗颐撰《中国历史上之正统论》，作年在1973年前后，其旁搜远绍，用力勤劬，为此题专门之书。钱先生必未睹，然钱先生所及者，如梁玉绳《瞥记》、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等，仍为饶所挂漏，足见钱先生之博洽，殆难企及。有为饶书作弁言者，谓以“正统论”为题著论，近数十年来，仅饶氏一人。真可谓“随口乱道”。《颜氏家训》“观

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之诫，应时时诵之。

第1285页，周亮工《书影》卷一〇：“谢客诗只一机轴……措词命意，尽于《山居》一赋。所谓‘遡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即《赋》中‘入涧水涉，登岭山行’，此类甚多。”以言机杼，尚无不可，以言刻划物色，则《赋》未许与诗并论。即如周所摘诗句，见《初去郡》，接云：“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赋》中正苦乏此等致语耳。又按周所引《赋》二句，前云：“爰初经略，杖策孤征”，后云：“陵顶不息，穷泉不停，栉风沐雨，犯露乘星。”是诗之“水涉”与“山行”，衔接递代，“涉”之事“终”，于是“行”之事“始”，舍舟而陆；赋中则二事并举，选地筑室，尽心悉力，或已“登”绝“顶”，尚“山行”而“不息”，或已“穷”发“源”，犹“水涉”而“不停”。周氏貌取皮相，未察文理也。○按：《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引《萧闲堂札记》云：“《书影》谓谢灵运诗只一机轴，如‘晨策寻绝壑，夕息在山楼’、‘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晓日发云阳，落日次朱方’、‘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迎旭凌绝磴，映晖归淑浦’、‘朝游登凤阁，日暮集华沼’、‘倏烁夕星流，昱变朝露国’，凡此发端，虽微有异同，命意不甚相远。至于‘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清旦索幽异，放舟越响郊’、‘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圆’及‘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大都不出此意。然总本自《楚辞》‘朝发枉渚，夕宿辰阳’二语变幻者

也。且其《游名山志》所纪形胜，具见于诗。诗之措词命意，则尽于《山居》一赋，所谓‘溯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即赋中‘入涧水涉，登岭山行’之句，此类甚多。此真有道出康乐痛养处。文字体格，以能变化为工。六朝人诗，除起两韵，中多对偶，甚者直平仄不调之五言排律耳。”读此，知钱先生盖隐驳石遗也。

第 1330 页，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香港感怀》：“盗喜逋逃藪，兵夸曳落河；官尊大呼药，客聚众娄罗”；时人《笺注》引顾欢此论，非也。○按：所谓“时人”，指钱仲联。又第 1498—1500 页考证佛经“皮纸骨笔血墨”之喻，涉及韩愈《归彭城》“剝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亦隐指钱注韩诗。参观《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见《钱锺书散文》第 175—177 页）。又《谈艺录》（补订本）第 347 页，提及批评黄诗公案云：“钱君仲联笺注《人境庐诗》，精博可追冯氏父子之注玉溪、东坡，自撰《梦苕庵诗话》，亦摘取余评公度‘俗艳’一语，微示取瑟而歌之意。”按钱仲联辑“黄遵宪诗论评”（见《人境庐诗草笺注》附）自引《诗话》云：“人境庐诗，论者毁誉参半，如梁任公、胡适之辈，则推之为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则以为疵累百出，谬戾乖张。钱锺书则又以卑格俗艳少之。”今本《梦苕庵诗话》此条末句已删。又《梦苕庵诗话》：“郑珍《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逢树便停村便宿，与牛同寝豕同兴。昨宵蚤会今宵蚤，前路蝇迎后路蝇。’写琐俗事奇辟。”《谈艺录》（补订

本)第183—184页亦称道郑珍此诗,谓为“写俗尽俗,别饶别致”,则二家亦有言语投合时也。

第1501—1502页,释僧懿《魔主报檄文》:“大梦国长夜郡未觉县寐语里。”“寐”即“𦉳”字。释氏书常以“𦉳”字作“寐”,犹其常以“归”字作“皈”。《五灯会元》卷一〇《清凉文益》章次:“云门问僧:‘甚处来?’曰:‘江西来。’门曰:‘江西一队老宿寐语住也未?’僧无对。”又《龙华慧居》章次:“祇如释迦如来说一代时教,如瓶泻水,古德尚云:‘犹如梦事寐语一般。’”以下引杨万里、钱谦益诗,龚自珍《己亥杂诗》之“寐词”等,谓均沾染释氏习气。○按:况周颐《蕙风簃随笔》卷二,有读《五灯会元》数条,中有云:“云门问僧:甚处来?曰:江西来。门曰:江西一队老宿寐语住也未?僧无对。又温州瑞鹿遇安禅师开堂示众,曰:从上宗乘到这里,如何举唱?祇如释迦如来说一代时教,如瓶泻水,古德尚云:犹如梦事寐语一般。且道据什么道理,便恁么道?龚定庵《己亥杂诗》‘寐语’本此。”(见《阮庵笔记五种》)考《阮庵笔记》,钱先生固尝寓目,知此据况说而加详也。

第1545页,论古人自称字例,引王羲之帖、宇文护文及《宋书》、《南史》等。○按: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自称字”条云:“《汉书》注:张晏曰:匡衡少时字鼎。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敬报’,下言‘匡鼎白’。《南史》:陶宏

景自号华阳隐居，人间书札，即以‘隐居’代名。此自称字之始也。……王右军《敬谢帖》云‘王逸少白’，《庐山远公集》卢循《与远书》云‘范阳卢子先叩首’，柳少师《与弟帖》云‘诚悬呈’。今按唐权德輿《答杨湖南书》称‘载之再拜’，柳冕《答郑衢州书》称‘敬叔顿首’，白居易《与元九书》称‘乐天再拜’，宋陈抟《谒高公诗》称‘道门弟子图南上’。唐张谓《长沙风土碑铭》‘有唐八叶，元圣六载，正言待理湘东’；张洗《济渎庙祭器币物铭》‘濯纓不才，谬领兹邑’；元稹作《白氏长庆集序》自书曰‘微之序’，乃是作文自称其字。”后来俞樾《曲园杂纂》卷三十四《日知录小笺》云：“《后汉书·郑康成传》云：‘汝南应劭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仲远北面称弟子。’此汉人自称字之一证。”钱考古人自称字例，意中当有顾、俞诸说在，盖申论前人所未尽者也。

读《槐聚诗存》

钱先生与友人述其为诗，“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与吴忠匡书》）；夫子自道，其语可据。余读《槐聚诗存》，时亦留心于此，而读《谈艺录》、《管锥编》，又每得觑破所本，大似“追入贼巢”、“人赃俱获”。亦读书之一快事也。今即据笔记汇次之，写为一篇，为评泊之助。至若探赜索隐，发皇心曲，则余岂敢。癸巳初春。

第3页，《玉泉山同绎》（1934）：“欲息人天籁，都沉车马音。”按苏辙《南窗》：“闭门谢还往，不闻车马音。”（《栾城集》卷三）陈师道《次韵答晁无斫》：“稍无车马音，复作宾客请。”（《后山诗注》卷五）“车马音”，见《孟子·梁惠王下》：“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非用陶诗“而无车马喧”也。

又：“风铃飒忽语，午塔鬣无阴。”按上用苏轼诗，《管锥编》第一册第117页：“苏轼《大风留金山两日》：‘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冯应榴《合注》卷一八引查慎行

曰：“下句即铃音也。”此二者声意参印，铃不仅作响，抑且能‘语’。”《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二十八则：“东坡《大风留金山两日》云：‘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初白注：‘下句即铃音也。’（冯氏《合注》卷十八）按唐彦谦《游南明山》云：‘石梁卧秋溟，风铃作檐语。’又《过三山寺》云：‘遥听风铃语，兴亡话六朝。’坡公师其语而增。”（第三册第1877—1878页）

第4页，《薄暮车出大西路》（1934）：“义山此意吾能会，不适驱车一惘然。”按《管锥编》第一册第101页引许瑶光《再读〈诗经〉四十二首》论《君子于役》，云：“盖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黄昏时分，触绪纷来，所谓‘最难消遣’。”“义山此意”，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即所谓“日暮起愁”。

第4页，《大雾》（1934）：“病眼更无花恣赏。”又第121页《叔子书来，自叹衰病迟暮，余亦老形渐具，寄慰》：“眼犹安障长看雾。”按俱用杜诗，《论不隔》：“王（国维）氏也用雾来作比喻：‘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雾里看花之恨。’‘白石写景之作，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王氏的比喻也是从别处移用的，杜甫《小寒食舟中作》：‘老年花似雾中看。’”（《钱锺书散文》第497页）

第6页，《秣陵杂诗》（1935）八首之六：“祇如婢学夫人

字，宜写唐临晋帖诗。”按《与周振甫书》：“小字放大，终如小婢学大夫人，纤足放成大脚，貽笑识者。”（《钱锺书研究》第三辑第315页）又《石语》第十六条：“毁庵书终似放脚娘姨，不甚自在（自注：按‘娘姨’二字出处见《萝摩亭札记》卷十六）。梁武帝评羊欣所谓‘举止羞涩’者有之。”“举止羞涩”云云，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梁袁昂古今书评”条：“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作梁武帝语，后人沿误耳；参观赵与峕《宾退录》卷二所考。

“唐临晋帖”，为虞集评范梈诗语，见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八《范先生诗序》：“伯生尝评之曰：杨仲弘诗如百战健儿，范德机诗如唐临晋帖，以余为三日新妇，而自比汉廷老吏也。闻者皆大笑。”（《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十册第134页）

之七：“想少情多近玉溪。”按《管锥编》第二册第836页：“《楞严经》卷八：‘纯想即飞，必生天上。……情少想多，轻举非远。……情想均等，不飞不坠，生于人间。……情多想少，流入横生。……纯情即沉，入阿鼻狱。’”

第7页，《伦敦晤文武二弟》（1935）：“见我自乡至，欣如汝返乡。看频疑梦寐，语杂问家常。既及尊亲辈，不遗婢仆行。”按《管锥编》第二册第609—610页：“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截去首尾，中间自‘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至‘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凡十二句，蔚为钜观。陈傅

良《止斋文集》卷二《怀石天民》中间‘君貌今何如？孰与我老苍’至‘末乃及田舍，何有还何亡？’凡十八句，于王诗拟议而稍变化；……贯串问语，缀插篇什，厥例更多……李端《逢王泌自东京至》：‘逢君自乡至，雪涕问田园：几处生乔木？谁家旧村？’……《中兴群公吟稿》戊集卷四高九万《舍侄至》：‘故山坟墓何人守？旧宅园亭几处存？问答恍然如隔世，若非沉醉定销魂。’又《中国诗与中国画》：“（王维）《杂诗》第二首：‘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维这二十个字的最好对照是初唐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羁心祇欲问，为报不须猜。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莱。’这首诗很好，和王维的《杂诗》在一起，鲜明地衬托出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王绩相当于画里的工笔，而王维相当于画里的‘大写’。”（《七缀集》第18—19页）

第11页，《四言》（1936）：“茧中有蛹，化蛾能飞。心中有物，即之忽希。”按《管锥编》第三册第1426页：“神秘宗师又以扃闭内外之心斋比于灵魂之作茧自裹，豁然澈悟则犹蛹破茧、翩翩作白蝴蝶（y sale del mismo capucho una mariposita blanca muy graciosa）。”

第 14 页,《清音河 (La Seine) 河上小桥 (Le Petit Pont) 晚眺》(1936) 二首之一:“万点灯光夺月光,一弓云畔挂昏黄。”按“夺”字本诸内典,《谈艺录》(补订本)第 407 页:“《瑜珈师地论》卷十五云:‘映障所碍,如小光大光所映,故不可得,所谓日光映星月等,又如月光映夺众星。’”

第 16 页,《石遗先生輓诗》(1937):“竹垞弘通学,桐江瘦淡诗。”自注:“先生诗学、诗格皆近方虚谷,时人不知有《桐江集》,徒以其撰诗话,遂拟之随园耳。”按《石遗室诗话》卷八论孙师郑而及方虚谷,甚称其《秋晚杂书》诗十首,云:“虚谷生平,详周密《癸辛杂志》者,不值一钱。然诗功甚深,所纂《瀛奎律髓》,虽专论近体诗,浅见寡闻者不能道也。此数首(按指《秋晚杂书》)宗旨,取朴去艳,于赵宋一代诗学,辨别甚真。盖虚谷本西江派,故阳秋若此,非后世随声附和,妄思依傍李杜门户者比,不可以人而废言也。”“诗学近方虚谷”云云,当指此等处言。参观《随手札》“评石遗诗”条。

第 17—18 页,《Edward Fitzgerald 英译波斯醜醜雅 (Rubáiyát)》,颂酒之名篇也。第十二章云:坐树荫下,得少面包、酒一瓯、诗一卷,有美一人如卿者为侣 (and thou),虽旷野乎,可作天堂观。为世传诵。比有波斯人 A. G. E 'Tessam-Zadeh 译此雅为法语,颇称信达,初无英译本尔许语。一章云:倘得少酒,一清歌妙舞者,一女便娟,席草临流,便作极乐园主想,不畏

地狱诸苦恼耳。又一章云：有面包一方、羊一肩、酒一瓯，更得美姝偕焉，即处荒烟蔓草而南面王不与易也（*Vaux mieux que d'un empire être le Souverain*）。乃知英译剪裁二章为一，反胜原作。因忆拉丁诗人 Lucretius 咏物性（*De natura rerum*）卷二谓哲人寡嗜欲，荫树临溪，藉草以息，乐在其中。命意仿佛，微恨其于食色天性度外置之，则又如司马谈论墨家，所谓俭而难遵矣。余周妻何肉，免俗未能，于酒则窃学东坡短处，愿以羊易之。戏赋一首》（1937）。按“*Rubáiyát*”，即“鲁拜集”（郭沫若译）也；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译本第十二章：“A Book of Verses underneath the Bough, /A Jug of Wine, a Loaf of Bread—and Thou/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Oh, 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郭译则为：“树荫下放着一卷诗章，/一瓶葡萄美酒，一点干粮，/有你在这荒原中傍我欢歌—，/荒原呀，啊，便是天堂！”视钱译数语，何啻仙凡。“周妻何肉”，语见《南史·周顛传》。杨绛《我们仨》第78—80页：“自己有厨房了，锺书就想吃红烧肉。”“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锺书吃得好快活。”陈寅恪诗亦用过此典，云：“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癸未春日感赋》）旨趣大相径庭。又“学东坡短处”云云，指少酒量，参观《与燕谋谈即示》：“东坡之短处，不学颇自有。须吞三尺喙，勿过三蕉酒。”（《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246页）、《予不好茶酒而好鱼肉，戏作解嘲》（《诗存》第50页）。

又：“勿求酒美，愿得羊肥。拚梦踏菜，莫醉烂泥。”按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三十三则：“甘地少时闻人云：‘The English are able to rule over us because They are meat-eaters.’遂窃尝羊肉一脔，哇而出之，夜梦一羊鸣于腹中（John Gunther, *Inside Asia*, p. 386 引），大类吾国羊踏菜园故事。”（第一册第 200 页）“羊踏菜园”，见邯郸淳《笑林》：“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梦五脏神曰：羊踏破菜园。”（鲁迅辑《古小说钩沈》第二集；又见《类说》、《锦绣万花谷》引《启颜录》）

第 21 页，《将归》（1938）：“家无阳羨笼鹅寄。”按《管锥编》第二册第 764—765 页：“《阳羨书生》（出《续齐谐记》）。按《酉阳杂俎》续集卷四早考其事渊源于《譬喻经》；见《旧譬喻经》卷上之一八，《法苑珠林》卷九二引之；《珠林》卷七六、《太平御览》卷七三七引《灵鬼志》一则略类。‘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此固释典常谈。”

第 22 页，《巴黎归国》（1938）：“背羨蜗牛移舍易，腹输袋鼠挈儿便。”按此用英诗人堂恩（John Donne）妙喻，《谈艺录》（补订本）第 232 页：“如斯派宗祖约翰唐（John Donne）名篇（To sir Henry Wotton），说万物皆备于身，方之蜗牛戴壳，随遇自足，著处为家。（Be thou thine own home, and in thy selfe dwell; /Inn any where, continuance maketh hell. /And seeing the snaile, which every where doth rome, Carrying his owne house still, still is at home.—*Complete Poetry and Selected Prose*, ed.

J. Hayward, pp. 153-4) 新妙贴切。”又 551 页：“古希腊诗人呼蜗牛曰‘戴屋者’ (house-carrier—Hesiod, *Works and Days*, 569, Loeb, 45; cf Anaxilas: ‘Snails in distrust carry their houses about with them’—Athenaeus, *The Deipnosophists*, II §63, Loeb, I, 275)。”

第 22 页，《亚历山大港花园见落叶冒叔子景璠有诗即和》(1938)：“绿上枝头事已非，江湖摇落欲安归。”按下句本王国维词，王氏《苕华词·浣溪沙》：“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六册第 460 页）

第 24 页，《谢章行严先生书赠横披代家君》(1938)：“未应闲此手，磨墨墨磨渠。”按用苏轼语，《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三百二十八则：“曾慥《类说》卷九《仇池笔记》云：‘陈敦云：人言弄猢猻，不知为猢猻所弄。’屠继烈节录本屠长卿《鸿苞集》卷五云：‘妙哉桓景升之言：稚子弄影，不知为影所弄。狂夫侮象，不知为象所侮。又妙哉苏端明之言：非人磨墨墨磨人。’”（第一册第 541 页）

第 26 页，《题叔子夫人贺翹华女士画册》(1938)：“杨陆前游迹未孤，凭偿宿债与江湖。他年滇蜀归来日，骑象骑驴索两图。”自注：“谓放翁、升庵。”按易顺鼎《买醉津门雪中成咏》

四首之三：“平生陶穀韩熙载，乞食烹茶画两图。”（《琴志楼诗集》卷十八）句律似之。

第 27 页，《昆明舍馆作》（1938）：“狂言我愧桑民怿，欲与宗元夺柳州。”按冒效鲁《赠柳雨生》（1939）：“黄蕉丹荔平生梦，敢学桑郎夺柳州。”（《叔子诗稿》，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8 页）桑悦事，见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悦）再调柳州，悦实恶州荒落，不欲往。人问之，辄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夺其上，不安耳。’”

第 27 页，《心》（1938）：“往事成尘欲作堆，直堪墟墓认灵台。旧游昔梦都陈迹，拉杂心中瘞葬来。”按首句，变化自李贺语，《谈艺录》（补订本）第 51 页：“同篇（《秦王饮酒》）云：‘劫灰飞尽古今平。’夫劫乃时间中事，平乃空间中事；然劫既有灰，则时间亦如空间之可扫平矣。”又第 375 页：“《古悠悠行》云：‘今古何处尽，千载随风飘’，即《秦王饮酒》之‘劫灰飞尽古今平’，而‘灰’字遂使‘飞’、‘平’有着落。”

后三句亦“险语”，用“葬”字，所本非一。《龚定盦全集·别集》之《卜算子》：“重到曲阑干，记起人模样。万劫千生再见难，小影心头葬。”（《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五册第 350 页录此词，批注：“Donne: ‘The Dampé’: ‘When I am dead, and Doctors know not why, /And my friends curiositie/Will have me cut up to survay each part, /When they shall finde your

Picture in my heart,/…’”又《中文笔记》第二册第263页亦引之)又《管锥编》第一册第378—379页论《史记》优孟谏语,所引“后世作者踵其意而为新险之语”,亦资比较。

第28页,《寓夜》(1939):“掐天片月未庭方。”第48页《山斋晚坐》(1940):“一月掐天犹隐约。”自注:“《元诗选》乙集元淮《金困吟·端阳新月》:‘遥看一轮月(据中华书局校点本《元诗选》,“轮”当作“痕”),掐破楚天青。’”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三十一则:“建文帝:‘谁将玉指甲,抓(别本作“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龙不敢吞。’”(《列朝诗集》乾上引郑晓《逊国记》)”(第三册第1945页)

第30页,《叔子寄示读近人集题句,媵以长书,盍各异同,奉酬十绝》之三:“自关耆旧无新语,选外兰亭序未闻。”按《管锥编》第三册第1112页:“《文选》未录此《兰亭集》序,自宋逮清,臆测纷纭。……窃谓羲之之文,真率萧闲,不事琢磨,寥寥短篇,词意重沓。……《文选》去取之故,未敢揣摹;……顾羲之于字体不肯复犯,而于词意之复犯,了不避忌,岂转心揖志在乎书法,文章本视为馀事耶。”又上句出杜诗,《解闷十二首》之六:“即今耆旧无新语。”(《杜诗详注》卷十七)冒效鲁《答钵水翁平阳见怀即次其述怀韵》之二:“休嗟耆旧无新语。”亦用此。

又《答孝鲁见嘲嗤》:“石遗未曾师,越纒堪尚友。一长有

可录，二老亦不朽。伊余陋独学，闻道生已后。敢逐康成车，扑口口囊垢（按：此句涂改多番，今已不可辨）。无师转多师，守墨非墨守。惟其空诸傍，或可虚尽受。町畦稍得化，人弃我有取。持平到李陈，薄言逢疾首。怨宿自前修，怒迁及下走。强以二豪压，譬首覆之臼。彼皆伤隙末，与子期敬久。见犯吾勿校，得情吾何咎。但问逞嘲诙，于意今解否。”（《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507页）见二人论学之际，不免攻伐，所幸见犯勿校，未至隙末耳。

之五：“人情乡曲惯阿私，论学町畦到品诗。福建江西森对垒，为君远溯考亭时。”自注：“论《宋诗菁华录序》。朱子语见《语类》卷百三十九。”按《谈艺录》（补订本）第85页：“（朱子）与象山争而不胜，又因象山作《王文公祠堂记》，亦为荆公平反，乃激而移怨江西人，并波及荆公，真爱及屋乌，而恶及储胥者。《语类》卷一百二十四曰：‘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如荆公、子静’；卷一百三十九曰：‘大率江西人，都是硬执他底横说，如王介甫、陆子静。’皆王陆并举，殊耐寻味。”

之六：“临汉论诗有别裁，言因人废亦迂哉。”按《谈艺录》（补订本）第23页：“山谷熟于《世说》，为作诗渔猎之资，此宋人之公言也。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

成诗。’……山谷狐穴之诗，兔园之册，无可讳言。论者以魏道辅立身险鄙，与苏黄党派不同，遂因人废言，谓其语不足信。”又《管锥编》第三册第 903 页：“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讥黄庭坚‘方其拾玃羽，往往失鹏鲸’。”亦可参。

第 33 页，《杂书》四首之一：“小女解曲肱，朝凉供酣睡。”按《宋诗选注》第 134 页陈与义《雨晴》：“尽取微凉供稳睡。”注：“采用杜甫一个诗题里的字面：‘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

又《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十六册第 389 页《近代诗钞》之汪国垣《阻雨生铁铺次晨雨霁至罗山》：“输与吾乡老山谷，亟搜奇句报新晴。”批注：“大误。陈与义《雨晴》：‘尽取微凉供稳睡，急搜奇句报新晴。’陈亦非江西人。”

第 35 页，《雨不出》：“世间难得虚堂睡，更与尧章续旧题。”按《宋诗选注》第 219 页姜夔《平甫见招不欲往》：“人生难得秋前雨，乞我虚堂自在眠。”

第 36 页，《对月同绛》（1939）：“借谁亭馆相携赏，胜我舟车独对看。”按《谈艺录》（补订本）第 332 页：“《梅磴诗话》卷中引叶靖逸《九日》云：‘肠断故乡归未得，借人篱落赏黄花’；……《列朝诗集》乙集卷五瞿宗吉《清明》云：‘借人亭馆看梨花。’《匏庐诗话》卷上引唐子畏《墨菊》云：‘借人篱落

看西风。’黄莘田《秋江集》卷一《闲居杂兴》之八云：‘借人亭馆看乌山。’作者殊列，均以看字、赏字、插字畅借字之致。”晚清林旭《寄内》：“六月长安无一事，借人亭馆看西山。”（《晚翠轩诗》）亦用此语。

第 37 页，《待旦》（1939）：“困情收拾聊申旦，驼坐披衣不语僧。”按黄庭坚《僧景宗相访寄法王航禅师》：“倦禅时作橐驼坐。”（《山谷诗集注》内集卷六）同光诗人亦喜用，如陈三立《漫题豫章四贤像搨本》：“駝（同‘驼’）坐虫语窗，私我涪翁诗。”（《散原精舍诗》卷上）陈曾寿《幽忧二首》之二：“未能逍遥游，且入骆驼定。”（《苍虬阁诗集》卷六）《十年以来，日习寸楷，未尝间断，所用笔以邵芝岩紫毫长颖中楷为佳。自兵事起，笔坊被毁，无可觅购。询先七弟来书，云觅得三枝，喜极，长句报之》：“从兹满意弄窗光，聊破枯禅骆驼坐。”（同前卷十）《众异寄和予曩岁张园海棠诗次韵答之》：“枯禅且入橐驼坐，不问歧途万里沙。”（《苍虬阁诗续集》卷上）又冒效鲁《祀灶日得默存诗嘱和依韵漫书报之》（1941）：“忍寒驼坐谁除酒，索句泥炉火有功。”《邛都杂咏》（1946）：“检点诗囊还自笑，三更驼坐拨炉吟。”（《叔子诗稿》第 45、61 页）亦用此语。

第 38 页，《游雪窦山》（1939）之一：“天教看山来，强颜聊自诩。”按《石语》第七条：“王壬秋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余诗话仅采其诗二句，今亦忘作何许语。锺书对曰：‘似

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石遗室诗话》卷十七：“王壬秋先生诗，惟于友人屏幅上时见之，皆学盛唐、学选体者也。近乃于友人斋头，翻阅其诗集一过，有祁门五言律二十首之一最工，云：‘已作三年客，愁登万里台。异乡惊落叶，斜日过空槐。雾湿旌旗敛，烟昏鼓吹开。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首二句将少陵‘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调换言之耳。携短剑而作客，三年亦濡滞矣，而托言为看山来，末韵不可谓不冷隽。”所采实五律一首，非仅二句，钱、陈皆误忆。

之二：“我尝观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按苏舜钦《太行道》：“攀缘有路到绝顶，四望群峰合沓如波涛。”（《苏舜钦集》卷一）王安石《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一篇》：“水于天下实至险，山亦起伏为波涛。”（《王荆公诗注》卷九）

第38页，之四：“田水颇胜师。”按《管锥编》第三册第931页：“《云仙杂记》卷二：‘渊明尝闻田水声，倚杖久听，叹曰：“秣稻已秀，翠色染人，时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过吾师丈人矣。’”师儒观水明道，实无异乎诗人听水触兴。”又《谈艺录》（补订本）第236页：“吾国诗人吟风弄月，涉目怡情，幼與之置身邱壑，简文之会心濠濮；烟霞逸兴，山水清音，过而不留，运而无积。初不若西方浪漫诗人之着力用意，向‘风月景山水’中安身立命，进德悟道，有若《云仙杂记》卷二所载，

陶渊明闻田水声而叹为‘胜吾师丈人’也。”

又：“新月似小女，一弯向人低。”按《宋诗选注》第144页曹勋《望太行》：“落月如老妇，苍苍无颜色。”《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二百五十六则论胡仲弓《苇航漫游稿》卷一《四时月》诗云：“按曹勋《松隐集》卷七《望太行》‘落月如老妇，苍苍无颜色’，比喻极妙。清人黄河激诗云：‘娇女如新月。’（见张南山《艺谈录》引）方子云《新月》诗云：‘宛如待字闺中女，知有团圆在后头。’（《吴会英才集》卷二）皆薄而能巧，胜于希圣。”（第一册第431页）又第二十则（第20页）、第二百八十九则（第486页）并录曹此诗，可以参观。

又：“平生寡师法，开径自出蹊。”按《与郑海凌书》：“我自己虽也出名师之门，自愧没有学到什么，现在所知道的一点，都是‘盲修瞎炼’而得。”（郑海凌《铭记钱锺书先生的教诲》引，《名家》1999年3月号）

第40页，《吉安逆旅作》（1939）：“听雨居然此亦楼，潇潇心上合添秋。”按此本吴文英词，《管锥编》第二册第627页：“盖宋玉此篇貌写秋而实写愁，犹史达祖《恋绣衾》之‘愁便是秋心也’、或吴文英《唐多令》之‘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谈艺录》（补订本）第526页：“《天真阁外集》卷二《露立》：‘言无人达难成信，秋上心来尽是愁’；又即撮合康节诗与梦窗词之拆字也。……史梅溪《恋绣衾》：‘愁便是、秋心也’；……吴

梦窗《唐多令》：‘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陈仲醇《眉公诗录》卷六有《悲秋歌》六首，语殊钝拙，而拆字颇多：‘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若言非心也，悲秋何为者。’”

第 41 页，《窗外丛竹》（1939）：“上窗写影几竿竹，叶叶风前作态殊。”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二则：“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二云：‘李夫人西蜀名家，月夕独坐南轩，竹婆婆可喜，即模写纸窗上，明日视之，生意俱足。’按《云仙杂记》卷五引《常新录》云：‘宗测乐闲静，好松竹，尝见日筛竹影上窗，以笔备描之。’‘筛’字殊妙于语言，即孟东野《城南联句》所谓‘竹影金琐碎’也。”又：“华光《梅谱》云：‘偶月夜未寝，见窗间疏影横斜，萧然可爱，遂以笔规其状。’（《佩文斋书画谱》卷十二‘宋释仲仁画墨梅’条引）郭熙《林泉高致》云：‘学画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则竹之真形出矣。’（同上卷十三‘宋郭熙山水训’条）”（第二册第 1624—1625 页）

第 42 页，《己卯除夕》：“别岁依依似别人，脱然临去忽情亲。”按孙原湘《舟夜》：“人当离别情方见。”《情尘》：“人当临去看都好。”（《天真阁诗集》卷二十五、卷二十八）《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八册第 448 页于次句批注：“《外集》卷五《泣别》第二首：‘人到去时看越好，泪无挥处忍尤酸。’”）又《围城》第 267 页：“虽然厌恶这地方，临走时偏有以后不能再

来的怅恋，人心就是这样捉摸不定的。”亦资参观。

第 44 页，《新岁见萤火》（1940）：“嗟我百年间，譬冥行长道。未知所税驾，却曲畏蹉倒。”按“税驾”句，参观吕祖谦《祭方季肃文》：“时不待人，将驾已税。”（《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 578 页）陈衍《石遗室诗集》卷二《村居江上，已近重阳，即事兴怀，辄用东坡“霜风渐欲作重阳”句作起，三首存一》：“可与言愁人有几，未知独驾税何方。”（《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 624 页）

第 46 页，《笔砚》（1940）：“笔砚犹堪驱使在，姑容涂抹答年华。”按下句用陈与义诗，《宋诗选注》第 134 页陈与义《雨晴》“急搜奇句报新晴”句注：“参观陈与义《清明》的‘只将诗句答年华’。”

第 48 页，《山斋晚坐》（1940）：“粘日何人解炼胶。”按此用司空图诗，《谈艺录》（补订本）第 82 页：“（荆公）《漫成》云：‘日月不胶时易失’；雁湖注：‘言常去而不留也。’按此本司空表圣《短歌行》：‘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黏日月。’”《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九十六则：“司空表圣《短歌行》云：‘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毛滂《殢人娇》词云：‘小晴未了，轻阴一晌，酒到处、恰如把春粘上。’（《全宋词》卷七十二，又卷八十七重见，作张扩词）吴

潜《祝英台近》词云：‘今朝捱得晴明，拖条藜杖，一齐把春粘住。’（《全宋词》二百二十一）蒋竹山《小重山》词云：‘人散树啼鸦，粉团粘不住旧繁华。’刘菊房《蓦山溪》云：‘醉魂离梦，捻合难成片。’（《全宋词》卷二百三十七）丁龙泓《砚朴诗集·郊行》：‘闲情无远近，处处似相粘。’王次回《疑雨集》卷三《即事》之八：‘秋清更忆人如画，可奈愁粘病缚何。’黎二樵《五百四峰堂诗钞》卷十六《忆村居花草》之二：‘竹里微阳花上雨，暖寒胶漆不能分。’”（第二册第1538—1539页）

又：“心无多地书难摄，夜蓄深怀世尽包。”按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五：“唐李渤问归宗禅师曰：‘须弥纳芥子，仆即不疑。芥子藏须弥，恐无是理。’归宗曰：‘人言学士读万卷书，是否？’渤曰：‘然。’归宗曰：‘是心如椰子大，万卷书从何处着？’荆公诗云：‘巫医之所知，督史之所业。载车必百两，独以方寸摄。’即归宗之意。”王安石诗，见《再用前韵寄蔡天启》（《王荆公诗注》卷三）。又袁枚《秋夜杂诗》十五首之十一：“书堆至万卷，岂无三千斤。如何藏之腹，重与凡人均。”（《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参观第54页《赵云崧有偶遗忘问稚存辄得原委一诗，师其例赠燕谋，君好卧帐中读书》（1940）。

第49页，《山斋不寐》（1940）：“蛙喧请雨邀天听，虫泣知秋吊月亡。”按下句本李贺，《谈艺录》（补订本）第51—52页：“长吉好用‘啼’‘泣’等字。……惟《宫娃歌》之‘啼蛄吊月钩阑下’，《将进酒》之‘烹龙炮凤玉脂泣’，一则写景幽凄，一

则绘声奇切，真化工之笔矣。”参观《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九十四则（第三册第2517页）。上句本《焦氏易林》。

第51页，《山斋凉夜》（1940）：“细诉秋心虫语砌，冥传风态叶飘廊。”按《中国诗与中国画》：“了解作者周遭的风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好比从飞沙、麦浪、波纹里看出了风的姿态。”（见《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六十七则论Edward McCurdy编译本《达芬奇笔记》（*The Notebooks of Leonardo Da Vinci*）中画风语：“In representing wind, in addition to showing the bending of the boughs and the inverting of their leaves at the approach of the wind, you should represent the clouds of fine dust mingled with the sky. 按前半吾国画家惯技，王维《山水论》所谓‘有风无雨，只看树枝’，韩拙《山水纯全论》所谓‘风虽无迹，而草木衣带之形，云头雨脚之势，毋少逆也’（《佩文斋书画谱》十三）。朱新仲《灞山集》卷一《谢人惠浅滩一字水图》：‘风本无形不可画，遇水方（原误为本，今改）能显其质。画工画水不画风，水外见风称妙笔。’江弢叔《服敌堂诗录》卷七《彦冲画柳燕》诗云：‘柳枝西出叶向东，此非画柳实画风。风无本质不上笔，巧借柳枝相形容。’是也。窃谓《庄子·齐物论》写风之声，柳子厚《袁家渴记》云‘每风从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翥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颺葳蕤’，善写风态，皆具捕风之手者。”（第一册第246页）

第 51 页,《晚步》(1940):“野塘水漫浮牛鼻。”按《宋诗选注》第 99 页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近人积水无鸥鹭,时有归牛浮鼻过。”注:“唐人陈咏诗句:‘隔岸水牛浮鼻渡’(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黄庭坚来了个‘点铁成金’,他在《跨牛庵铭》(《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三)里又说:‘浮鼻渡河。’”

又:“亟待清风屠宿暑。”按《宋诗选注》第 57 页王令《暑旱苦热》:“清风无力屠得热。”注:“‘屠’字用得很别致;《广陵先生文集》卷十《暑中懒出》诗又说:‘已嫌风少难平暑。’”

第 53 页,《偶书》(1940):“客里为欢事未胜,正如沸水泼层冰。纵然解得些微冻,才着风吹厚转增。”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 277 页:“佛经:以少水沃冰山,稍为融解,还增其厚。”

第 54 页,《赵云崧有偶遗忘问稚存辄得原委一诗,师其例赠燕谋,君好卧帐中读书》(1940):“开卷愁无记事珠,君心椰子绰犹馀。”按《谈交友》:“唐李渤问归安禅师云:‘芥子何能容纳须弥山?’师言:‘学士胸藏万卷书,此心不过如椰子大,万卷书何处著?’”(《钱锺书散文》第 71 页)事见《五灯会元》卷三归宗智常章次(《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 649 页录《景德传灯录》,亦及此事)。赵诗见《甌北集》卷四十二,题为《偶有遗忘,问之稚存,辄录示原委,老夫欣得此行秘书矣。无以为报,拟质一事,即劳以酒一壶。戏书此为券》。又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六百十一则：“（后村）《大全集》卷四《示同志》云：‘静看芭蕉身不实，健忘椰子腹无书。’《樊山续集》卷二十五《哭李爱伯夫子》第二首（按诗见《樊山集》卷二十五，非《续集》也）：‘身似芭蕉丛众疾，心如椰子纳群书。’‘丛众疾’三字凑，不如后村。”（第二册第1085页）

第55页，《题燕谋诗稿》（1940）：“难得胶粘日，端能笔补天。”按上句用司空图诗，见前；下句用李贺诗，《谈艺录》（补订本）第62页：“长吉《高轩过》篇有‘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此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

第56页，《肩痛》（1940）：“遂中庶人风，两肩如渍醋。春事叹无多，老形惊已具。”又第121页，《叔子书来，自叹衰病迟暮，余亦老形渐具，寄慰》诗题。按此用陈师道语，《管锥编》第一册第335页：“‘模样’即‘形’，古近语异耳，皆兼局势与情迹而言之。陈师道《次韵春怀》云：‘老形已具臂膝痛’，点化殊妙，足资解会；‘臂膝痛’者，老之徵象，‘见’老之‘形’，非老态‘具’尽于‘臂膝痛’也。”又《致郑朝宗》（1981）：“天气骤寒，弟肩臂如浸陈醋，后山诗云：‘老形已具臂膝痛’，实得苦心。”（《钱锺书散文》第420页）

第57页，《庚辰除夕》（1941）：“迎送由人天梦梦，故新泯

界夜茫茫。”按此用恽格诗，《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三册第223页《艺谈录》：“恽格：送迎人自老，新旧岁无痕。”

第59页，《当子夜歌》（1941）：“妾为刀背，欢作刀口。欢情自薄，妾情常厚。”按此喻本诸袁枚，《谈艺录》（补订本）第218页：“譬如（《随园诗话》）卷四谓：‘今人论诗，动言贵厚贱薄。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以两物论：狐貉贵厚，蛟绢贵薄。以一物论：刀背贵厚，刀锋贵薄。安见厚者定贵，薄者定贱耶。……’云云。……子才口角玲珑，……即就譬而言，安见诗之非狐貉耶。刀之有背有锋者，固胜于有锋而无背者也。”

又《宋诗选注》第261页许棐《乐府》：“妾心如镜面，一规秋水清。郎心如镜背，磨杀不分明。”亦资参观。

第60—61页，《哀若渠》（1941）：“阙地起九原，弥天戢一棺。”按次句用陆机语，陆《弔魏武帝文》：“戢弥天乎一棺。”（见《管锥编》第三册第1214页引）

又：“赴死轨独短，熟视不能拦。”按《管锥编》第四册第1311—1312页：“鲍照《观漏赋》：‘嗟生民之永途，躬与后而皆恤，死零落而无二，生差池之非一。’按韩愈《秋怀诗》第一首：‘浮生虽多涂，趋死惟一轨’，即此意而语更简洁醒豁。”

又：“人死资诗题，忍哉事琢炼。诗人大薄情，挽毕无馀恋。”按《围城》第218页：“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

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

第 63—64 页，《吴亚森忠匡出纸索书余诗》（1941）：“吴生好古亲风雅，翰墨淋漓乞满家。见役吾非能事者，赏音子别会心耶。声如蚓出诗纤弱，迹比鸦涂字侧斜。也自千金珍敝帚，不求彩笔写簪花。”按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引林旭《无题》：“锦车使者归来日，雾阁云窗又起家。楚岫梦回洵美矣，汉宫望久诎非耶。君王自失河南地，颜色能骄西海花。生不逢时尚倾国，肯将薄命续琵琶。”音响节奏，可资比较。

第 64 页，《骤雨》（1941）：“雷嗔斗醒诸天梦，电笑登开八表昏。”按《管锥编》第四册第 1342—1343 页：“苏轼《行琼、儋间，肩舆坐睡，觉而遇清风急雨》：‘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苏轼上句用字出宋玉《高唐赋》，以状云之如梦；下句用字出东方朔《神异经》：‘天为之笑’，张华注：‘言“笑”者，天口落火烙灼，今天不雨而有电光’，以状电之如笑。只究来历典雅而不识揣称工切，便抹杀作者苦心；西方诗文常以笑与电互喻，亦佐证《神异经》及注侔色之当也。”又《写在人生边上·说笑》：“东方朔《神异经·东荒经》载东王公投壶不中，‘天为之笑’，张华注谓天笑即是闪电，真是绝顶聪明的想象。”又陈寅恪《咏成都华西坝》：“雷车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亦用此典。

第 66 页，《得龙忍寒金陵书》（1942）：“意深墨浅无从写，要乞浮提沥血干。”按《管锥编》第四册第 1499—1500 页：“韩愈《归彭城》诗：‘剝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顾嗣立《集注》、沈钦韩《补注》皆无注，方世举注引王嘉《拾遗记》载浮提国献善书二人‘剝心沥血以代墨’。其事见《拾遗记》卷三，二人乃‘佐老子作《道德经》’者；盖方士依傍释典‘以血为墨’之事，又割截‘阎浮提’之名，后世道书复掩袭之而托言出于《圣纪》（《云笈七签》卷七）。”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归彭城》诗的‘剝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方世举注引《拾遗记》里浮提国人沥血代墨的故事。”（《文学研究》1958 年第 2 期）

第 68 页，《立秋晚》（1942）：“暮云不解为霖雨，闲处成峰祇自奇。”按用唐人句，《万首唐人绝句》卷四十九来鹄《云》：“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又近人徐梵澄《蓬屋说诗》引萧军诗：“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而妄赞云：“两语触目惊心，允为名句。”浑不知其本王安石《雨过偶书》：“谁似浮云知进退，纔成霖雨便归山。”而造句恶劣，几于不通。

第 73 页，《答叔子》（1942）：“斂非澜倒回狂手，立作波摇待定身。”按《谈艺录》（补订本）第 333 页：“皆即‘口舌难争，坚壁勿战’之旨。《金刚经》所谓‘无诤三昧’，亦犹后

来陈简斋《葆真池上》名句所谓：‘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也。”又《叔子诗稿》第38页《书叶葱奇兵喻后》：“为君诵简斋，波摇姑小立。”

第79页，《故国》（1943）：“骨尽踏街随地痛，泪倾涨海接天哀。”按上句，本韦庄《秦妇吟》“天街踏尽公卿骨”，说者所知；“地痛”一语，则出自刘向，《谈艺录》（补订本）第53页：“严铁桥《全汉文》卷三十九载刘向《别录》云：‘人民蚤虱，多则地痒，凿山钻石则地痛。’此与《东观汉记》载马援上书，论击山贼，‘须除其竹木，譬如婴儿头多虬虱，必剃之荡之’，《论衡·解除》篇谓‘民居地上，犹蚤虱贼人肌肤’，皆不过设身处地，悬拟之词。并非真谓土皮石骨，能知有感。试以刘更生所谓‘地痛’，较之孟东野《杏殇》诗所云：‘踏地恐土痛，损彼芳树根。此诚天不知，剪弃我子孙。’彼只设想，此乃同感，境界迥异。”

下句，从曹植、王安石诗翻出，《管锥编》第四册第1256—1257页：“《淮南子·论言训》：‘以数杂之寿，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之少，泣而益之’；《全三国文》卷一六陈王植《上书请免发取诸国士息》：‘愚诚以挥涕增河，鼯鼠饮海，于朝万无损益’；亦犹《涅槃经》之言‘掬水投海’。……曹植《上书请免发诸国士息》谓‘挥涕增河，万无损益’；而岑参《见渭水思秦川》：‘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或王安石《壬辰寒食》：‘更倾寒食泪，欲涨冶城潮’，又一喻

之两柄也。”又《小说识小》：“《淮南子·诠言训》曰：‘犹忧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曹子建《上书请免发诸国土息》曰：‘挥涕增河’；皆意同而辞气生动不及。古罗马戏剧家泼洛脱斯(Plautus)形容财虏欲浣濯而惜水，则挥泪以增之(Aquam plorat, cum lavat, profundere)。”(《钱锺书散文》第511页)

第80页，《乡人某属题〈哭儿记〉》，儿从军没缅甸，其家未得耗，叩诸乩，神降书盘曰：归去来兮，胡不归(1943)：“四万义军同日尽，世间儿子漫纷纷。”按二句俱用杜诗，上句见《悲陈陶》(“尽”杜原作“死”)，下句见《醉歌行》(“间”杜诗原作“上”，“漫”原作“徒”)。

第80页，《春风》(1943)：“宿命沉沦花堕溷，禅心安隐絮和泥。”第96页，《赠乔大壮先生》：“着处行窝且安隐，传经心事本相违。”按《管锥编》第二册第765—766页：“‘隐’即‘稳’，《朱骏声文集》卷三《刻〈参同契〉序》：‘魏君自序：‘安甯长生’；‘甯’者，所依据也，古多借‘隐’今俗作‘稳’也。’……杜甫《投简梓州幕府兼简韦十郎官》：‘幕下郎官安隐无’，朱鹤龄注：‘《说文》：“隐、安也”，《通鉴》安禄山问中使曰：“圣人安隐。”’佛书尤多，如鸠摩罗什译《弥勒下生成佛经》：‘人寿八万四千岁，安隐快乐’；《大般涅槃经·狮子吼菩萨品》第二三之二：‘身心安隐，恐怖得除’；……《胜天王经》佛自说八十好相之二十二：‘住处安隐，不危动。’”又第115页

《偶见二十六年为绛所书诗册，电谢波流，似尘如梦，复书十章》之十：“翻书赌茗相随老，安稳坚牢祝此身。”“安稳”当作“安隐”，《诗存》卷首影印此诗手迹，正作“隐”字。

第 81 页，《病榻闻鸠》（1943）：“绿润意根生草木，清泠胸境拓江湖。”按《谈艺录》（补订本）第 251—252 页：“《山谷内集·六月十七日昼寝》云：‘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见沧洲白鸟双。马龀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天社注曰：‘闻马龀草声，遂成此梦也。《楞严》曰：如重睡人，眠熟床枕，其家有人，于彼睡时，捣练舂米；其人梦中闻舂捣声，别作他物，或为击鼓，或为撞钟。此诗略采其意。以言江湖之念深，兼想与因，遂成此梦’云云。真能抉作者之心矣。夫此诗关键，全在第二句；‘想见’二字，遥射‘梦成’二字。‘沧洲’二字，与‘江浪’亦正映带。第一句昼寝苦暑，第二句苦暑思凉，第三句思凉闻响，第四句合凑成梦；意根缘此闻尘，遂幻结梦境，天社所谓‘兼想与因’也。”又第 67 页《酷暑简拔翁》（1942）“乌靴席帽翻江梦”，则明用黄诗。

第 83 页，《古意》（1943）：“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按上句为龚自珍诗，见《秋心三首》（《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479 页）；下句为纳兰性德诗，仅易二字，见《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七十七则（第一册第 128 页）、《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 644 页引。

第 88 页,《清明口号》(1945):“清明时节雨昏沉,名唤清明滥到今。”按作意本诸屈復、孙原湘。《天真阁集》卷十三《清明》:“清明偏是不清明,绕屋风声杂雨声。”《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八册第 442 页录此诗,批注:“屈悔翁《弱水集》卷十四《清明》:‘两月风雨几朝晴,人家祭扫湖上行。桃花杏花岁岁好,清明难得是清明。’”

第 92 页,《还家》(1946):“十年著处迷方了。”按《谈艺录》(补订本)第 1 页:“余身丁劫乱,赋命不辰。国破堪依,家亡靡托。迷方著处,赁屋以居。先人敝庐,故家乔木,皆如意园神楼,望而莫接。少陵所谓:‘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每为感怆。”“著处迷方”,见杜甫《远游》:“迷方著处家。”仇注:“鲍照诗:南国有儒生,迷方独沦误。《杜臆》:‘迷方’本《论语》‘游必有方’意。”(《杜诗详注》卷十一)参观《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51 页《秋怀诗》之六“丧怀若迷方”句注。又第 96 页《赠乔大壮先生》(1948)“着处行窝且安隐”,第 100 页《生日》(1952)“身心着处且安便”,用“着处”一语,均本杜诗。

第 94 页,《秋怀》(1947):“容易一年真可叹,犹将有限事无穷。”按末用苏轼语,《管锥编》第三册第 878 页引苏轼《登玲珑山》:“足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诗见《施注苏诗》卷七。又《与黄裳书》附此诗,末句自注:“后山句。”(见

《钱锺书研究》第三辑第 293 页) 误忆主名。

第 98 页,《寻诗》(1949):“寻诗争似诗寻我,伫兴追通事不同。巫峡猿声山吐月,灞桥驴背雪因风。药通得处宜三上,酒熟钩来复一中。五合可参虔礼谱,偶然欲作最能工。”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二十一则载此诗,颈联作“钩来恰值秋虾美,得处何心上药通”,自注:“《分甘馀话》尝以胡擢、郑紫二人语相比。唐彦谦《索虾》云:‘姑孰多紫虾,极美宜于秋。既名钓诗钓,又作钩诗钩。’李义山《药转》云:‘换骨神方上药通’,‘忆事怀人兼得句’。《书谱》有‘五合’‘五乖’之论,‘偶然欲书’为‘五合’。叔子书来,谓余三年来罕作诗,近忽富篇什,殆渠所启发,因赋此答之。”

又按《管锥编》第三册第 1126 页:“孙虔礼《书谱》专为草书而发,论书家之‘五合’‘五乖’,乖始于‘心遽体留’,合终于‘偶然欲书’。‘心遽’非‘匆匆’欤,亦即不‘逸豫’耳。而‘偶然’即‘佳娱’兴到也。笔逸不停,意闲不迫,心舒手急,方合而不乖。”“五合”云云,见孙过庭《书谱》:“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

又《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二百七十二则:“《围炉诗话》卷四云:‘凡偶然得句,自必佳绝。若有意作诗,则初得者必浅近,第二层犹未甚佳,弃之而冥冥构思,方有出人意外

之语，更进不已，将至“焚却坐禅身”矣。’‘晚唐多苦吟，其诗多是第三层心思所成，盛唐诗平易，似第一层心思所成，而晚唐句远不及盛，不能测其故也。’……所谓‘第三层意’，王东淑《柳南随笔》卷六有一则似本此者：‘作诗有神来之句，所谓拾得也。若有意作诗，则初得者为第一层语，必浅近，即第二层犹未甚佳，弃之而冥冥构思，直至第三层，方有妙绪。然第三层意必出之自然，仍如第一层语乃佳，不然雕琢之过，露斧凿痕。’”（第一册第455页）钱诗意中，当亦有此数语在。

第100页，《生日》（1952）：“拂拭本来无一物，推挤不去亦三年。”按次句用苏诗，仅易一字，苏轼《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推挤不去已三年，鱼鸟依然笑我顽。”（《管锥编》第五册82页引）

又：“昔人梵志在犹未，今是庄生疑岂然。”按《谈艺录》（补订本）卷首《引言》：“僧肇《物不迁论》记梵志白首归乡，语其邻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管锥编》第二册第475—476页：“如《肇论·物不迁论》第一云：‘然则庄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所以临川，斯皆感往者之难留，岂曰排今而可往？人则谓少壮同体，百龄一质，徒知年往，不觉形随。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邻人皆愕然’。……柳宗元《戏题石门老东轩》：‘坐来念念非昔人’；邵雍《击壤集》卷一二《寄曹州李审言龙图》之二：‘向日所云“我”，如今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

后来谁?’皆‘薪尽火传’、‘无日不异’、‘犹昔非昔’之佳论也。”又参观《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六百八十一则（第二册第1449页）、六百九十六则（第二册第1545页）所论。

第101—102页，《答叔子花下见怀之什》（1953）四首之一：“槁木寒岩万念灰，春回浑似不曾回。”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十八则载此诗，自注：“‘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定厂主语（钱先生称‘定厂主’，疑误；厂主实亡名。《五灯会元》卷六亡名道婆章次：‘昔有婆子供养一庵主，经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饭给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么时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岂睹‘抱定’二字，乃以为‘抱定厂’耶），见《五灯会元》卷六。”（第一册第182页）

之二：“兔毫钝退才都尽，马齿加长鬓已苍。端赖故人相慰藉，不增不减是疏狂。”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十八则载之，自注：“《露书》卷二：‘《穀梁传》：“荀息牵马，曰：齿加长矣。”今读者皆以“长”音掌，余以为当音常，盖牛老则齿短，马老则齿长。’”

之三：“桃情柳思为谁春，诗老遨头迹已陈。怅绝一抔花下土，去年犹是赏花人。”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十八则载之，自注作：“君与余皆以诗见知于墨巢丈，园花

开时，必共燕赏，今则已矣”。

又按“桃情柳思”，乃仿张畅《若邪山敬法师谏》“孔思周怀”语，《管锥编》第四册第1231—1232页详论之，并讥后人于李汉“‘周情孔思’四字则匪特援用，抑且纷纷拟仿，却未有知张畅此《谏》伟词先铸者”，又举“以此语式写物色者”，如刘禹锡《洗心亭记》“鸟思猿情”、喻凫《经刘校书墓》“霜情月思”、刘过《沁园春》“柳思花情”等五六例。参观《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七百六十则（第三册第2232页）。

之四：“映河面皱看成翁，参到楞严法相空。输汝风流还自赏，临波照影学惊鸿。”自注：“来诗云：‘照影方塘瑟瑟波。’”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十八则载之，自注作：“《首楞严》卷二佛语波斯匿王观恒河，自伤发白面皱。来诗云‘抚鬓临流讶已翁’，可谓貌同心异”。语见《大佛顶首楞严经正脉疏》卷二（《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238—239页）。

第103页，《叔子重九寄诗见怀，余久未答，又承来讯，即和其韵》（1953）：“情怀验取报书迟，霜鬓争须四海知。且许营巢劳幕燕，聊堪生子话邻狸。”自注：“‘邻猫生子’云云，本梁任公《新史学》引语。”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三百十九则载此诗，题作“叔子无书经岁，忽寄怀一律，鬓丝脾肉，情见乎词，步韵奉答”（第一册第532页）。

又按“邻猫生子”云云，为英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语，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饮冰室文集》九）最早译此语者，为颜永京译斯氏《肄业要览》（*On Education*）：“史记与别物无异，终以有济实用为定，假如人告曰：‘邻家狸奴昨日已产小猫几只’，此固确实，在闻之者必谓此乃无用之新闻，而嗤其告者。何也？因所告者事虽确实，而与人在世之行作，毫无激励，亦毫无阻止，于学为完全人之义绝不相助。史记所载之事，亦无或异，所记者，实事也，但大半惟记其事，而不记肇事之端倪。”（1882年版）参观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139页所考。

第103页，《苏渊雷和叔子诗韵相简，又写示寓园花事绝句，即答。仍用叔子韵。渊雷好谈禅》（1953）。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一则载此诗，题作：“苏渊雷和孝鲁寄怀诗韵相简，又写示《寓园花事》绝句十六首，即答，仍用孝鲁韵。渊雷好谈禅，比闻尽弃所学，改名曰翻，以示口口（按原文涂去）从前种种之意，故诗语云然。”（第二册第949页）

第105页，《容安室休沐杂咏》（1954）十二首之一：“曲屏

掩映乱书堆，家具无多位置纔。容膝易安随处可，不须三径羨归来。”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十四则载此诗，自注云：“新寓颇隘，东坡尝欲筑小轩，榜曰‘容安’，本渊明语也。其意则某窃取之矣。”（第一册第178页）东坡此事，见《东坡志林》卷四“名容安亭”条：“陶靖节云：‘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轩，以‘容安’名之。”

又《我们仨》第131页：“锺书《槐聚诗存》一九五四年诗，有《容安室休沐杂咏》十二首，就是他周末归来的写实。这间小书房就是他的‘容安室’或‘容安馆’。由商务扫描的《容安馆日札》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容安馆’听起来很神气，其实整座住宅的面积才七十五平方米。由屏风隔出来的‘容安馆’仅仅‘容膝’而已。”

之二：“渐起人声昏晓际，难追梦境有无间。饶渠日出还生事，领取当前倚枕闲。”按《一个偏见》：“每日东方乍白，我们梦已回而困未醒，会听到无数禽声，向早晨打招呼。那时夜未全消，寂静还逗留着，来荫庇未找清的睡梦。……慢慢地，我们忘了鸟啭是在破坏寂静；似乎寂静已将鸟语吸收消化，变成一种有声音的寂静。此时只要有邻居小儿的啼哭，楼上睡人的咳嗽，或墙外早行者的脚步声，寂静就像宿雾见了朝阳，破裂分散得干净。人籁已起，人事复始。”（《写在人生边上》）

之三：“盆兰得暖暗抽芽，失喜朝来竞吐花。灌溉戏将牛乳

泼，晨餐分减玉川茶。”自注：“余十馀年来朝食啜印度茗一巨瓯。”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十四则载此诗，自注作：“余早食辄尽印度红茶一器，调以牛乳。”

又杨绛《我们仨》第78页：“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后来国内买不到印度‘立普登’（Lipton）茶叶了，我们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合在一起作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谈交友》：“存心要交‘益友’的人，便不像中国古人的品茗，而颇像英国人下午的吃茶了：浓而苦的印度红茶，还要方糖牛奶，外加面包牛油糕点，甚至香肠肉饼子，干的湿的，热闹得好比水陆道场，胡乱填饱肚子完事。”（《钱锺书散文》第73页）

之四：“翛然凤尾拂阶长，檐葡花开亦道场。楚楚最怜肠断草，春人憔悴对秋娘。”自注：“皆斋头物。”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十四则载此诗，“檐葡”作“萝葡”，自注作：“凤尾草、萝葡、海棠、秋海棠皆斋头物。”又杨绛《我们仨》第131页：“中关村新建，还没有一点绿色。阿瑗陪我到邻近的果园去买了五棵柳树种在门前。温德先生送给我们许多花卉，种在院子里。蒋恩钿夫妇送来一个屏风，从客堂一端隔出小小一间书房。他们还送来一个摆饰的曲屏和几盆兰花、檐葡、海棠等花和草。”

之六：“应是有情无著处，春风蛺蝶忆儿猫。”自注：“来京

后畜一波斯猫，迁居时走失。”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十四则载此诗，自注作：“旧畜波斯牡猫倭罗勇武，迁居时逸去。《开元传信记》妇人争猫，谓‘若是儿猫，即是儿猫’，《瑟榭丛谈》卷下释之，曰牡猫即我猫也。”杨绛《我们仨》第127页：“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这年的十月十六日，我家就从清华大学搬入新北大的中关园。搬家的时候，锺书和阿瑗都在城里。我一个人搬了一个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猫儿。锺书和阿瑗周末陪我同回旧居，捉了猫儿，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猫儿。我只觉猫儿在袋里瑟瑟地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第106页，之七：“如闻车马亦惊猜，政用此时持事来。”按上句用王安石，《谈艺录》（补订本）第82页：“《偶书》云：‘我亦暮年专一壑，偶闻车马便惊猜。’”下句亦宋人诗成句，《管锥编》第一册第332页：“《后汉书·刘玄传》记更始‘日夜与妇人饮谦后庭’、‘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韩夫人语经黄庭坚《戏咏高节亭边山攀花》第二首运用：‘北岭山攀取次开，清风正用此时来’，遂成江西社里人烂熟之典。……曾几《失题》：‘……小儿了不解人意，正用此时持事来’；……陆游《秋晴欲出城以事不果》：‘一官底处不败意，正用此时持事来。’”

之九：“一笑中年浑省力，渐将春睡当春愁。”按结句仿苏轼句律，《宋诗选注》第71页苏轼《春日》：“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

之十二：“袅袅鹅黄已可攀，梢头月上足盘桓。垂杨合是君家树，并作先生五柳看。”自注：“入住时绛于门前种柳五株，已成阴矣。”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四十四则载此诗，自注作“绛买柳五株栽屋前，遂为君家果后添一故事。”（第178页）所谓“君家果”，指杨梅，见《金楼子》卷六。又参观杨绛《我们仨》第131页，见前引。

第107—108页，《重九日雨》（1955）：“筋力新来楼懒上，漫言高处不胜寒。”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四百四十一则载此诗，天头小字注：“三月起，毛译七篇。”（第二册第1005页）其所指，不待说矣。

第109页，《向觉明达属题 Legouis 与 Cazamian 合著英国文学史君四年前自朝鲜归，道出安东，得之故书摊，为人借去，久假不归；比以事绝交，书遂还》（1956）三首之一：“火聚刀林试命回，又敦夙好拨寒灰。荒城失喜书棚在，也当慈仁寺里来。”自注：“清初慈仁寺廊下为旧书聚处，见孔东塘《燕台杂兴诗》。”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五〇六则载此诗，题作“向觉明属题 Legouis & Cazamian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四年前觉明

自朝鲜归，道出安东，得之一小肆，后假与人，此人以事绝交，始以书还”，诗则有二稿，第三句初稿作“残糟馀米都盛取”，自注作：“清初京师访书者皆趋慈仁寺廊下，孔东塘《燕台杂兴诗》四十首咏渔洋一绝可见。残糟馀米，晏叔[原]乞儿搬漆碗诗，见《墨庄漫录》卷三。”后复眷清，改之为“荒城失喜书棚在”，自注作：“‘且去昭州试命一遭’，章子厚语，见《墨庄漫录》卷一。清初旧书皆聚慈仁寺廊下，孔东塘《燕台杂兴诗四十首》言之。”（第二册第 826 页）

之二：“费尽胭脂画牡丹，翻新花样入时难。”按《宋诗纪事补订》第三册第 1140 页李唐《题画》：“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燕脂画牡丹。”钱先生于题旁加圈，知其赏之。

之三：“太息交游秋后叶，枝头曾见绿成阴。”按“太息”句用金农诗，《谈交友》：“一百年前的穆尔（Thomas Moore）定也在同样萧瑟的气候里，感觉到‘故友如冬叶，萧萧四落稀’（When I remember all the friends so link'd together, I've seen around me fall like leaves in wintry weather）的凄凉。对于秋冬肃杀的气息，感觉顶敏锐的中国诗人自卢照邻、高蟾直到沈钦圻、陈嘉淑，早有一般用意的名句。金冬心的‘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更觉染深了冬夜的孤寂。”（《钱锺书散文》第 74 页）金诗见《冬心先生集》卷一《秋来》。

第 110 页,《赴鄂道中》(1957) 五首之二:“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自注:“《宋诗选注》脱稿付印。”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三十四则载之,自注作:“余选注宋诗甫卒业。”(第二册第 1231 页)又按《宋诗选注》第 91 页唐庚小传:“唐庚还有句名言:‘诗律伤严似寡恩’,若用朱熹的生动的话来引申,就是:‘看文字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用法深刻,都没人情’。”《邓之诚文史札记》(1959 年 7 月 8 日):“吴兴华来,言:有钱锺书者作《宋诗选注》,自谓过厉樊榭远甚。”(凤凰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14 页,《偶见二十六年前为绛所书诗册电谢波流似尘如梦复书十章》(1959) 之三:“不知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按《我们仨》载此诗手迹,附杨绛说明:“第三首引用北齐崔氏《齧面辞》:‘取红花,取白雪,与儿洗面作光悦。取白雪,取红花,与儿洗面作妍华。取花红,取雪白,与儿洗面作光泽。取雪白,取花红,与儿洗面作华容。’”出处却未注。又按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2286 页载此诗,字句全同,知为所据。逯氏校云据《太平御览》、《事类赋》、《岁时广记》及《岁华纪丽》引虞世南《史略》录之,而检《太平御览》诸书,并无“取花红,取雪白,与儿洗面作光泽”句,有之,自冯惟讷《古诗纪》始。逯校殆不足凭。又作者崔氏,诸书多作“卢士深妻”,偶或作“卢士琛”,则以形近致误。惟《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载此事,误作“卢士逊”,莫晓其故。又《钱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九册第 604 页亦录此诗。

第 119 页，《答燕谋》（1964）：“兄事肩随四十年，老来犹赖故人怜。比邻学舍灯穿壁，结伴归舟海拍天。白露蒹葭成道阻，春风桃李及门妍。何时北驾南航便，商略新诗到茗边。”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三十九则后载此诗，“结伴”作“作伴”，“南航”作“南舫”，自注：“定厂《己亥杂诗》：‘南舫北驾怨三生。’”（第三册第 2046 页）又“兄事”句旁，有小字注“（一九六四年）杨绛按。”知此诗编于 1964 年，为杨绛所定。

第 125 页，《王辛笛寄茶》二首之一：“却遣茶娇故相恼，从来佳茗比佳人。”按次句用苏诗，易一字，《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施注苏诗》卷二十九）

第 127 页，《西蜀江君骏卿不知自何处收得余二十二岁所作英文文稿，藏之三十年，寄燕谋转致并索赋诗以志》（1976）：“莫向长卿征梦兆，文章巨蟹未横行。”自注：“旧沿日语称西文为蟹行文。日人森大来《槐南集》卷八《七月七日作》之三所谓‘螭螭文字好横行’。”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五册第 98 页森大来《槐南集》，于卷八《新年作》“上苑曾经传马戏，贵人从此爱洋装”句批注：“同卷《七月十日作》第三首：

‘蟋蟀吟声须少歇，螿蜩文字好横行。’”

第 128 页，《燕谋以余罕作诗寄什督诱如数奉报》（1977）：“分明眼底难寻处，渺莽江头欲拾时。”按《宋诗选注》第 93 页唐庚《春日郊外》：“疑此江头有佳句，为君寻取却茫茫。”注：“眼前景物都是诗意，心里忽有触悟，但是又写不出来。参看苏轼《和陶〈田园杂兴〉》：‘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茫’；陈与义《对酒》：‘新诗满眼不能裁’；又《春日》：‘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又《题酒务壁》：‘佳句忽堕前，追摹已难真’。”又《谈艺录》（补订本）第 131、455 页引诗略同，可以参观。

又：“举头鹊噪频闻喜，盈耳蛙鸣尽属官。”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七册第 17 页张岱《柳塘文集》卷一《石匱书自序》：“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谏，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批注：“宗子不知家史、野史绝迹，而国史独成一诬妄之世界，今有其事也。余诗所谓‘举头鹊噪频闻喜，盈耳蛙鸣尽在官’。”

第 131 页，《大千枉存话旧即送返美》（1981）：“十日从来九风雨，一生数去几沧桑。”按辛弃疾《祝英台近·晚春》：“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稼轩长短句》卷七）又《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 514 页杨寿枏《觉花寮杂记》：“易石甫诗：‘十日九风偏少雨，一春三月总如烟。’善状北京风物。”

第 136 页，《代拟无题七首》（1991）之五：“休凭后会孤今夕，纵卜他生失故吾。”按此本钱载诗，《谈艺录》（补订本）第 182 页：“（蔣石）《追忆诗》二十九首悼亡之作，皆苦平钝，惟第二首之‘来生便复生同室，已是何人不是君’，透过一层，未经人道。”又第 638 页：“王静庵《苕华词·蝶恋花》：‘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即蔣石《追忆诗》所谓：‘他生便复生同室，已是何人不是君！’”

自序：“本寡交游，而牵率酬应，仍所不免。且多俳谐嘲戏之篇，几于谑虐。代人捉刀，亦复时有。此类先后篇什，概从削弃。……绉谓余曰：‘与君皆如风烛草露，宜自定诗集，俾免俗本传讹。’因助余选定推敲，并力疾手写。余笑谓：他年必有搜集弃馀，矜诩创获，且凿空索隐，发为弘文，则拙集于若辈冷淡生活，亦不无小补云尔。”按此实师《石遗室文集》自叙作意。其文云：“生平无韵之文，无虑二三千首。教授京师、武昌各学校，说经之文数百首，论史之文数百首，论文之文百十首；佐幕台北、武昌，草奏书札数百首；卖文上海十年，寿言即数百首，杂报论说又数百首；其少时里居，课经义治事词章于书院者不数焉。今皆弃不取。尚有数百首属于记载告语各类。不于吾身尚存，择其稍雅驯者，都为一集，则前所云二三千首中流落人间必复不少，异日有攉拓旁述，谬附知言而代梓之者，则多非吾心所愿存，死者虽未有知，而隐隐不甘之情，郁于天壤，亦何惜不预

为之所也。故删存如左。”又按《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三云：“今人喜搜集前人逸稿，多为本人所删弃者，转以暴前人短处矣。”《陈石遗先生谈艺录》第四十一条云：“故为子孙者，刊其祖父之著作，不择精粗美恶，惟求多多益善者，自谓孝子，实罪人也。”轻视辑佚，并不欲旁人搜辑已弃，固钱、陈之所同也。

钱边缀琐

《围城》第23页：“苏小姐有不少小孩子脾气，她会顽皮，会娇痴，这是他一向没想到的。可是不知怎样，他老觉得这种小姐儿腔跟苏小姐不顶配。……譬如小猫打圈儿追自己的尾巴，我们看着好玩儿，而小狗也追寻过去回头跟着那短尾巴概乱转，就风趣减少了。”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九十一则：“*The Notebooks of S.T. Coleridge, I §1295*: ‘All animals have a sense of joke—Calfs with their Horns—Dogs biting—women abusing their infants.’ 按小狸奴之自逐其尾，亦是一例，不特如志明《野狐放屁诗》第二十七首所谓‘唤小猫儿戏纸毬’已也。”（第二册第1492—1493页）

《围城》第31页：“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七十则：“《韩非子》第

三十二《外储说左上》：‘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袴，其妻问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袴。’（《御览》卷六百九十五：‘妻因凿新袴为孔。’）辜汤生《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下‘依样葫芦’：‘中国乾嘉间，初弛海禁，一西人衣敝，当时无西人为缝纫者。无已，招华成衣至，问：“能制西式衣否？”曰：“有样即可。”因检故衣付之。越数日，将新衣至，一切无差，惟衣背后剪去一块，又补缀一块。骇然问故，曰：“我照样做的耳。”’”（第一册第736—737页）

《围城》第70—71页：“元朗推开扇子，高声念了一遍，音调又像和尚施食，又像戏子说白。鸿渐一字没听出来，因为人哼诗跟临死呓语，二者都用乡音。”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四十三则：“《广阳杂记》卷一云：‘大兄云：满州掳去汉人子女，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直无别，至老年，乡音渐出矣，虽操满语，其音则土，百不遗一云。予谓人至晚年，渐归根本，此中有至理。予十九岁去乡井，寓吴下三十年，自忘为北产。丙辰之秋，大病几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梦寐中所见境界，无非北方幼时熟游之地。’日本原公道《先哲丛谈》卷二：‘朱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倭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盖穷则返本，病危年老，妇人免身，皆存在主义所谓 Nullpunkts Existenz Grenzsituation 也。”（第一册第68页）

又按：周作文《关于朱舜水》亦引朱此事，见《药味集》。

《围城》第75页方鸿渐说：“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五十则：“《藏弃集》卷二王相说《与宫紫元》云：‘秀才要中两榜，如一日定于两餐，定一餐便饥，决不可耐。中后做官如饮酒，兴会所至，不妨多数行，或主人意懈，或席有骂座客，便可拂袖去，亦不少个甚。’按《春在堂随笔》卷十引此牍云：‘此语甚隽，吾生平两餐已具，但少饮几杯酒耳。’王壬秋《天影庵诗存序》（《大中华》第一卷第九期）云：‘保之因笑君慕词林，五子中乃无一词林，若在道光朝，皆不得比士大夫，敢言诗乎。君固词林才，诡得卒失，馀四人皆未第进士。明人有云：进士如朝饔夕飧，官如酒肴。人可无酒肴，不可不食。然则四子皆饿夫，君犹幸不饥，则诗固未穷也。’云云，亦正指此。”（第三册第2145页。又《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525页亦录王序）

《围城》第113—114页：“方遯翁为了三媳妇的病，对家庭医药大起研究的兴趣。……他书桌上正摊着《镜花缘》里的奇方摘录在《验方新编》的空白上。”按此实钱基厚事。《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377页：“（《烟桂绪录》）好载药方，为叔父见，当如以《镜花缘》中诸方补入《验方新编》矣。”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如说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得此为一证。

《围城》第123页：“斜川笑道：‘别胡闹，我对教书没有兴趣。’”按此为世传秦桧诗。《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259页《宋人轶事汇编》：“秦桧微时，曾为童子师，仰束脩自给。有诗云：‘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猻王。’”又第296页载答徐燕谋一七绝，题为《燕谋嘲余好货》，云：“水田三百不如归，只有解人秦会之。乞取来年无事饱，也能卧看挂蛛丝。”亦用此语。又秦桧此诗，见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六，《宋人轶事汇编》据《坚瓠集》录之，今人《全宋诗》卷一七五九据《山堂肆考》录之，均非其朔。

《围城》第152—153页写李梅亭大铁箱带了许多药品，又第283页苏文纨坐飞机，“总带些新出的化妆品、药品、高跟鞋、自来水笔之类”。按《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4月30日）：“他（指冯友兰）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大似现实模仿小说。

《围城》第208页：“辛楣说：‘……我想这几年来高松年地位高了，一个人地位高了，会变得糊涂的。’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

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按鲁迅《花边文学·商贾的批评》：“亚波理奈尔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鲁迅全集》第五卷第 592 页）亚波理奈尔即 G. Apollinaire，语见其《动物寓言诗》（*Le Bestiaire*）；《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四百七十则（第一册第 738 页）亦征引及之。又《我们仨》第 129 页：“锺书‘格物致知’，发现孔雀开屏并不是炫耀它那金碧辉煌的彩屏，不过是掀起尾巴，向雌孔雀露出后部。”

《围城》第 218 页：“汪处厚在新丧里做‘亡妻事略’和‘悼亡’诗的时候，早想到古人的好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只恨一时用不上。”按此为张问陶诗，见《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 623 页《张船山诗草》。

《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按《诗可以怨》：“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Der Schmerz macht Hühner und Dichter gackern*）。”并注：“《扎拉图斯脱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第 4 部第 13 章，许来许太（K. Schlechta）编《尼采集》（1955）第 2 册第 527 页。”（《七缀集》第 120 页、第 133 页）又《管锥编》第二册第 535 页论

《焦氏易林》作者云：“苟得主名，亦似于知其人、读此书，无甚裨益。”亦同此意。

《读伊索寓言》：“蝙蝠碰见鸟就充作鸟，碰见兽就充作兽。人比蝙蝠就聪明多了。他会把蝙蝠的方法反过来施用：在鸟类里偏要充兽，表示脚踏实地；在兽类里偏要充鸟，表示高超出世。向武人卖弄风雅，向文人装作英雄；在上流社会里他是又穷又硬的平民，到了平民中间，他又是屈尊下顾的文化份子。”

《魔鬼夜访钱锺书》：“我会对科学家谈发明，对历史家谈考古，对政治家谈国际情势，展览会上讲艺术赏鉴，酒席上讲烹调。不但这样，有时我偏要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论文艺，因为反正他们不懂甚么，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写在人生边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按必是讥林语堂。《林语堂自传》：“有一位好作月旦的朋友评论我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原意不是一种暗袭的侮辱，我以为那评语是真的。”（《林语堂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版，下册第 445 页）

又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 348 页：“朱子论学多矛盾，盖因两面夹攻，似如今‘中间路线’然。对陆子静门下则言博，对吕伯恭门下则言约，既曰书无不可读，复曰《左传》、《史记》读做甚，处境煞难也。”又第三册第 302—303 页录《吴挚甫尺牍》：“《答张化臣》：‘某学既荒落，从宦又不能其官，进退两无所据。居常自戏：若见学徒，吾当以官傲之；’

若见仕宦人，吾当复拄笏看云，睥睨人外。”并可参观。

《释文盲》：“在教书投稿以外，还知道有学问。”（《写在人生边上》）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二则：“取士有功令，则士之操术，别为两途：曰举业，进身之道也；曰学业，切身之事也。苟欲合而一之，以举业为学业，陋儒是矣；或以学业为举业，曲学是矣。惟有并行，庶不偏废。”（第二册第1628页；又按《谈艺录》（补订本）第353页增入此节，文字有修改。）

《一个偏见》：“人生在世，言动专求合理，大可不必。当然，所谓正道公理压根儿也是偏见。”（《写在人生边上》）按林语堂《谈学者的尊严》：“世界上本没有‘公论’这样东西，凡是诚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论’、‘偏见’，若怕讲偏见的人，我们可以决定那人的思想没有可研究的价值；没有‘偏见’的人也就根本没有同我们谈话的资格。”“惟有偏见乃是我们个人所有的思想，别的都是一些贩卖、借光、挪用的东西。凡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偏见充分的诚意的表示，都是有价值。”（《林语堂文选》上册，第212—213页）

《谈教训》：“老实说，世界上是非善恶邪正等等分别，有时候也不过是人我的差异。”（《写在人生边上》）按赵绍祖《消暑录》：“乾隆丙午谒一前辈，谈论之次，忽语余曰：‘武三思之

恶不待言，然亦有过人者。’余请其故，乃曰：‘三思之言曰：“我不知何者为好人，何者为恶人，但与我好者为好人，与我恶者为恶人。”此等直言，后人不肯道也。’”武三思语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原作：“尝言不知何等名作好人，唯有向我好者，是好人耳。”又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记徐乾学语：“但是说臣好的便是君子，但是说臣不好的便是小人。”亦可参。

又按：《三国志·魏志》卷十三《钟繇传》注引《魏略》：“（钟）繇答书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当道情，爱我者一何可爱，憎我者一何可憎。’”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先生提出了许多文学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没有能‘swim into his ken’；这个人便是张大复。他的《梅花草堂集》我认为可与张宗子的《梦忆》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荣誉，虽然他们的风味是完全不相同。此人外间称道的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按此文刊后，周作人有回应语，见《〈梅花草堂笔谈〉等》（收入《风雨谈》）。钱先生于张大复书，后来见解，亦略有所变。《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十七则：“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十四卷，二十五年前颇喜读之，晚明小品之不步趋公安、竟陵，欲雅适上追《东坡志林》者。《梅花草堂集》卷十三《台行记题词》谓‘公安、竟陵镂空画天，而不免佻巧淫佚’，可见宗尚。终恨纤仄，不能‘素面朝天’，以本来色相，‘大踏步走出’耳。

然性多嗜欲，而身病家贫，八苦相缠，七件无著，故于世缘道心，颇多体会，较萧伯玉‘春浮园诸录’，稍为深挚也。”（第一册第180页）又第六百五十二则：“张大复《梅花草堂集》。明季小品，皆出于眉山苏氏，公安、竟陵无论矣，元长尤倾倒，至画像以供，推为古今一人，其文可与三教圣人之书并传（卷一《苏长公编年集小序》）。运以八股之机调，缀以《世说》之词藻，则与钟、谭为近，而于三袁为远。若夫纤徐摇曳以取致，又其乡先生归太仆之遗教，视三袁之爽利，钟、谭之峭仄，皆不侔；苦心思不新异，韵致遂亦乏短，东吴不能与西楚抗衡者以此（卷十六《闻谭友夏沈去疑各解省喜而有作》云：‘西楚已闻悬大吕，东吴复听奏金镛。’），转逊《梅花草堂笔谈》之耐人寻讽。”（第二册第1321—1322页）

《读〈拉奥孔〉》：“苏轼另有‘红’‘翠’合用的名句：‘一朵妖红翠欲流。’（《苏诗合注》卷一一《和述古冬日牡丹》）既说花‘红’，又说它‘翠’……原来‘翠’不是真指绿颜色而言，‘乃鲜明貌，非色也’（参看冯注，又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八）。……试把‘翠欲流’改为同义的‘粲欲流’，那句诗就平淡乏味、黯淡减‘色’了。”（《七缀集》第40页）按训“翠”为“鲜明”，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冯注已引之；所谓“粲欲流”，则本《困学纪闻》：“嵇叔夜《琴赋》云：‘新意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鲜色。’……以鲜明为翠，乃古语。”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陆务观记东坡诗‘翠欲

流’，谓‘蜀语鲜翠犹言鲜明也’。按《说文》：‘淖，新也。’七罪反，与翠同音，故谓鲜新为鲜翠。”亦可参观。又，苏轼《南乡子·宿州上元》词：“浅黛横波翠欲流。”（《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5页；《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66页）亦用此语，注坡词者，皆失注。

《宋诗选注》第35—36页文同小传：“具体的把当前风物比拟为某种画法或某某大画家的名作……这可以说从文同正式起头。例如他的《晚雪湖上寄景孺》：‘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长举》：‘峰峦李成似，涧谷范宽能’；《长举驿楼》：‘君如要识营邱画，请看东头第五重。’……在他以后，这就成为中国写景诗文里的惯技，西洋要到十八世纪才有类似的例子。”按辛弃疾《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则以山水比为某大家之文章，运思尤奇，亦创格也。又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第二篇写陕北：“很少有真正的山脉，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象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常常象毕加索一样触目。”（据董乐山译本；原文为：There are few genuine mountains, only endless broken hills, hills as interminable as a sentence by James Joyce, and even more tiresome. Yet the effect is often strikingly like Picasso.）亦堪连类。

《宋诗选注》第126—127页，曾几《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注：“这一联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床床屋漏无干处’和《春日江村》的‘春流岸岸深’。”按王应奎《柳南续话》卷一“床床非雨声”条：“杜诗‘床床屋漏无干处’。‘床床’二字，自来无注，而后人用者多作雨声。余意床床句，自是跟上两句说；言床上布衾，儿既踏裂，而屋内所设之床，无不漏湿，岂能安眠到晓乎？作如此解，六句方一串。‘床床’犹言村曰‘村村’，家曰‘家家’，不作雨声。后见曾茶山《七月大雨三日》诗，颌联云：‘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声。’以‘岸岸’对‘床床’，且下一湿字，此亦足以徵吾之说矣。”钱注较胜。

《宋诗选注》第203页，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犹是晓晴风露下，采桑时节暂相逢。”注：“养蚕的时候，忌陌生人进门。南宋人诗里常写这种风俗。例如项安世《建平县道中》：‘村村煮酒开官坊，家家禁忌障蚕房’（《平菴悔稿》卷二）；赵汝鏊《耕织叹》：‘生气熏陶蚕满纸，采桑女儿闾如市；昼饲夜餵时分盘，扃门谢客谨俗忌’；又《蚕舍》：‘每到蚕时候，村村多闭门；往来断亲党，啼叫禁儿孙’（《野谷诗稿》卷一、卷五）；叶绍翁《田家三咏》：‘家为蚕忙户紧关’（《南宋群贤小集》第七册《靖逸小集》）。”按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9

页，苏轼《浣溪沙》：“麻叶层层繖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注：“从前江南养蚕的人家禁忌迷信很多，如蚕时不得到别家串门。这里言女郎隔着篱笆说话，殆此风宋时已然。”亦可比观。钱注云“陌生人”，语欠确。

《石语》第32—33页：“琴南既歿，其门人朱某记乃师谈艺语为一书，印刷甚精，开卷即云：‘解经须望文生义，望文生义即以经解经之谓’；又曰：‘读经有害古文’。皆荒谬绝伦语。余亟嘱其弟子毁书劈板，毋贻琴南声名之玷。其弟子未能从也。按：朱名羲胄，潜江人。其书名《文微》。石遗书与朱答书均附卷末。‘望文生义’条遵石遗语删去，而于‘经与古文’之辨，则断断不相下。畏庐书多陈腐空谈，有一则云：‘东坡每谓东野诗如食小鱼，此外无他语。’真咄咄怪事。且极诋桐城派。盖暮年侈泰，不无弇州所云‘舞阳绛灌，既贵而讳屠狗吹箫’之意也。”按所谓“解经须望文生义”云云，并未“遵石遗语删去”，见《文微·籀诵》第十条（亦并非“开卷即云”）：“望文生义，宋学家之言，所谓‘以经解经’者也。文家苟持此义以诵习古书，则亦可以自有把握。”（《文微》附朱书云：“今决如其字数而易其文，以挖改之。”又附陈衍书云：“至‘望文生义’一条，尤大误、大误。‘望文生义’乃至不好之名词，乃谓并不知其义而照字面妄解者也，与以经解经相去奚啻万里；‘以经解经’乃至好之名词，谓以此经之义证彼经可为铁据者也。两说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如离娄与瞽者之相反。此条不删，畏庐之名扫地矣。”）又按《文微·论诗词》“东坡每谓东野诗如食小鱼”下，并无“此

外无他语”五字，钱先生亦误忆。又批评“桐城派”者，仅二条，见《文微·唐宋元明清文评》：“桐城诸文学欧阳，而仅得其淡，故气息柔弱。”又：“桐城之短在专学归、欧。”似不可谓之“极诋”。

《石语》第34—35页：“季刚不知在何处曾从学于江叔海，尝谓余曰：‘叔海无所不知，而亦一无所知。’叔海倾心东洋人，好拾其说，讲古学。余语叔海云，此等事不如让梁卓如出头地。叔海不快。锺书对曰：‘叔海《慎所立斋诗文集》有季刚与奚度青题词，皆自居弟子。叔海议论确有近任公者，任公推王荆公为第一大政治家，叔海《半山寺诗》用意亦同。’丈曰：信有此耶？按：《半山寺诗》云：‘理财心本殊桑孔，绍述谋应罪卞京。今日尚留新法在，后儒底事浪讥评。’自注曰：‘保甲免役，至今行之，不独社仓为青苗遗法也。’按：范肯堂《伯子诗集》有《东坡生日诗》，极推荆公而斥东坡之立异，此郭匏庐所谓‘不谓闭门范伯子，已曾奋笔诤东坡’也。盖任公推荆舒，实为戊戌变政解嘲，伯子亦有同感耳。叔海则翻案也。又按：叔海《东游绝句》论童蒙教本，与石遗《童孙诗》针锋相对，当时忘记，未能对丈言之。江诗云：‘花笑爷同桃太郎，教科书颇近荒唐。须知道本在粗浅，高语精微毋乃狂。’陈诗云：‘《千家诗》是潜夫选，《三字经》原伯厚成。绝世文人从此出，教科坊本漫争鸣。’”

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316—318页：“江瀚《慎所立斋文集》。……《文集》目录有黄季刚按语，自称弟子，又曰：‘幼曾受读，近荷传书。’《诗集》卷八有《得门人黄季刚上海书却寄》五律。想后来季刚早谢本师矣。”又：“（诗

集)卷六《东游绝句》第十四首有云:‘花笑爷同桃太郎,教科书颇近荒唐(寻常小学校,第一学年教授‘花笑爷’、‘桃太郎’而外,如亲猿子猿及龟兔燕雀之话,皆极鄙浅,盖取其易知易入,与吾国以《大学》、《中庸》课孩提者异矣)。须知道本在粗浅,高语精微毋乃狂。’按陈石遗丈《童孙诗》后半云:‘《千家诗》是潜夫选,《三字经》原伯厚成。绝世文人从此出,教科坊本漫争鸣。’适可参观。”“又卷六《半山寺感王荆公事》:‘理财心本殊桑孔,绍述谋应罪卞京。今日尚留新法在(保甲免役,至今行之,不独社仓为青苗遗法也),后儒底事浪讥评。’按此诗作于光绪三十年,梁任公‘大政治家王安石’之说,已著书行世矣。范肯堂《伯子诗集》卷十二《东坡生日临觞有感》(光绪二十五年)略云:‘祇言新法乱人纪,诟谓旧学诛民彝。公乎来游听我告,安石正论经天垂。不佞天人不法祖,彻骨剖辨无瑕疵。当时堂堂宋天子,将与万国为轩羲。’末句云:‘聊以弟子诤其师。’此郭春榆《匏庐诗存》卷九《续题近代诗家集后》所以曰:‘荆舒变法竟如何,一鼓横流动万波。不谓闭门范伯子,已曾奋笔诤东坡’也。《刘文清公遗集》卷十二《舒城怀荆公作》早已翻案,有长序力为荆公开脱,诗云:‘贫弱深将国脉忧,争教得柄缓持筹。诸公不激终当悔,小子何知竟与谋。一县青苗民亦便,到今免役法仍优。初心本为苍生出,安石宁宜处仲侔?’蒋心馥《忠雅堂诗集》卷十三有《读荆公集》二律,已云:‘立法至今难尽改,存心复古岂全非?’‘得君许用匡时策,言利非同为己谋。’又同卷《读宋人论新法劄子》下半首

云：‘本欲针刀苏鞴疾，谁知药石付庸医？后来十九遵遗法，功罪如何请细思。’又邵堂子山《大小雅堂诗钞》卷五《论诗六十首》云：‘稷离空劳自致身，临川诗格瘦嶙峋。祇今诗法流传遍，未必周官定误人。’盖乾嘉以后，议论一变，世人仅知梁任公而已。”参观《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八十四则（第一册第262页）。

又按刘墉诗为荆公开脱，近人王逸塘已先拈出；见《今传是楼诗话》（《民国诗话丛编》本）第503条：“诸城刘文清公石庵，遭际承平，敷历中外，其相业为书名所掩，且工诗而诗名亦不著。……又《舒城怀荆公作》，亦足为吾家半山张目者。诗云云，自注：‘李师中谓荆公似王敦，宋人记师中极谄荆公，若尔，其言何足据乎。’荆公变法，毁誉参半，文清此语，足为雪诬。至《诗序》中所谓‘痛元泽之死，而以名世归之，拟非其伦，几于侮圣，荆公何至于此。’又如：‘对明道先生出言狂易，唐突富、韩两公，元泽亦何敢乃尔。夫《周秦行纪》之不出于牛奇章，《碧云騞》之不出于梅宛陵，前人已辨之矣。于荆公父子佚事，奚不可为申论之乎。’尤见论史特识。”（《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141页节录此条）

《石语》第37页：“锺嵘《诗品》乃湖外伪体之圣经，予作《评议》，所以捣钝贼之巢穴也，然亦以此为湘绮门下所骂。……锺书问曰：‘丈于陈伯弢、宋芸子以为何如？抱碧斋之精洁，问琴阁之风华，所谓智过其师，青出于蓝者耶？’丈曰：世兄言

或是，惜老夫于二家著述，所见不多。”按此为其少时见解，后来则大肆贬斥，几无是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云：“《衰碧斋集》。稍有声格，了无才思，七古佳处皆湘绮体，七律始终不成体制，每似打油。”（第十三册第79页）又云：“《问琴阁文录》。骈文不妥丽，偏枯窘隘，又无晋宋闲雅之致。”“《问琴阁诗录》。好为玉谿生体，而笔懈词俗。”（第五册第534页）

《石语》第39页：“陈散原诗，予所不喜。凡诗必须使人读得、懂得，方能传得。散原之作，数十年后恐眇过问者。早作尚有沈忧孤愤一段意思，而千篇一律，亦自可厌。近作稍平易，盖老去才退，并艰深亦不能为矣。为散原体者，有一快捷方式，所谓避熟避俗是也。”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略看《散原精舍诗》。笔力自雄，格韵自高，写景物语，尤能化主人客，视之猝不易解，而略嫌支空架子，盖怀抱深远，而作意甚浅，适与石遗翁反，石遗有作意而无微衰也。亦祇有五七律可讽咏，五律尤炼，惜多复语。古诗直所谓‘艰深文浅陋’者，七古平韵且多不合格。其诗句调自是宋人，而炼词纤秣奥衍，参以选体，好以生字代习见字，近南北朝伎俩。屡用照字、疮雁字、携字、魂气字、摇鬓字，东字皆敢叠押，如后山语为养一所指摘者。颇谈新学，驱遣新名词，径类《新民丛谈》所谓‘哲学诗’，其见采于《饮冰室诗话》，宜哉。故其意境，则志士也、维新党也、遗民也，风格则南北宋之雄口也、南北朝之雕琢也、东野之透辟也，非西江派所可尽，亦非西江派所得知

也。”（第二册第 120 页）

《石语》第 40 页：“郑苏戡诗专作高腔，然有顿挫故佳。而亦少变化，更喜作宗社党语，极可厌。近来行为益复丧心病狂，余与绝交久矣。”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云：“海藏辛亥以后诗，便千篇一律，更不足观。”又：“海藏大言，胡瘦唐《国闻备乘》已讥之。《寄答张贞午》云：‘抵掌为大言，临事苦才尽。’盖亦自知之。时作英雄骯髒语，久亦可厌。功必自伐，晚岁真以再造山河自名，以溥仪入日使馆，亦复独引为己功，夸大可笑。一则曰席卷燕云，再则曰收口；一则曰囊智，再则曰囊智，何言之不祚也。卷十三《新邑》七古一首，可见其悻悻然得意雪恨，纯出负气矣（‘党人駸很绝无顾，意轻死灰不复燃’云云、云云，‘自顾熟视无泰山’）。《淡路丸舟中》一绝曰：‘同洲二帝欲同尊’，其果然耶。尤可笑者，欲以墨索里尼自比（卷十二《题吴蔼宸译墨索里尼传后》七律有云：‘使我前筹或更奇。’又自注：‘上尝书“国士无双”语遗意相’），而以弑厂比兴登堡（同卷《弑厂八十六岁生日》：‘英豪当代兴登堡，名节千秋听水楼。并世天教系王室，一时人望重神州’），又欲自比诸葛而以其子垂比关张（《残春》云：‘关张无命肠堪断’）。”（第一册第 625—626 页）

《谈艺录》（补订本）第 15 页：“《次韵德孺惠贶秋字之句》云：‘顾我今成丧家狗，期君早作济川舟。’天社注引《史记·孔

子世家》：‘累累然若丧家之狗。’按黄东发《日钞》卷六十五谓‘丧家狗’之‘丧’本平声，山谷作去声用。其说是也。《史记集解》引王肃及《韩诗外传》，皆谓是丧事人家之狗，山谷误以为无家之狗。……宋人多读去声，后来沿袭其讹。”按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二：“无锡国学馆门人徐义，字仁甫……《战区农民归耕咏》云：‘劫后人如犬丧家，归来触景总堪嗟。’……丧家狗本当作刍狗解，丧读平声，然东坡、山谷诗，已作失家之犬用矣。”

《谈艺录》（补订本）第81—82页：“《葛溪驿》云：‘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雁湖无注。按《艇斋诗话》云：‘予尝疑夜间不应有蝉鸣。后见说者云：葛溪驿夜间常有蝉鸣。此正与寒山半夜钟相类’；张文虎《舒艺室剩藁·书艇斋诗话后》云：‘不知李义山已有“五更疏欲断”之语。’”补订：“唐彦谦更以《夜蝉》为题，有曰：‘清夜更长应未已，远烟寻断莫频嘶。’”按朱自清《荷塘月色》，新文学名篇也，亦涉蝉夜鸣事，尝有致书质疑者，朱作《关于‘月夜鸣蝉’》（见《朱自清全集》第四卷）答之，并及《葛溪驿》诗。其事，亦当日一公案。又按辛弃疾《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可补引。

《谈艺录》（补订本）第187—188页：“戴石屏：‘春水渡傍渡，夕阳山外山’，《归田诗话》卷中谓初见夕照映山得下

句，欲对不惬，后睹雨霁行潦得上句，始相称。”夹注：“《中兴群公吟稿》戊二，又袁选《石屏续集》三均有一诗题，略云：‘赵用父问近诗，因举“今古一凭栏、夕阳山外山”两句，未得对。用父以“利名双转毂”对上句，刘叔安以“浮世梦中梦”对下句，遂足成篇。仆终未惬意。都下会范鸣道，以“春水渡傍渡”为对，当时未觉此语为奇。江东夏潦无行路，逐处打渡而行，溧水界上，一渡复一渡，时夕阳在山，分明写出此一联诗景。恨不得与鸣道共赏之。’诗曰：‘世事真如梦，人生不肯闲。利名双转毂，今古一凭栏。春水渡傍渡，夕阳山外山。吟边思小范，共把此诗看。’则此联非石屏自得，瞿氏说误。诗题言以刘叔安句足成篇，而诗乃曰：‘吟边思小范’，则是成篇以后，至是方改为定本也。马金辑《石屏诗集》卷四载此诗，尽削其题，仅取诗首二字，标曰：《世事》，则小范不知所指矣。”按沈涛《铜鬋斗斋随笔》卷八“石屏诗句”条：“瞿佑《归田诗话》云：‘戴式之尝见夕照映山，峰峦重叠，得句云：“夕阳山外山。”自以为奇。欲以“尘世梦中梦”对之，而不惬意。后行村中，春雨方霁，行潦纵横，得“春水渡旁渡”之句，以对，上下始相称。’案《石屏续集》有一题云：‘三山宗院赵用父问近诗，因举“今古一凭栏”、“夕阳山外山”两句未对，用父以“利名双转毂”对上句，刘叔安以“浮世梦中梦”对下句，遂足成篇。和者颇多。仆终未惬意，都下会李好谦、王深道、范鸣道，相与谈诗，仆举此话，鸣道以“春水渡傍渡”为对，当时未觉此语为奇。江东夏潦无行路，遂处处打渡而行，溧水界

上，一渡复一渡，时夕阳在山，分明写出此一联诗景。恨不得与鸣道共赏之。’其诗结句云：‘吟边思小范，共把此诗看。’然则此句乃范鸣道所对，非石屏自对也。‘浮世梦中梦’亦刘叔安所对。”

《谈艺录》（补订本）第242页：“若子才所说，则‘山头’、‘水面’、‘石脚’、‘河口’等，皆为穿凿。……桂未谷《札朴》卷三尝论木以‘头’称，盖取义于人。随园不解近取诸身之义，识在经生之下。”按黄曾樾辑《陈石遗先生谈艺录》：“作诗忌太熟字，如‘山头’、‘岭头’之类，必当避去，以山岭上头确似人头也。‘山顶’、‘岭顶’亦然。‘江头’、‘渡头’则不然，江之口、渡之旁，则不甚似人头矣。此等处消息甚微，‘竹头抢地’，则反见语妙。”则另明一义，亦资参观。

《谈艺录》（补订本）第263—266页，论“六经皆史”。按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卷五“王守仁五经皆史说”条：“章实斋于《文史通义》开言云：‘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自有此大声疾呼，而后六经乃有独立存在之地位。龚定盦承实斋之学作《六经正名》，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又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然则六经为先王之政典，孔子为周末之圣人，二者固可发生关系，而亦未尝不可脱离关系矣。近数十年中，康长素、皮鹿门等拥戴孔子为教主，过神其说，欲藉讖纬不经之

文而强构孔子作六经之定案。章太炎、刘申叔重申章、龚之论以折之，‘六经皆史’之说遂又腾播一时学者之口。八九年前，钱玄同先生告我：‘实斋之说实出于王阳明。’予以事烦，默识之心而未暇检也。今读《传习录》（卷一），其语具在，因录出之。……实斋之说与此大同，诚由此来，是亦足证浙学之渊源矣。玄同先生新逝，追怀旧日从游之乐，泫然记此。”（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又按李贽《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篇》：“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管锥编序》：“瞥观疏记，识小积多。”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 467 页梁玉绳《瞥记》卷一：“王德柔云：‘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德柔为王筠字，此语见《梁书·王筠传》。

《管锥编》第一册第 98—99 页：“‘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一一：‘脑与心二说宜互相备，《说文》“思”字从“囟”从“心”，是其义’，又卷三三：‘《黄庭经》：“脑神觉元字道都”，此言脑为知觉之元也’（参观

周星诒《竊橫日記鈔》卷下、譚嗣同《南學會講義》第八次)。竊謂詩言相‘思’以至‘首疾’，則亦已體驗‘心之官’系于頭腦。詩人感覺及而學士知慮未至，故文詞早道‘首’，而義理只言心。”按《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第六百三十五則：“《中和》第五卷第十期載戴名世《夏菴集選》（據《戴名世遺文集》，‘夏菴’應作‘忱菴’，《中和月刊》誤）云：‘人之記性在顛，人有失記者，偶（偁）而思之，目輒上瞬，首輒仰。蓋于顛中覓之也。西洋人有于顛內分間之法，某間記某事，某間記某書。其記之法，點（默）書其字之筆畫于內，蓋皆以意為之。余嘗試之，蓋有效焉。’按譚復生《南學會第八次講義》云：‘思字从囟从心，腦之主思，古人蓋已知之矣。’周季貺《竊橫日記鈔》卷下云：‘思字从囟从心，造字已知思慮由腦筋以達于心矣。’文芸閣《純常子枝語》卷十一云：‘腦與心二說宜互相備，《說文》“思”字从“囟”从“心”，是其義。《黃庭經·至道章》云：“腦神經根字泥丸，一面之神宗泥丸。”《心神章》云：“六腑五臟神體精，皆在心內運天經。”其言面部主于腦，臟腑主于心。’又卷三十三云：““腦神覺元字道都”，此言腦為知覺之元也。’”（第二冊第1243頁）《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一冊第229—230頁一大節所引，與此同，唯用以笑孟心史耳。

又按《純常子枝語》卷四：“《春秋元命包》曰：‘腦之為言在也，人精在腦。’《御覽》人事部十六。按在者、察也，此言腦能察物，實開西學之先。恩字从囟，蓋以此也。余嘗謂‘人精在腦’之言，為三代以前之通訓。兒字為囟未合，由字為囟已死

也。囟从乂乂者，交午之象也；由从十十者，数之终也，其形则各值四方，不相往来也。《说文》多三代以前古言古义，不宜尽以经典所用绳之。”并可参观。

《管锥编》第一册第 179 页：《左传正义》庄公二十八年，“‘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按襄公十八年，‘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乌乌之声乐，齐师其遁。”……叔向告晋侯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按《孙子·行军篇》：‘鸟集者，虚也’；杜牧、陈睥、张预等注即引《左传》此二事。古罗马兵法亦谓鸟惊翔而不集者（*avium multitudinem citatore volatu*），下有伏也。”按《明史》卷二百四《曾铣传》：“铣有胆略，长于用兵。岁除夜，猝命诸将出。时塞上无警，诸将方置酒，不欲行，赂铃卒求缓于铣妾。铣斩铃卒以徇。诸将不得已，丙夜被甲行。果遇寇，击败之。翼日入贺毕，前请故。铣笑曰：‘见乌鹊非时噪，故知之耳’”又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四“年羹尧之兵法”条：“年征西藏时，一夜漏三下，忽闻疾风西来，俄顷即寂。年急呼某参将，领飞骑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贼，果尽歼焉。人问其故，年曰：‘一霎而绝，非风也，是飞鸟振羽声也。夜半而鸟出，必有惊之者。此去西南二十里，有丛林密树，宿鸟必多，意必贼来潜伏，故鸟群惊起也。’”二事绝相似，可注古罗马兵法也。

《管锥编》第一册第 241 页：《左传正义》昭公二十八年，

“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按《隋唐嘉话》载薛万彻尚丹阳公主，公主羞其村气，不与同席；太宗闻而置酒，召对握槊，赌所佩刀子佯为不胜，解刀以佩之，主大悦，同载而还。……《聊斋志异》卷四《妾击贼》则‘异史氏曰：呜呼！射雉既获，内人展笑；握槊方胜，贵主同车。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按潘光旦译《性心理学》第二章注 23：“这种求爱的例子，中国记载里也有，试举一两个年代特别早的。《左传》昭公元年说：‘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惟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公孙黑）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公孙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又昭公二十八年说：‘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盛饰、戎服、左右射、超乘、射雉有获等，都是一些自我表白的行为，和雄鸡的展翅、翘尾、大踏步是一流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管锥编》第二册第 467—468 页评《列子》：“列固众作之有滋味者，视庄徐行稍后。列之文词逊庄之奇肆飘忽，名理逊庄之精微深密，而寓言之工于叙事，娓娓井井，有伦有序，自

具一日之长。即或意出扞扯，每复语工镛铸。……子有庄、列，殆比史有马、班……能赝作《列子》者，其手笔驾曹、徐而起嵇、陆，论文于建安、义熙之间，得不以斯人为巨擘哉？”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五十九则：“重看《列子》，波澜意度，仅亚《庄子》一肩，稍欠浑灏奥肆耳。不图魏晋间，乃有此高手，嵇、阮、潘、陆辈，真如小巫见大巫矣。张处度注文，尚在向郭注《庄》之下，安能伪撰本文哉。”（第三册第2212页）

又按吴可《藏海诗话》：“有以杜工部问东坡似何人，坡云：‘似司马迁。’盖诗中未有如杜者，而史中未有如马者。又问荔枝似何物，‘似江瑶柱’，亦其理也。”钱先生之比拟语，本此。

《管锥编》第二册第539页：“山膏善骂，窃恐似仰空而唾、逆风而溺，还污着于己身耳！”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593页《四十二章经》：“恶人害贤者，犹仰天而唾，唾不污天，还污己身；逆风坩人，尘不污彼，还坩于身。”

《管锥编》第二册第620页：“长短句中倩鸟传书尤成窠臼，……陈耀文《花草粹编》卷八引《古今词话》载无名氏《御街行》：‘霜风渐紧寒侵被，听孤雁声嘹唳。一声声送一声悲，云淡碧天如水。披衣起，告雁儿略住，听我些儿事：‘塔儿南畔城儿里，第三个桥儿外，濒河西岸小红楼，门外梧桐雕

砌。请教且与、低声飞过，那里有人人无寐”；呼鸟与语而非倩寄语，‘人人无寐’当是相思失眠，却不写书付递以慰藉之，反嘱雁‘低声’潜过，免其人闻雁而盼音讯，旧意翻新，更添曲致。……《阳春白雪》后集卷五蒲察善长《新水令》：‘……不由我泪盈盈，听长空孤雁声。雁儿我为你暂出门庭，听我叮咛：“自别情人，……相思病即渐成。……一封书与你牢拴定，快疾忙飞过蓼花汀。那人家寝睡长门静，雁儿呀呀叫几声，惊起那人，听说着咱名姓，他自有人相迎。……你与我疾回疾转莫留停。……你必是休辞云淡风力紧，……我这里独守银缸慢慢的等。”’；似取《御街行》拟议变化，酣畅淋漓，在雁为‘疾回疾转’而在‘我’为“慢慢的等”，相映成趣，妙尽心理。”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三十一则节录《新水令》，按云：“酣畅淋漓，而实本之杨湜《古今词话》所载无名氏《御街行》（《花草粹编》卷八引、《词综》卷二十四收），其词云云，蒲察可谓拟议而能变化者。”（第二册第1197—1198页）著语略同。又按俞平伯《唐宋词选释》第161页亦选《御街行》，评云：“词述客居远方，怀念家中，题材亦平常，而意境作法都很新颖。下句以长句作具体详细的描写，有小说、散文意味，且开金元曲子风气。”却未及《新水令》。

又按《乐府雅词·拾遗》卷上刘焘《转调满庭芳》云：“风急霜浓，天低云淡，过来孤雁声切。雁儿且住，略听自家说：你是离群到此，我共那人才相别。松江岸，黄芦影里，天更待飞雪。声声肠欲断，和我也、泪珠点点成血。这一江流水，流

也呜咽。告你高飞远举，前程事、永没磨折。须知道，飘零聚散，终有见时节。”运思着语，便利尖新，并相仿佛。惟孰后孰先，殊难考索。

《管锥编》第二册第708页：“《房瑄》（出《传记》）颜真卿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或沉之大洲，曰：‘安知不有陵谷之变耶？’按《晋书·杜预传》：‘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岷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按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四：“白居易记其《白氏文集》，家藏外别录三本（按实为四本，其四藏香山寺；见《白氏长庆集》卷七十《东林寺白氏文集记》、《圣善寺白氏文集记》、《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卷七十一《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一所考）：一本置于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中，一本置于庐山东林寺经藏中，一本置于苏州南禅院千佛堂内。盖乐天佛弟子也，故欲广藉佛力护持。余非学佛者，雅爱太史公自序有‘藏之名山’之例，此《疏证》第四卷成时，别录四本：一寄置太华山顶，友人王弘撰司之；一寄置罗浮山，应屈大均之请；是所谓‘藏之名山’。其二本则寄千顷堂、传是楼之主人、宦长安者，又所谓‘副在京师’也。”

《管锥编》第二册第708页：“明姚旅《露书》卷六：‘屈原宜放，马迁宜腐。《传》曰“吉人之词寡，躁人之词多”；观

其《经》，观其《书》，不亦然乎！’《经》谓《离骚经》，《书》谓《太史公书》也。明人常有此等儆恶议论。”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三十一则：“园客此著，文笔刻意绘练，未为雅适。议论、掌故，虽不免尖刻狎褻处，亦时可节取。《四库提要》卷一百二十八仅据‘屈原宜放，马迁宜腐，以其文之繁也’数语，痛诋其书，未为平允。”

《管锥编》第三册第 878 页：“‘渺渺兮余怀望，美人今天一方’（句读从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七《沁园春、槩栝〈赤壁赋〉》自注）。”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 618 页：“《餐樱庖词话》：‘刘尚友《养吾斋词·沁园春、槩栝〈赤壁赋〉》自注，可见宋人“渺渺兮余怀望”止句。’”

《管锥编》第三册第 995 页论世故云：“周密《浩然斋雅谈》记韩维基语：‘凡亲戚故旧之为时官者，皆当以时官待之，不当以亲戚故旧待之’；西人亦谓：‘朋友得势位，则吾失朋友’（A friend in power is a friend lost）；洞明世故，足以笺朱穆之《书》矣。”（《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二册第 533 页录周密此语，则据《说郛》本《浩然斋视听抄》）按《我们仨》第 158 页记与胡乔木之往还：“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分不同，他可以不要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分。他可以随便来，我们决不能随便去，除非是接我们去。我们只能‘来而不往’。”必持此教。

《管锥编》第三册第 1002—1004 页：“诗人画士玩视壁痕而发兴造艺者有之，或复师弟传授以为绘事法门焉。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七宋迪谓陈用之曰：‘汝画信工，但少天趣。汝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下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达文齐亦云，作画时构思造境，可面对墙痕斑驳或石色错杂，目注心营，则人物风景仿佛纷呈（Look at walls splashed with a number of stains, or stones of various mixed colours. If you have to invent some scene, you can see there resemblances to a number of various landscapes etc.）。二人之论意匠，巧合遥符，谈者尝捉置一处，或至疑西说乃东土之别传云。”后复引顾况《苔藓山歌》、高阜《与蔚生弟论画》、许承尧《冰画。北地严寒，明窗夜气，互作碎冰，晓起视之，天然成画》。第五册第 78—79 页、第 209—210 页又增补数例。

按伍蠡甫《墨池·影壁·败墙》亦论此事，亦引《梦溪笔谈》、达·芬奇《笔记》，又引段成式《酉阳杂俎》、邓椿《画继》（《伍蠡甫艺术美学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86—488 页），则为钱先生所挂漏。《酉阳杂俎》卷六：“范阳山人……请于后厅上掘地为池，方丈，深尺馀，泥以麻灰，日汲水满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砚，先援笔叩齿良久，乃纵笔毫水上，就视，但见水色浑浑耳。经二日，搨以缣绢四幅，食顷，举出观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无不备也。”《画继》卷九：“郭熙……令圻者不用泥掌，止以手枪泥于壁，或凹或凸，

俱所不问，干则以墨随其形迹，晕成峰峦林壑，加之楼阁人物之属，宛然天成，谓之影壁。其后作者甚盛，此宋复古张素败壁之馀意也。”所谓“宋复古张素败壁”，即《梦溪笔谈》所记者，宋迪字复古，亦见《画继》卷六。又孙原湘《天真阁词》卷一《忆旧游》词题云：“朱野云山人游京师极乐寺，见殿后断墙半壁，清绿斑然，如古锦旧画，不可名状。寒苔瘦草，红碧细果，纷挂其上，归而作图。”亦可参观。

《管锥编》第三册第 1170 页：“王沉《释时论》。……‘眼罔向而远视，鼻黧胤而刺天’；刻划倨傲之态，……烟霞散人《斩鬼传》第二回捣大鬼‘谈笑时面上有天，交接时眼底无物’，即王《论》所状张致，西语谓之给予当场在坐者以‘缺席款待’(absent treatment)。《金瓶梅》第二四回：‘春梅似有如无，把茶接在手里’，又七三回：‘春梅也不瞧，接过苹果、石榴来，似有如无，掠在抽屉内’；‘似有如无’尤写生入神，‘罔向远视’、‘眼底无物’复相形逊色矣。”按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琪罗编辑圣·蒲孚的遗稿，名其一部为《我的毒》(Mes Poisons)；我从日译本上，看见了这样的一条：‘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我在这里说，也是多馀的。’诚然，‘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六卷第 619—620 页)

《管锥编》第四册第1219—1220页：“陶潜《闲情赋》：‘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余园间多暇，复染翰为之。’按《艺文类聚》卷一八《美妇人》门引蔡邕赋题作《检逸赋》，复引陈琳、阮瑀各有《止欲赋》、王粲《闲邪赋》、应瑒《正情赋》、曹植《静思赋》等，而独不取陶潜此赋，亦窥初唐於潜之词章尚未重视也。合观诸赋命题及此赋结处‘坦万虑以存诚’，‘闲情’之‘闲’即‘防闲’之‘闲’，显是《易》‘闲邪存诚’之‘闲’，绝非《大学》‘閒居为不善’之‘閒’；薛士龙《浪语集》卷二有《坊情赋》亦此体，‘坊’如《礼记·坊记》之‘坊’，即‘防闲’之‘防’也。”又第1222页：“《闲情赋》：‘愿在衣而为领，……悲罗襟之宵离’云云。按姚宽《西溪丛语》、钟惺、谭元春《古诗归》皆谓机杼本之张衡《同声歌》：‘思为菀蒨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袴，在上卫风霜。’实则观前人此题仅存之断句，如张衡《定情赋》：‘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蔡邕《静情赋》：‘思在口而为簧，鸣哀声独不敢聆’，王粲《闲邪赋》：‘愿为环以约腕’，即知题中应有，无俟旁求矣。……张、蔡之作，仅具端倪，潜乃笔墨酣饱矣。”

接近人刘文典亦尝论此赋，较之钱说，大辘椎轮，特较粗耳。《与胡适之书》：“这篇文章虽然是硬套张平子的《定情赋》、蔡伯喈的《静情赋》，（《定情赋》，《艺文类聚》十八引了几句道：‘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

而无双。叹曰：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兮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文选·洛神赋》注也引了两句道：‘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艺文类聚》十八又引《检逸赋》（即《静情赋》）道：‘夫何姝妖之媛女，颜炜烨而含荣。普天壤其无俪，旷千载而特生。余心悦于淑丽，爱独结而未屏。情罔象而无主，意徙倚而左倾。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灵。’《北堂书钞》一百十引两句道：‘思在口而为簧，鸣哀声独不敢聆。’）其文学上的价值却是很高的。描写恋爱的文章总算以这篇为最妙，简直是一篇绝妙的心理小说……就以文体而论，在晋朝的赋里，像这样自自然然的也不多见，以典的眼光看来，这篇赋要算赋里的无上之品，徒以后人之少见张、蔡的老底子，只看见他老先生这一篇，又不知道‘闲’字是个动词，《说文》：‘闲，阑也。从门中有木。’《广韵》：‘闲，正也，法也，御也。’）误认为閒暇的‘閒’，所以萧统一骂，大家都跟着吠影吠声地攻击。东坡虽然很替他辩护，但是也没有说出什么确有根据的话来，发言最有力的律师，怕要算典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三十九册第681—682页；又其《三馀杂记》卷一“闲情赋”条，亦载此说，可以参观）

《管锥编》第四册第1302—1303页论“时代错乱”：“无异陆机评点苏轼《赤壁赋》（姚旅《露书》卷五）、米芾书申涵光《铜雀台怀古诗》（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王羲之书苏轼《赤壁赋》（《官场现形记》第四二回）、仇英画《红楼梦》故

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三六回）等话櫛矣。”又：“时代错乱，亦有明知故为，以文游戏，弄笔增趣者。汤显祖《牡丹亭》第三折柳梦梅欲发杜丽娘之墓，商诸石道姑，姑曰：‘《大明律》开棺见尸，不分首从皆斩哩！你宋书生是看着《大明律》。’……汤氏隽语流传，挂于众口，如汪琬《说铃》：‘顾宁人被酒，与客谈经，客误以《唐石经》为《十三经》，顾曰：‘此与宋板《大明律》何异’；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博士毛公善说《诗》，河间献王号之曰《毛诗》，见《汉书》。《文选》于《诗序》一篇，既定为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称《毛诗序》，与宋书生解《大明律》，何以异也’；王闾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日：‘所谓宋板《康熙字典》，其价宜在宋板上也’，又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有刘姓收袁枚墨迹，书我《元宵词》并跋，真佳话也！宋板《康熙字典》同此前后’，即仿此谑。”

按《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五百三十三则：“《牡丹亭》第三十三折：‘石道姑：“《大明律》开棺见尸，不分首从皆斩哩！你宋书生是看着《大明律》。”’”（第二册第896页）又第六百三十一则：“姚园客旅《露书》卷五云：‘书坊刻《东坡集》，有评《后赤壁赋》者曰：“晋陆机云：前赋已极其妙，后赋精于体物。”’按汪钝翁《说铃》云：‘顾宁人被酒，与客谈经，客误以唐石经为十三经，顾曰：“此与宋版《大明律》何异？”’《在园杂志》卷一记一贾人持米元章书申晷盟《铜雀怀古诗》相售。《湘绮楼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日云：‘作李

碑铭，亦系本色无古法，所谓“宋板《康熙字典》”，其价宜在宋版上也。”又宣统二年十月十三日云：“有刘姓收袁枚墨迹，书我《元宵词》并跋，真佳语也。宋版《康熙字典》同此前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洋场名士、《官场现形记》写荆楚开府，皆有颜真卿书《赤壁赋》拓本之嘲，均此类也。”（第二册第 1183 页）

又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研山斋珍玩集览》（清孙炯撰）……其中论刻板一条，称其家有宋板《本草纲目》四函。考《本草纲目》，乃明万历中李时珍所作，安得有宋板也？”《四库存目丛书》未收此书，他处亦遍觅不见，其详不可知。汪辟疆《小奢摩馆脞录》“宋版四库全书”条：“前清显官，如翁叔平、张孝达、端午桥辈，颇好古学，喜收藏，一时都中古籍、金石、碑刻蒐罗殆尽。外省属吏，欲借内僚为援引，往往以金石书翰代土仪，颇投时好。闻某太守至京师，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一部送某相国，外自署‘宋版四库全书’六字，付琉璃厂装潢。及呈时，某相国笑曰：‘《提要》为本朝著作，君从何得此宋板也？此乃无价瑰宝，实不敢收。’某大惭而去，一时传为笑谈。”又《邓之诚文史札记》第 1191 页云：“阅汪氏（琬）《说铃》，……记亭林斥误言《开成十三经》者，曰是何异宋版《大明律》。乃知近人宋板《康熙字典》之言，盖本于此。”视钱先生所考，瞠乎后矣。

《管锥编》第四册第 1451 页：“屈大均贪释大汕之资，为之

改定诗稿，即取己作窜入，事后指斥大汕窃诗以索诈，故大汕致大均书云：‘兄包藏祸心，于濂诗多所改易，将兄句为濂之句；自盗窃其诗以与濂，致陷濂于钝贼而不知’（参观姚范《援鹤堂笔记》卷四六、缪荃荪《艺风堂杂钞》卷四）；谲诡过于小说传奇。”按释大汕与屈大均交恶事，邓之诚亦尝考之，见《骨董琐记·三记》卷四“屈翁山集外文”条：“屈大均与石濂二书及《花怪说》，载于潘耒《救狂砭语》，而不见《翁山文钞》、《文外》。钮琇《临野堂尺牍》于耒之攻讦，颇为之惜，谓《救狂砭语》既刻，石濂亦刻《惜蛾草》与相抵拦，徐虹亭两致书石濂，为之调停。之诚按：徐钊《南州草堂集》无致石濂书，殆与大均俱以其轻薄角口而删之。唯《遂初堂外集》不删，足徵耒徧性。……石濂与安南交通，在当时目为犯法，在今日则语海者亦必察之佐证也。刘世馨《粤屑》四云：石濂俗姓徐，刻《离六堂集》，今日怀拜将军，明日怀张方伯、丁樵使、陈广州等。初与屈翁山善，及后相失，翁山致书攻之，言其偷诗。又作《花怪篇》讥之。石欲首其《军中草》，翁山惧，遂绝交。潘稼堂游粤，不为所礼，乃究其出身，及私通外洋，摘《五灯会元》书内违碍语，以至一切隐事，作《救狂砭语》一卷，刻而传播。又两致书辱石，石复书言其索诈，潘益怒，归途遇吴留村任广东廉使，尽告之。吴下车即禽石下狱，不能穷治，仅押解回籍。……艺风丈《艺风堂文续集》二有《石濂和尚事略》，言石濂解至赣州，止于山寺，又复兴起，皈依甚众，江右李中丞基和又逐之，押发原籍，死于常山途次。所述较详。……方

贞观《南堂诗钞》六有《过长寿庵》二首，盖吊石濂也。诗云云。诗作于雍正丁未，距石濂之败已二十年，长寿久废，恩怨亦尽矣。‘山僧爱才’，指石濂为吴绮身后刻《林蕙堂集》；‘诸奴利财’一语，却得此事真际，贞观必有确闻，非漫为石濂鸣不平也。尝谓石濂、文觉与衍斯道为一辈人，皆有过人之才，不得志，遁入彼教，而又不甘于空门者。”又《邓之诚文史札记》下册第712页云：“阅曾传灿《六松堂集·石濂上人传序》，称石濂为九江人。”第859页又及“释大汕《离六堂集》十二卷”。所谓“大汕致大均书云：‘兄包藏祸心，于濂诗多所改易，将兄句为濂之句’”云云，即见大均复石濂第二书（《骨董琐记》、《艺风堂杂钞》并录之）中，大汕之原札，钱先生固亦未见也。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四十则：“汪谢城《湖雅》云：‘道光辛卯，吾友海宁许心如丙鸿与余论近人《山海经图》之诞妄，时适多蚊，因戏仿《山海经》说之云：虫身而长喙，鸟翼而豹脚，设依此为图，必身如大蛹，有长喙，背上有二鸟翼，腹下有四豹脚，成一非虫非禽非兽之形，谁复知为蚊者。余曰：是也。但犹未尽，请续之曰：昼伏夜飞，鸣声如雷，是食人。相与拊掌。’二事剧类。”（第一册第212页）按《管锥编》第二册第739页引《湖雅》此节，为卷六，此则不著卷数。又按周作人《〈蠕范〉》：“同治中汪曰桢《湖雅》九卷，记湖州物产，文理密察……汪氏对于好奇的文人又很加以嘲笑，在

‘记蚊’这一节下云：‘道光辛卯……（同上所引，今略）笑言如昨，忽已四十馀年，偶然忆及，附识于此，博览者一笑，亦可为著述家好为诞妄之戒也。’”（《夜读抄》）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六十七则：“*The Notebooks of Leonardo Da Vinci*, pp.330-2、349-50、351-9，皆论高山上有蛤蚌遗介及海藻事，与《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举高山螺蛳壳以证天地变迁两条，用意相同，而论据详明。唐才常《觉颠冥斋内言》卷四《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篇》，取朱子片言只语，单文孤证，引申傅会天、地、气、重、化、矿、电、光、声诸门，而独遗此。惟江叔海《孔学发微》卷下云：‘地随天动之说，著于《张子正蒙·参两篇》；月借日光之论，见于《月令》孔氏正义引京房说、沈括《梦溪笔谈》又《容斋五笔》述刘孝荣语（《癸巳存稿》卷三驳此说），朱子亦尝见高山有螺蚌壳，则西人所谓地质学。’云云。又按徐昂发《畏垒笔记》卷三：‘利玛窦论月食曰：日射地球，反影射月，此即张衡当日之冲光蔽于地是为闇虚之说。’博明《西斋偶得》卷上云：‘古人谈天文者，惟朱子实有见解。’又云：‘潮汐之理，惟朱子月光之说的是，千古不易。’又按《酉阳杂俎》卷二十‘肉攫部’云：‘凡禽兽必藏匿形影，同于物类也。是以蛇色随地，茅兔必赤，鹰色随树。’云云。此已发生物学所谓保护色之旨。牵类记于此。”（第一册第245页）又《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两条言高山螺蛳壳以证天地变迁，参

观 *Leonardo Da Vinci's Notebooks*, tr. by E. McCurdy, pp.106-9, 东西两哲, 格物穷理, 著眼处全同。”(第一册第 334 页)按王国维《二牖轩随录》卷一“沈括论地理变化”条:“沈存中格物之学, 不独冠绝宋代, 求之古今中外, 发明之多, 盖未有能比者。其论地理变化曰:‘予奉使河北, 遵太行而北, 山崖之间, 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 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 今东距海已近千里, 所谓大陆者, 皆浊泥流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 旧说在东海中, 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类, 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 水行地中, 不减百馀尺, 其泥岁东流, 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此即今地质学家所谓冲积层者, 其冲积之理, 存中固已尽之。”又胡适《沈括论山崖间的介族化石》:“朱熹的语录里有这一段话:‘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其中。此石即旧日之土, 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 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 有可验者。’我曾把这段话告诉丁文江、葛拉普诸先生, 他们都承认朱子是最早懂得‘化石’的道理的, 比口口的达文奇要早口百年。’近来我重读沈括的《梦溪笔谈》, 在卷廿四里发现这样一条更重要的议论:(同前王引, 略)。沈括特别注意浊泥湮为大陆, 故说有螺蚌壳及鸟卵化石的山崖, 乃是古时的海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五册第 165—167 页。按此文作于 1947 年, 较王国维《随录》, 晚三十馀年)又他家论及此事者, 可参观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57—560 页, 不具引。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二百五十则：“泰伯卑栖独学，未能与一时名辈切磋，故诗文虽劲直，而不脱村野气。”（第一册第401页）按陈曾寿《书江弢叔诗后》自注：“后山自苏、黄后，所与游者多悉平流，故其酬唱，不能如苏、黄之胜。弢叔所交，亦未能无所憾也。”（《苍虬阁诗集》卷十）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六百十七则：“《犬交》。记真州贾客妻与白犬交事，所谓‘庞吠奸而为奸，人非兽而实兽’者。祝枝山《猥谈》记驴奸；《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记宁夏布商何某与牝豕交；《萤窗异草》初编卷一‘犬婿’条；《夜航船》卷六记唐村姑媳以黄鳝代假具（按：此为破额山人撰者，非张岱书也。上海广益书局1920年版，作“吴江庄蘧庵撰”，不知何据？《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十九册第491页录此条）；而谢在杭《文海披沙》卷二‘人与物交’一条，搜采尤广，自槃瓠之妻与狗交、汉广川王裸官人与羝羊交，以至与虎交、与蛇交、与鹅交、与鱼交、与狼交之类，无不有。临海鰥寡与鱼交，尤奇。《后汉书·五行志》五‘冯巡马生人’，注引《风俗通》曰：‘巡马生胡子，问养马胡苍头，乃奸此马以生子（言外与马交也）。’”（第二册第1112—1113页）

按潘光旦译《性心理学》第四章注47：“清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一），引《文海披沙》说：‘槃瓠之妻与狗交。汉广川王裸官人与羝羊交。灵帝于西园弄狗以配人。真宁一妇人与羊交。沛县磨妇与驴交。杜修妻薛氏与犬交。宋文帝时，吴兴孟慧度

婢与狗交。利州妇与虎交。宜黄袁氏女与蛇交。临海鰥寡与鱼交。章安史惺女与鹅交。突厥先人与狼交。卫罗国女配瑛与凤交。陕右贩妇与马交。宋王氏妇与猴交。’又引《耳谈》：‘临安有妇与狗奸，京师有妇与驴淫，荆楚妇人与狐交。’结语说：‘乃知宇宙之大，何所不有？’霭氏原文中说，在中国，鹅用得特别多；不知有何依据，据译者读书所见，亦只上文所引章氏女一例罢了。”“《文海披沙》所拉杂搜罗的一部分显然是传说，不足为凭；其中杜修妻与狗交一则，系根据李隐《潇湘录》，惟《潇湘录》作杜修己：‘杜修己者，越人也，著医术，其妻即赵州富人薛贇之女也，性淫逸。修己家养一白犬，甚爱之，每与珍饌。食后修己出，其犬突入室，欲啮修己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问之曰，“尔欲私我耶？若然，则勿啮我”；犬即摇尾登其床，薛氏惧而私焉；其犬略不异于人。尔后每修己出，必奸淫无度……’后薛氏终于被出，归母家，而犬仍往来不置；其他下文便是一派神话了。”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六百三十七则：“《谭嗣同全集》卷二《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之四十七云：‘灞桥题壁诗云：“柳色黄于陌上尘，秋来长是翠眉颦。一弯月更黄于柳，愁杀桥南系马人。”惜不得其姓名。’卷四《论诗绝句》第四首云：‘意思幽深节奏谐，朱弦寥落久成灰。灞桥两岸萧萧柳，曾听贞元乐府来。’自注：‘新乐府工者代不数篇，往见灞桥旅壁，尘封隐然，若有墨迹，拂拭谛辨，其词云云。读竟狂喜，以为

所见新乐府，斯为第一。而未未署名，不知谁氏，至今恨恨。’按此诗见《樊山集》卷十，题为《八月六日过灞桥口占》。樊山痛诋康梁新党，诗集三刻卷六《读八月十三日邸钞恭纪》第二首云：‘碌碌诸君枉丧元。’即指戊戌六君子也。使其知复生于尘覆面中独能赏音，措词当稍恕矣。”（第二册第1251—1252页）按钱仲联《梦苕盦诗话》：“谭壮飞《论艺绝句》之一云：‘意思幽深节奏谐，朱弦寥落久成灰。灞桥两岸萧萧柳，曾听贞元乐府来。’自注云：‘新乐府工者代不数篇。盖取声繁促而情易径直，命意深曲而辞或啾缓，二难莫并，何以称世？近人如李篁仙外舅，以工新乐府名，然亦至铁崖、西崖、西堂而止。往见灞桥旅壁，尘封隐然，若有墨迹，拂拭谛辨，其辞曰：“柳色黄于陌上尘，秋来长是翠眉颦。一弯月更黄于柳，愁煞桥南系马人。”读竟狂喜，以为所见新乐府，斯为第一。而未未署名，不知谁氏，至今恨恨云。’案此诗盖见《樊山集》卷十，题为《八月六日过灞桥口占》。”（《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六册第301页）参观陈声聪《兼于阁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二十六则：“董其昌《容台集》。……《诗集》卷四《仿李营邱寒山图有序》：‘陶隐居云：若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按《历代名画记》卷二云：‘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安能悦有涯之生，是以爱好愈笃，近于成癖。’玄宰误忆。梁众异《爱居阁脞谈》（《青鹤》第

二卷第十一期)谓‘贾秋壑取‘悦生’二字名堂，其来旧矣。项莲生自序《忆云词丙稿》尝引其言，不知者遂目为项莲生语。近李文石《无益有益斋论画诗》自序又误为陶隐居语’云云。不知其误之昉自玄宰也。郑叔问亦误谓为出陶隐居上梁武帝论书书。按《法书要录》载隐居与武帝诸启(录入《全梁文》卷四十六)，初无此语。”(第三册第1851页)按钱先生引《爰居阁胜谈》，后节去数语：“盖《名画记》同篇之中，尝引陶隐居上梁武帝启事，文石未经谛审也。”其说视钱云“其误昉自玄宰”，实较近是。李葆恂在近人中，于书画文献最为博览，谓其《名画记》亦未寓目，必非事实。又郑叔问即郑文焯，其《双铁堪杂记》(《青鹤》第四卷十一期)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此陶隐居与梁武帝论书书中语。”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55页：“小湖(按李联琇)试闽士，招江弢叔入幕校文，世传二人论诗不合，以理度之，当可信。小湖才情下弢叔十倍，而褊狭自负，又以名位临之，弢叔本简直傲躁，宜其如南山秋气之相与矜高矣。”按陈衍《海藏楼诗叙》：“余与君治诗者皆二十馀年，相与商略为诗亦二十年，初时持论，若南山秋气之相与高，所谓否，不相假借，用辄引为诟病，回思足自晒。”(《石遗室文集》卷九)“南山秋气”云云，本杜牧《长安秋望》：“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440页：“阅孔齐《至

正直记》毕。……张外史戏贻诗有云：‘家藏逸少笼鹅字，门系龟蒙放鸭船。’世以鸭喻五奴也。按宋庄季裕《鸡肋编》云：‘浙人以鸭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盖在是耳，不在于无气也。’云云。然《水浒传》郓哥讥武大郎为‘无气’，大郎曰：‘我老婆又不曾偷人，怎么我是鸭？’则北人之讳鸭正同，亦复因其无气也。”按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宋庄季裕《鸡肋编》中云：‘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案《水浒传》叙郓哥向武大索麦粳，‘武大道：“我屋里又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粳？”郓哥道：“你说没麦粳，怎地栈得肥腴地，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武大道：“含鸟猢猻！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鸭必多雄始孕，盖宋时浙中俗说，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浒传》确为旧本，其著者则浙人；虽庄季裕，亦仅知鸭羹无气而已。”（见《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40—341页）

《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一：“建宁张亨甫先生（际亮），道光间诗名藉甚。……至《王郎曲》最为传作，余独爱其首四句云：‘天下三分月，二分在扬州，一分乃在王郎之眉头，弯弯抱月含春愁。’王，扬州人也。”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159页：“张亨甫《思伯子堂集》……卷二十七《王郎

曲》：‘天下三分月，二分在扬州，一分乃在王郎之眉头，弯弯抱月含春愁。……不数吴桐仙，谁言夏秋芙。往年王紫稼，见汝恐不如。使我慷慨万感俱，使我一叹三长吁。君不见长安歌儿好颜色，王郎一出夸倾国。如何文采风流映八荒，飘零京洛无人惜？’按此歌最传诵，然一起而外，实不能比梅村《王郎曲》之工铺叙。梅村曲结云：‘盛名肯放优闲多，王郎王郎可奈何！’斲价人谓此梅村自悼，然极含蓄，较之《琵琶行》之‘同是天涯沦落人’云云，更为微婉。此作后半抒写侘傺，大放厥词，较之汪容甫之吊马守真，愈洩露无蕴矣。”

《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评范当世：“既更世难，抑郁牢愁壹发以诗，有《范伯子诗集》，工力甚深，下语不肯犹人，峻峭与（陈）三立同。而三立笔势壮险，仿佛韩愈、黄庭坚，当世意思牢愁，依稀孟郊、陈师道。”（1932年版，第126页。按此颇参陈衍语，《近代诗钞·石遗室诗话》：“伯子识一时名公巨卿颇夥，徒以久不第，抑郁牢愁，诗境几于荆天棘地，不啻东野之诗囚也。工力甚深，下语不肯犹人，读之往往使人不欢。”）又《后东塾读书杂志》云：“范氏诗出江西，齐名散原，然散原诗境，晚年变化，辛亥以后，由精能而臻化机；范氏只此一番境界，能入而不能出，其能矫平熟以此，而靡能矫平熟亦以此。”（《青鹤》第一卷四期）

按《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评范诗，视老钱先生，尤“变本加厉”：“阅吴闳生评选《晚清四十家诗钞》三卷毕。……

余最不喜范伯子诗，尝谓‘叫破喉咙、穷断脊梁’八字，可为考语。学山谷而不博炼，学退之而乏浑厚，盖无书卷、无议论，一味努力使气，拖沓拈弄，按之枵廓，同调中前不如张濂亭（卷一），后不如姚叔节（卷三）也。吴氏父子动以太白许之，卷三易实甫、陈柝孙亦皆被太白之目，何张太碧之多也。”（第一册第193页）又：“重看《范伯子诗集》。余起居注十二已言之。古诗不免词费，近诗不免词粗，佳处偶遭，则又直幹老根，生面别开者。书卷少而言语多，故尤觉榛芜不剪。自负特甚，至薄香山（卷十九题白集），亦乡曲之一端。自言欲接遗山，遗山安雅，岂如此犷厉哉。其古诗实学韩公，非山谷也。七律甚似钱箠石耳，语不险深，而意欠醒豁，都似草率成篇者。虽为腾拏，实未雄厚，盖意在说尽，欠蕴酿收敛耳。题目好掉文，往往酸俗不通。”（第二册第90页）

钱锺书与钱穆、陈寅恪

余英时先生与钱锺书的交往始末，首见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文章写于1998年钱先生去世后，为多处所转载，我读了也不止一遍。在许多悼念钱先生的文字里，我认为这篇是最佳作之一。余先生说话绝不浮泛，文字自然生动，不见丝毫做作、吹捧，语间又颇杂“微讽”，“弦外之音”，有如“风吹水上”，令读者“会心微笑”。余先生第二次谈钱先生，是在2007年，见于傅杰的访谈。我最近读到的《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是他第三次的“谈钱”了（《访谈录》中收的《直入塔中，上寻相轮》，亦为2007年所谈，但涉及甚少，不过千字），本以为不会再有新鲜东西，不料出于意外，见到了如下一节，记他的老师与钱家父子的“龃龉”：

大概80年代初，我在台北拜候钱宾四师，他刚收到钱锺书一封两页的亲笔信，交给我看，那是真迹，毫无问题。信上说，苏州即将庆祝两千五百年建城纪念，准备举行大

会。“有关方面”托他写信“先容”，后面将有正式邀请函。宾四师说，信不知是谁从大陆带来，放在他信箱中的，因为信封上无邮票，且是敞开的。宾四师并没有回信。后来杨绛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提及此事，对于宾四师置之不理，似有微词。其实宾四师此时对钱基博、锺书父子好像也有些心理不平衡。起因是杨绛写过一篇文章称颂钱锺书的绝世天才，其中引了一个例子。1931年宾四师的名著《国学概论》（商务）上原有钱基博先生的序，而且“有所针砭”。宾四师在《自序》中还特别向“子泉宗老”致谢。但杨文第一次揭露：这篇序竟是钱锺书代笔，而且“一字未易”。那时钱锺书刚入清华不久，最多大学一二年级，年纪也才二十岁，能代父写这样讨论学术史（主要是清代）问题的序文，的确是天才。这事很快传到宾四师耳中，他的感觉可想而知。他原以为“子泉宗老”对他的著作很郑重严肃，不料竟不肯亲自下笔，委之年甫弱冠的儿子。所以后来台北联经的《全集》本《国学概论》中便不再收钱基博的序了，连带着《自序》中谢“子泉宗老”的话当然也删掉了。这件事我不便和宾四师谈及，但我一查《全集》本《自序》，便恍然大悟。但此事至今尚未受人注意，我觉得应该把事实说出来。（第152—153页）

这不能不算是一件“秘闻”。老实说，记载这件事，也要有些“真理之勇”，因为这件事情，若真如余先生所说，那么钱穆

作为大师的形象，就不免有损害。余先生作为钱穆的学术传人，不“为尊者讳”，“爱真理”过于“爱吾师”，勇于“直笔公心”，是值得称道的。

不过，有些“煞风景”的是，这一件事情的“解说”，却不大经得住“推敲”。余先生一向长于揣量“黄祖之腹中”，解析学人的心理，“如斧破竹，如锯攻木”，这次“以学生之心，度老师之腹”，却全然是度错了。就是说，钱穆不复钱锺书的信，以及后来删除钱基博的序，其原因，并非如余先生所言，是怪“子泉宗老”不亲自把笔，而该是别有缘故。

《国学概论》是一本讲义，编写于1925—1928年间，其时钱穆执教于无锡三师、苏州中学，《概论》一书，正是为两校学生而编，即《围城》中戏语所说的“讲义当著作”，并非什么“宾四师的名著”。钱穆《新版附识》也有自述：“此稿成于三十年前，迄今回视，殆所谓粗识大体，未为精微者也。其时中学校率有‘国学概论’一课，此稿特为讲堂授课之用。听者尚能接受，并多兴发。此三十年来，中学程度，普遍低落。即上庠讲学，亦少总揽通观之功。则此书过而存之，亦未尝不可使治国学者知古今学术流变之大趋。”（《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一册，联经版）所以，这本小书，比起《先秦诸子系年》那样的大著作，是不能同年而语的。其书出版之后，也没有大影响，因为这类“概论”，在民国年间，也不知出了多少，其中作者，故不乏名流老宿。钱穆起笔撰写《国学概论》时，刚过而立（钱穆生于1895年），还未正式进入学界。1931年，此书于商务印

书馆出版，也是经了吕思勉的介绍。这一年，钱穆才三十七岁，用今天的眼光，还只是个“青年学人”。钱穆真正进入主流学界，为“预流”之人，是在1930年6月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后；真正跻身第一流学者，则还要在四年之后，他出版《先秦诸子系年》。以余先生的学术资历，不会不知道，“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对一位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钱穆于比他大八岁、时年四十五的钱基博（《师友杂忆》：“子泉提倡古文辞，负盛名。”），便尊之为“子泉宗老”；而余先生初次见到比他大十四岁、他的老师杨联陞也尊为专家而自谦是“小巫见大巫”的严耕望先生，就直呼为“你是严耕望”了。钱穆请钱基博作序之意，不用说，是为了“衬拳边鼓”，但这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

从人情世故上说，钱基博让儿子来代笔，说不上什么“轻视”。钱锺书先生1929年考清华，是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的。《国学概论序》末署1930年7月，则此时钱锺书二十一岁，“弱冠过一”，固然还只是大学生，但他的“才子”之名，早已播于远近。钱的清华同学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说他：“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则赞他：“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年方弱冠”的钱锺书，作诗已为同光体大家所赏（钱锺书《陈石遗先生挽诗》自注：“先生《续诗话》，评余二十岁时诗。”），其才气为如何，可以想见。即以钱穆本人，不是也在《师友杂忆》中说：“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

外文系任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极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以钱穆的修养，以及其通达人情，当他得知此序不是“子泉宗老”所作，而是“宗老”引为自豪的天才儿子代笔，自必能够理解。《师友杂忆》中又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以钱穆之善知人、敦性情，于子泉此举，何至斤斤计较？试想，自古以来，欣赏儿子、有“誉儿癖”的人，难道还少？而代笔作序，在前人原属寻常，不值得“大惊小怪”。钱穆的一生学术，又是“发思古之幽情”，于老辈此等“潜规则”，哪得不知？既然没有“轻视”，又怎会生“闲气”？《庄子·山木篇》说得好：“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褊心之人不怒。”钱穆撰写过《庄子纂笺》、《庄老通辩》，这几句话他虽未加详说，但“虚船之触不怒”的道理，他自能“默识心通”。

从时间上看，余先生的说法，尤其站不住脚。余先生是历史学家，时间的敏感，该早已进入他的“潜意识”。可是这一节，却犯了一个“时代错误”（anachronism）。所谓“杨绛写过一篇文章称颂钱锺书的绝世天才”，那篇文章，就是我们都熟悉的文献《记钱锺书与〈围城〉》。杨先生的那几句话，实在也很平淡，不妨引在这里：“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锺书父亲的序文。据锺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问题是，余先生说“这事很快传到宾四师耳中”，到底“最快”是在什么时候？考《杨绛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版)第二册《收藏了五十年的附识》，知《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写讫于1982年7月，又据底下的脚注：“此文一九八六年五月才出版，原因是锺书开始不愿发表，说‘以妻写夫，有吹捧之嫌’。详见《我答乔木同志信》(信存档)。”则钱穆得闻此事，最快也不能早于1986年5月，除非他有前知的本领。《杨绛文集》第八册《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1986年下亦载：“《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出版。”查单行本《记钱锺书与〈围城〉》，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版，为《骆驼丛书》之一，出版的时间，正是1986年5月。并可证。钱锺书为苏州建城纪念而致函钱穆，据杨绛《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一文（就是余先生所指杨绛于钱穆“似有微词”的那篇文章，见《杨绛文集》第二册），时间是1985年2月。所以，钱穆1985年春天接信不复，不必等1986年夏天的事来作解释。

那么，钱穆收到了钱锺书的信，为什么又不作复呢？我认为其事并不复杂，用不着“深挖”：钱锺书此信不是私函，而是为官方而作，钱穆置之不理，其所针对的，也就不是钱锺书了。换言之，假如钱锺书是私人致书，“欢然道故”，不涉及其他，则以钱穆的为人，必不如此。据《师友杂忆》，钱穆对钱锺书的态度，固然不及对钱基博，但他说：“锺书去北京初闻其任毛泽东英文秘书。最近见报载，始知系传闻之误。”最后一句，其释然之意，溢于言表。他于故人之子之情，也由此可见。以钱穆这样的性情、年岁（时九十二岁），以及其与钱家父子的交谊，

又怎会为一细故失欢？

有人要问，既然钱穆于钱基博并无不快，那又何以要删去《国学概论序》？我认为解释同样简单：当初钱穆请为作序的，是“子泉宗老”，后来得知出诸锺书（联经版《全集》的出版，在1986年后），则其《自序》中的“又承子泉宗老作序，加以针砭”一句，也就落空了。改之殊难措语，不改自又不妥，则删之最为省事。钱穆所心敬的，原是“子泉宗老”，不是他看着长大的锺书（《师友杂忆》：“时其子锺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锺书已聪慧异常人矣。”又按，钱穆于子泉始终称字，称锺书则名之，足见视为宗人），则其序删去，不算可惜。即使“子泉宗老”地下有知，必当付之一笑。钱穆于钱基博、锺书父子，又何尝有什么“心理不平衡”（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十七册《师友杂忆》，于追忆钱氏父子处，无一字之改；若真为此芥蒂，则并《杂忆》亦追改矣）？杜甫有句诗说：“记忆细故非高贤。”钱穆如此的做法，与“记忆细故”，绝不同科；余先生似乎有些“敏感”了。

钱锺书先生批评陈寅恪，这件事也让余先生惊讶，同时又让不少“拜陈”的人不平，这里也趁机一说。钱先生批评的话，见于《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

入官”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做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其实，余先生真的要起而为陈寅恪辩，以钱先生的口才和机智，绝不会如胡绳那样一笑了之（《访谈录》第74页），当然也绝不致让场面尴尬，主人“下不来台”。余先生的担心实在多馀了。和余先生同样认真的人，是牟润孙先生，他的《陈寅恪与钱锺书——从杨太真入宫时是否处女说起》，也是专门为陈寅恪辩护的。文章原刊于1979年9月23日《新晚报》，没有署真名，署的是“舒充”；那时钱锺书还在世，牟先生大概出于尊敬，所以用了化名。后此文收入《海遗丛稿》（二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该文同样也是引《朱子语类》“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句话，来为陈先生辩护，因为朱子的这句话，正是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篇所引的。牟先生的这篇文章，与余先生的议论，也有不同之处：

从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杨太真入宫时是否处女的确不值得讨论。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之不被研究古代文学者重视，是可以理解的。钱锺书先生在意大利的讲话，主题既是现代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谁都无从反对他那样扬弃

杨太真入宫前是否处女的研究，何况他并未提陈先生。

牟先生说是“在意大利的讲话”，而余先生则说是“在美国”。钱先生1978年9月到意大利，在意大利发表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其中说：“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和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牟文所针对的便是这几句。1979年4月，钱先生到美国访问，再见余英时先生时，是否把去年的话再说一遍，我不敢断定。余先生与牟先生的辩护词，不约而同，也许不过是个巧合。

一般说来，陈寅恪先生的博学与贡献，稍具学术史常识的人，都能了解，何况是钱锺书？只是每个人的谈话、讲演，必然要针对对象、有些背境，对象、背境不同，词锋、意义就有别。钱先生不是刻板的教师、学究，每句话都不偏不倚，不要忘了他的《一个偏见》说过：“随时随地必须客观公正、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所以看钱先生的文字，就不能“死在句下”。况且一时的臧否，也并不意味着“史臣论定”。

平心论之，陈先生的这一考证，也确乎是“碎义难逃”，用不着夸大它的意义。陈先生自己就坦白说：“关于太真入宫始末为唐史中一重公案，自来考证之作亦多矣。……今止就朱氏所论辩证其误，虽于白氏之文学无大关涉，然可藉此了却此一重考据公案也。”尽管如此，这也值得认真批评，更不值得认

真辩护。陈先生所欣赏的黄秋岳，在其《花随人圣龕摭忆》中说：“治学之中，以考据为最乐，愈琐屑，愈有趣味，此学者所共喻也。”陈先生为一代通人，岂能不解此义？

假如一定要辩护，钱锺书的《论交友》里，有几句现成的话，似乎可以借用：“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余先生的“经验谈”：“研究历史虽必须从具体问题着手，但又不能陷于一个个的细节考证之中，随时随地都要保持和发展一种超于问题之上的整体把握”（《访谈录》第41页），只能为中人“说法”，不足关大学者之口。

杨绛写过一篇《听话的艺术》，题目五字，殊耐讽玩，我觉得记话的人，都该一读。扬之水《读书十年（一）》记访金克木，谈起钱锺书，金夫人在旁说：这是她最佩服的人。金先生却说：“他太做作，是个俗人。”（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5页）假如换个场合，话出诸别人之口，金先生听了，也许又要不以为然，“痛与之争”。金先生心底真轻视的人，难道会为金夫人“最佩服”吗？钱先生之批评陈寅恪，可以隅反。

（原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9月23日）

钱锺书与余嘉锡的“撞车”

钱先生博极群书，无所不窥，号为“通人”，但我最近发现，他除《四库全书总目》外，却很少涉猎目录学，至少，是不大读余嘉锡的书。钱先生是否与余氏相识，我不知道，研究钱学的人必有考证。钱先生不读余书，我有两个证据：第一，他已刊行的著作中，未见征引过；第二，他有三次考证，都和余氏书“撞车”了。第一个证据，不见得作准，因为：有时候没征引，不表示就没读过；何况，其多卷本的手稿，还没有出全。而第二个证据，就比较的确凿，不那么容易推翻了。两个加起来，似乎可以“定案”。至于其不读的缘故，我想，也许是因为轻视近人，也许是不喜“书皮子学问”，反正，钱先生是有脾气的人，他读还是不读，自有他的道理，用不着我费神瞎猜。

第一个“撞车”，是钱先生借谢庄《月赋》，论说文学作品中的“时间错乱”，而牵及古书中的“假设之词”。谢庄《月赋》开头说：“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称曰：‘……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据

史书的记载，“曹植封陈王时，王粲早与应（瑒）、刘（楨）同岁俱歿”了。钱先生认为，“词章凭空，异乎文献征信，未宜刻舟求剑”。其《管锥编》（中华书局版）第1296—1297页按云：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论“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词”，不可“倚摭史传以议”其后，举此赋及庾信《枯树赋》为例；……《孝经正义·御制序》邢疏引隋刘炫“述义”，略谓此书“假曾子之言，以为对物之体，乃非曾子实有问也。……此皆孔子须参问，非参须问孔子也。庄周之斥鷃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大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扬雄之翰林、子墨，宁非师祖制作以为楷模者乎？”盖谓经有“假设之词”，而诸子、词赋师法焉，真六通四辟之论矣。唐刘知几《史通》外篇《杂说》下：“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耶？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讥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顾谓不宜苛责词赋之有背史实，刘谓不宜轻信词赋之可补史实，旨归一揆，直所从言之异路耳。《史通》同篇下一节痛斥嵇康无识，撰《高士传》，取材于《庄子》、《楚辞》，“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并谓《庄子》记言载事，

犹词赋之假托，明通之见，上契刘炫。

这一节所论极为精彩，也是研究钱学的人，经常要引用到的。为免冗赘，我做了些许节略。钱先生于此节中，先引顾炎武《日知录》，次及隋刘炫“孝经述义”，又旁及刘知几《史通·杂说》，上溯下沿，旁征博引，把这个问题作了透彻阐述，确实益人神智。只是，余嘉锡《古书通例》中，于论“古书多造作故事”时，也有过类似的考论：

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为故事以证其义，假为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也。《孝经序正义》引刘炫《述义》曰：“炫谓孔子自作《孝经》，本非曾参请业而对也。……此皆孔子须参问，非参须问孔子也。庄周之斥鷃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大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扬雄之翰林、子墨，宁非师祖制作，以为楷模者乎？”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引入卷三《寓名例》中云：“刘氏此论，最为通达，然非博览周、秦古书，通于圣贤著述之体，未有不河汉斯言者。”余谓刘氏谓《孝经》为孔子自作，殊无以见其必然。然其言实妙达文章之理，宜俞氏之倾服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8页）

应该说明：隋代的刘炫，“当时称数百年来，博学通儒，无

能出其右”（叶适《习学记言》卷三十七），但他好批评，喜攻错，所以在经学史上，也每遭人诟病，声名并不顶好。钱先生称赞刘炫，说是“六通四辟之论”，自有力矫流俗之意。而余氏后文又说：

后人著述中，亦有可与刘氏之言相为发明者，今并详徵以资互证。《史通·杂说篇》曰：“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主客，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耶？”又曰：“嵇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云：“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序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虚、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文，已肇相如矣；后之作者，实祖此意。谢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又曰：‘抽毫进牍，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亦是岁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陈王，岂可掎摭史传，以议此赋之不合哉。”（同前，第259—260页）

同钱先生一样，余氏也举及《史通·杂说》，并引到顾炎武《日知录》，次第不必全同，而宗旨是无差的；所以，钱先生的这一番议论，不谓之“闭门造车”，是说不过去的了。钱先生“横扫六合”的月眼，竟滑过眼皮底下，“不见舆薪”，也该是个小小“过失”。

第二个“撞车”，比起第一个来，还要难堪些。因为，前面的那一个，钱先生的主意，还并非在考证，而是要借考证阐发义理，与余氏之所说，“貌同而心异”；后面的这个，就仅是纯粹的考证，难乎为之“左右袒”了。《管锥编》第1454—1455页，有一节考论刘峻《自序》，说：

按《梁书·文学传》：“（峻）又尝为《自序》，其略曰：‘余自比’”云云，明言所录非全文。《南史》本传末亦录《自序》，全同《梁书》，而传首言其“少年鲁钝”，曰：“故其《自序》云：‘冀中济济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严氏已辑；愈见全文必详于今存者多许。余观《文选》峻《重答刘秣陵沼书》李善注：“刘峻《自序》曰：‘峻字孝标，平原人也。生于秣陵县，期月归故乡，遇桑梓颠覆，身充仆圉’”；此等语亦显出《自序》，可补严辑。善注以下尚有数句，词气不同。刘知几《史通》内篇《自叙》上溯承学之年，下止著书之岁，终之曰：“昔梁徵士刘孝标作叙传，其自比于敬通者有三；而予窃不自揆，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益见《梁书》所录，亦即峻《自序》之末节，

概观平生，发为深喟，略如史传末之有论、赞或碑志末之有铭词；至若峻《自序》载事述遇处，当已酌采入本传中而不一一标识来历矣。《史通》内篇《覈才》又云：“孝标持论析理，诚为绝伦，而《自序》一篇，过为烦碎”；倘峻原作仅如《梁书》所录，寥寥才二百许字，牢骚多而事迹少，岂得目以“烦碎”？且既病其“烦碎”矣，又何以尤而效之乎？汪中《述学·补遗》有《自序》一首，师《梁书》录峻此篇一节，文笔之妙，青胜于蓝，而误一斑为全豹，亦缘未究司马相如、马融下至刘氏同时江淹《自序》格制也。

刘峻字孝标，也是一个博学的人，当时号为“书淫”（晋皇甫谧亦号“书淫”，先于孝标），《世说新语》的注，就是他作的。他的《自序》一文，见于《梁书》、《南史》本传，而不载于《文选》，后来汪中有篇拟作，也传诵人口。钱先生的这个考证，是指汪中误谬的，也极为精彩，可谓“发前人未发之覆”，——假如没有余嘉锡。因为，在余氏《读已见书斋随笔》中，早有一条说：

刘孝标《自序》云：“余尝自比冯敬通，而有同之者三，异之者四。”汪中《述学》有《自序》一篇，自比孝标，李慈铭《越缦堂骈文》亦有一篇，复自比汪中，皆以“三同四异”为词，不更叙平生事迹。然考《梁书》、《南

史》刘峻本传，先引其《自序》云：“冀中济济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文选》卷四十三《重答刘秣陵书》下，李善注引刘峻自序曰：“峻字孝标，平原人也。生于秣陵县，期月归故乡。八岁遇桑梓颠覆，身充仆圉，齐永明四年二月逃还京师，后为崔豫州刑狱参军。梁天监中，诏峻东掌石渠阁，以病乞骸骨，后隐东阳金华山。”是则孝标自序全如列传，其体盖本之司马迁、扬雄，故《史通·忤时篇》曰：“刘峻作传，自述长于论才。”（今《自序》中无此语。）《梁书》本传实即采其《自序》之文，特不能如《汉书》司马迁、扬雄传之例，叙明为峻之《自序》云尔，而但录其一节，标为《自序》，遂使人忽焉不察。然本传于自比冯敬通句上固有“峻又尝为《自序》，其略曰云云”，略之为言，明其非全篇也。《史通·覈才篇》曰：“孝标持论谭理，诚为绝伦，而《自叙》一篇过于烦碎。”若仅“三同四异”，简亦甚矣，何烦碎之有乎？容甫、爱伯不加深考，以为峻之《自序》文尽于此，并其传前所引两句亦熟视无睹，遂纷然列举同异，以为《自序》。不知自汉魏以来，凡为《自序》者未尝有此体也。摹拟古人文中之一节，首尾不具，号称名笔可乎？（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下册第676—677页）

撇开文字不说，比较两家所考，钱先生没有胜过之处，而余氏先作，所以判为“胜出”。借钱先生自己的话，这一次，他

又“发明了雨伞”。不过，余文也略有可议处：一，“糞中”两句，仅见于《南史》，《梁书》本传中是没有的，余氏实未亲检（其所引《重答刘秣陵沼书》，题中落一“沼”字，沼为秣陵令，是人名，自是删省）；二，知汪中之拟刘序，却不知刘知几早拟之；知李慈铭之拟汪序，却不知后来黄侃又复拟之（见《黄季刚诗文抄》），吹毛索瘢，就难免“所见不广”之讥了。至于文章的批评，一向是钱先生的擅场，“文笔之妙、青胜于蓝”之评，余氏是见不到、说不出的，他的“号称名笔可乎”之问，自可不必。

第三个“撞车”，是关于罗虬《比红儿诗》的。罗虬是晚唐人，与同宗罗隐、罗邺齐名，时号“三罗”。据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九载，罗虬为鄞州从事时，因为“争风吃醋”，而“手刃红儿”，后来又后悔，便做了一百首《比红儿诗》，“以追其冤”。钱先生《日札》第八条（《钱锺书手稿集》第6—7页），尝略考此事，认为《纪事》所载不足信，说：

罗虬《比红儿诗》俚鄙重叠，真恶诗也。……按虬自序，仅云“余知红者，乃择古之美色，灼然于史传三数十辈，优劣于章句间云”。诗中亦反复侷揣红之色艺，了无悔恨语，至云：“任伊孙武心如铁，不办军前杀此人。”又云：“若教粗及红儿貌，争敢楼前斩爱姬。”则手刃之说，断出附会。惟末首“花落尘中玉堕泥，香魂应上窈娘堤。欲知此恨无穷处，长倩城乌夜夜啼”，为哀逝之什，足徵

诗成于红儿死后耳。

而余嘉锡《读已见书斋随笔续》中，也有“罗虬比红儿诗”一条，视钱先生之所考，更为详确：

虬既杀其人，又为之作诗，人虽狂暴，似不至此。考其事盖出于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云：“罗虬广明庚子乱后，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肉声，常为贰车（节度副使也）属意。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缵彩，恭以副车所贮（当作伫），不令受所贶。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绝句百篇号《比红诗》，大行于时。”虽与《纪事》略同，然无追思红儿而作诗之说。案：明天顺本《绀珠集》卷四引《摭言》云：“罗虬避乱，往鄜州依李孝恭。有官妓红儿者善歌，虬为绝句诗百篇令歌之，号《红儿诗》，以百物比拟红儿而作也，行于时。”夫虬既杀红儿矣，安能复令之歌。疑是虬诗在前，红死在后也。（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第692—693页）

又引及明王世贞《宛委馀编》，并断以己说：

《宛委馀编》卷八云：“罗虬《比红儿》，不过市井间烟花语耳。然《唐诗纪事》谓虬手刃此妓而作诗追悼之，恐误。盖诗语有‘任伊孙武心如铁，不办军前杀此人’，又

‘若教粗及红儿貌，争敢楼前斩爱姬’也。恐红儿自以它故死，不由手刃。”王氏此言，取证本诗，凿然有理，可见《揅言》、《纪事》之说皆非也。然其诗第一百首云：“花落尘中玉堕泥，香魂应上窈娘堤。欲知自恨无穷恨，长倩城乌夜夜啼。”实有追思之意，疑此一首为死后所改也。（同前）

《宛委馀编》是一部笔记，共十九卷，收入《弇州四部稿》。钱先生夙喜子部杂家，年轻时又早通读了《四部稿》，《馀编》自不会不经眼（参见《管锥编》第1405页）。而考论此事，竟不引只字，所言却又与之闇合，这也是很奇怪的。不过，人脑不比芯片，要受遗忘律的制约，钱先生也不能例外；并且，这一节的考证，钱先生也意不在辨伪，而是要论“晚唐习气”，批评周寿昌、平步青等人“少见多怪”，其不引及《馀编》，似可“从轻发落”。附带一提，今人号为详博的《唐才子传校笺》，也有关于《比红儿诗》的考证（见中华书局版，第四册第131—136页，第五册第459页），其于余书熟视无睹，于罗诗序略无所辨，视小说为信史，比起钱先生的“一时挂漏”，就真不能够原谅了。

（原刊《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2辑）

补订：《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七册第179—184页

有读《余嘉锡论学杂著》笔记，于《读已见书斋随笔》亦摘数条，“汪中李慈铭之自序”在焉。我说钱先生不读余氏书，实为鲁莽。谨记于此，以志其过。

又《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第455页：“阅唐杨晔《膳夫经手录》，有一条云：‘萝葡，贫窶之家与盐饭偕行，号为三白。’乃知《曲洧旧闻》、《高斋漫录》记东坡自言制科时日享三白饭，其名由来久矣。”《余嘉锡论学杂著》下册《读已见书斋随笔》“三白饭”条，亦考此语，所引俱同，（《中文笔记》第七册第184页摘之，批补云：‘按佛家谓白饭、白水、白盐曰三白，见《高僧传》三集卷二十三《元慧传》；《佛学大词典》谓是乳、酪、饭。’）此钱、余“撞车”又一事也。

钱锺书与吕思勉

1933年，钱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旋入光华大学任外文系讲师，前后大约历时两年。钱先生之与吕思勉相识，应该就是在这时候^[1]。钱先生的尊人，这时也任教于光华，并且是吕思勉的友人，关系很不错^[2]。我猜想，钱先生在读书之暇，一定听过吕先生的议论。所以，五十年后钱先生补订《谈艺录》，才不忘旧谊，而道及其书^[3]。不过，即使不论术业专攻，钱、吕两先生之间，也是“分茅设菑”，大相径庭，而其相聚而论，难有什么“共语”，应该是不待说的。但我读两家著述，于其“邈若山河”之外，却也隐然有见其同，因此恍然明白，钱先生于近人中独称吕思勉，也真是有“针芥之合”，并非仅仅“道故”而已。聊拈数事，用证鄙说，兼资谈助。

一、常事不书

钱先生论“常事不书”，是其史学的一个胜义，其《管锥编》第一册第303页云：

古人编年、纪传之史，大多偏详本事，忽略衬境，匹似舞台之上，祇见角色，尽缺布景。夫记载省略之故，初非一端，秽史曲笔姑置之。撰者己所不知，因付缺如；此一人耳目所限，后世得以博稽当时著述，集思广益者也。举世众所周知，可归省略；则同时著述亦必类其默尔而息，及乎星移物换，文献遂难徵矣。小说家言摹叙人物情事，为之安排场面，衬托背景，于是挥毫洒墨，涉及者广，寻常琐屑，每供采风论世之资。然一代之起居服食、好尚禁忌、朝野习俗、里巷惯举，日用而不知，熟狎而相忘；其列为典章，颁诸法令，或见于好事多暇者之偶录，鸿爪之印雪泥，千百中才得什一，余皆如长空过雁之寒潭落影而已。

后又引及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吕侍讲岁时杂记》：“承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缺。”而致其感慨：“过去寻常‘不必记’之琐屑辄成后来掌故‘不可缺’之珍秘者，盖缘乎此。曩日一法国史家所叹‘历史之

缄默’，是亦其一端也。”（中华书局版；参同书第309页）所谓“法国史家”，是指19世纪的儒勒·米什莱（J. Michelet），是喜以文学风格写历史的人，其所以能够“swim into his ken”（钱锺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当缘此。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吕思勉也早有所论，较之钱先生，着语更为明白：“凡著书皆以供当时人之观览，当时之情形，自为其时之人所共晓，无待更加说述，故其所记者，大抵特异之事而已；所谓‘常事不书’也。然大化之迁流，转瞬而即非其故，前一时代之情形，恒为后一时代之人所不悉。”（见《史籍与史学·论搜辑》）其《历史研究法·现代史学家的宗旨》中，所论尤详：

不论什么事情，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环境之内的，如其不知道它的环境，这件事就全无意义了。……然而我们现在，对于任何史事，总不能十分明白其环境，这是什么理由？这自然是由于记载的缺乏了。记载为什么会缺乏呢？难道向来史家，对于不知环境则不能明白其事件的真相的道理，都不知道么？不，须知“常事不书”，为秉笔者的公例。我们现在虽追恨古人，叙述一事件时，不把他的环境说清楚，以致我们不能了解，然使我们执笔为之，恐亦不免此弊；即使力求避免，其与古人，亦不过程度之差而已；将来读书的人，还不免要追怨着我们。这是因为著书的人，总得假定若干事实为读者所已知，而不必加以叙述，

如其不然，就要千头万绪，无从下笔了。

后文又以记日记为例，加以申说：

一个朋友，忽而今天来看你；你今天忽而想到去做一件不在预算范围内的事情；这自然要记出来的。学校中的课程，个个星期是一样；吃饭、睡觉，天天是一样；那就决无逐日记载之理，至多每星期开学之初，把课程表抄一份在日记里，以后每逢变动时，再加以记载；初记日记时，把吃饭和睡觉的时刻，记下一笔，以后则逢一顿宴会，一夜失眠等事，再加以记载罢了。这就是所谓“常事不书”，是秉笔者不得不然的。然而社会的变迁，虽然看不见，却无一息不在进行之中。虽其进行无一息之停，却又“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正和太阳的影子的移动，没人看得见一样。然而隔着一个时间再去看，就移动许多了。社会的变迁，亦是如此，必须隔若干年代，然后看得出。

比观两家的说法，文字的浅深不同，意思却全然无异。我知道，钱先生一定不是沿袭，因为吕氏的《历史研究法》、《史籍与史学》，原都是为了初学而作，钱先生未必经眼，而钱先生的《管锥编》，则又是吕氏所见不到的。所以，这一意见的相合，只能解释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凡学者的学问，境

界臻于何等，便会有何等识见，不期然而议论相合，所谓“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二、文章风格与考据

钱先生于专门考据的学者，有时是会加以揶揄的，其原因，我想当然不是反对考据，而是不喜考据家的固执。钱先生的这个态度，也不过是为了“救偏”，其不宜奉为“金科玉律”，自毋庸多说；否则，趋向另一个极端，同样也是不足取的。《管锥编》第三册第1097页，有一节文字很有趣，涉及伪作张飞的“题画美人”、关羽的《三上张翼德书》，而畅论文章风格有资考辨云：

一题一书之为近世庸劣人伪托，与汉魏手笔悬绝，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据，亦不屑刺讯。若夫不识文风而欲矜创获，于是弗辞手劳笔瘁，证贗为真。……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五四《答孙季和》：“《小序》绝非孔门之旧，安国《序》亦绝非西汉文章。向来语人，人多不解，惟陈同父闻之不疑，要是渠识得文字体制意度耳”；焦循《里堂家训》卷下：“柳州辨《鸚冠子》，考作《论语》之人，不烦言而解，此学之所以待于文也。”两家皆耻为文人者，而知文之有资于考辨如此。……“不识文字体制意度”或“不识书”，遂谓风格无征不信，非若“年月”之类有据可考；

甚且以挟恐见破之私心，发为矫枉过正之快口，嗤鉴别风格为似方士之“望气”。倘非“学士之奸”（仲长统《昌言》），即是“通人之蔽”（桓谭《新论》）矣！

能够辨别文章风格，于考据是有帮助的，但近代的史学家，多以为史学为科学，所以，一般便只信从客观的证据，于文章风格这类东西，认为不易捉摸、近乎主观，是不大肯承认的。钱先生的论说，自然是为此而发，可想而知，这个说法，在近代史家那里，是不易找到同调的。

不过，在吕思勉的著述里，我却意外地读到如下之说：

据文字以决书之真伪，似近主观，然其法实最可恃，此非可执行迹以求，故非于文学有相当程度者，决不足以言此。《伪古文尚书》为辨伪最大公案，然其初起疑窦，即缘文体之异同。此两法虽亦平常，然近人于此，都欠留意，故不惮更言之也。（见《史籍与史学·论考证》）

其称“近人于此，都欠留意”，亦征当时的史学风气，是趋于实证、科学的。吕思勉于近代史学的这一趋向，是完全表赞同的，并不像一些老派史家，如其学生钱穆等人，采取保守的态度。他认为，“至近世，而史学之趋向又变。史学趋向之更新，盖受科学之赐”。虽然，他于“史学能否成为科学”，尚存些许疑问，但于史学的客观性，是断没有疑义的。他说：“社

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精确不精确，乃程度之差，非性质之异，史学亦社会科学之一，固不能谓其非科学也。”（见《史籍与史学·史学演进趋势》）所以，吕先生强调辨别“文章风格”，有助于考据，与钱先生的反学者立场，其轻重之间，自不能同日而语。

必须一提，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一节也提及“风格与考证”，说：“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版，第十册第87页）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亦云：“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文体各时代不同，稍多读古书的人，一望便知。这种检查法虽不必有枝节证据，然而不会错的。”（同上，第251页）吕氏说“近人于此，都欠留意”，稍欠确。

三、史不可尽信

关于这个问题，钱先生在不同的地方，作了不止一次的论说，他认为史不但不足信，有时还迹近于诗，近于小说、传奇，掺杂了“文学的虚构”。一句话，文学、历史之间，并非划若鸿沟、不可逾越，相反地，两者关系密切，“接叶交枝”，挥之不断。其《管锥编》第一册第165页，有一个较集中的论述：

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麇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履心息喙。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一曰：“鉏麇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鉏麇论》曰：“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二五回王济川亦以此问塾师，且曰：“把他写上，这分明是个漏洞！”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方中通《陪集》卷二《博论》下：“《左》、《国》所载，文过其实者强半。即如苏、张之游说，范、蔡之共谈，何当时一出诸口，即成文章？而又谁为记忆其字句，若此其纤悉不遗也？”解事不减陈涉。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迂笔法相许，学士哂之。哂之诚是也，因其欲增稗史声价而攀援正史也。然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规，泯町畦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斯言虽未尽想象之灵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阙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则至当不可易也。（参观《谈艺录》〔补订本〕第47页）

但凡研究“钱学”的人，只要论及钱先生的史学，一定会徵引这一节。他们认为，这是钱先生的最重要思想之一，至少是关于史学方面的。去年出版的汪荣祖教授《学人丛说》中，有一篇《钱锺书论史学之体用》，专论钱先生的史学思想，也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其文并有别的引证，认为历史的虚无主义，其来有自，在西方也是“数见不鲜”；所以，钱先生的这个思想，固不能算特别的创论。但在近代中国史家，持有相同见解的人，毕竟是不多的。有之，以我读书之寡陋，则仅见吕思勉，是与钱先生“笙磬同音”的。

《史籍与史学·论考证》云：

史事必资记载，记载必本见闻，见闻殆无不误者，即不误，亦以一时一地为限耳，一也；见闻不能无误，记忆亦然；即谓不误，亦不能无脱落之处，脱落之处，必以意补之，（非必出于有意。）以意补之，安能无误乎？二也。……有此十一端，而史事之不能得实，无待再计矣。如摄影器然，无论如何逼肖，终非原形；如留声机然，无论如何清晰，终非原声，此固一切学问如此，然史主记载，其受病乃尤深也。欧洲史家有言：“史事者，众所认同之故事耳。”（按此节所引，以文太长，故略去其他九事，读者如有兴趣，可检读原文。）

这一节所言，岂非明言“史不足信”？其最后一句，所谓

“欧洲史家有言”云云，应该就是指诺瓦利斯 (Novalis)。关于这句话，钱先生也徵引过，只是更道地，其《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开头说：“诺法利斯 (Novalis) 认为‘历史是一个大掌故’ (Geschichte ist eine grosse Anekdote)，那种像伏尔泰剪裁掌故而写成的史书 (eine Geschichte in Anekdote) 是最有趣味的艺术品 (ein höchst interessantes Kunstwerk)。梅里美 (Mérimée) 说得更坦白：‘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 (Jen’ aime dans l’ histoire que les anecdote)” (见《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9 页) 而称“历史记载”，有类于“传奇”、“平话”，则是吕氏的常谈。其论“鸿门宴”一事 (见《史籍选文评注》)，于此说尤较详：

此历史记载，属于传奇性质之例。……鸿门灞上，相去四十里，即走间道亦二十里，项伯夜自鸿门至灞上，汉高祖留之饮酒，再归鸿门，尚及见项羽，劝止其明日勿击高祖，然则项羽终夜不睡乎？若谓因明日欲击高祖，而夜间发号施令，则岂项伯数言所能止？且项伯安知项羽必听其言，而属汉高祖明日自来谢乎？范增安得不告项王，而使项庄击高祖？樊哙即卤莽，安得撞到卫士，再面责项羽？古人饮酒，诚有中间离席休息之事，亦必不能甚久。汉高安得令张良待其至军，然后入谢乎？范增七十老翁，既称有谋，岂有当场拔剑撞破玉斗之理？种种不合情理，故知必非事实而为传奇式之传述也。

在其《秦汉史》第三章《秦汉兴亡》里，叙及此事，也说：“诙诡几类平话。”至其不信霍光，为王莽平反，均是这个思想的贯彻^[4]。考虑到吕思勉是史学家，又是喜欢作考据的人，与一贯自居“文人”、轻视“学人”的钱先生，态度显然有所不同，绝不会有“恢诡”之意，所以，他的话就更值得重视。同时，有了这个旁证，钱先生的那番话，也就可以加深理解。至于叔本华的那句话：“历史女神像带梅毒的妓女一样，满口谎言与虚伪。”便只是一种修辞效果，普通读者读了感到新奇，近代的史学家，肯定认为是不值一驳的了。

四、唐人胡风

钱先生还有一个常被人指责的地方，就是他于陈寅恪考证杨贵妃“处子入宫”，表示不大以为然。余英时教授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中，特别提起此事，而为陈先生作辩护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余英时教授的学术，与钱先生本如马牛风，其于钱先生不以为然，是意料中的事，也不足为异。不仅是余英时，牟润孙也不以为然，早在1979年，就曾撰写一篇专文，为陈寅恪辩护，他的具体的意见，和余英时大致相同^[5]。可见钱先生的这个随口臧否，在史学界发生的影响。不过，据我所知，吕思勉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

同意钱先生，不赞成陈寅恪的。其《中国通史》第九章《兵制》说：“隋唐先世，到底是汉族还是异族，近人多有辩论。然民族是论文化的，不是论血统的。近人所辩的，都是血统问题，在民族斗争史上，实在无甚意义。”又第三十八章《隋朝和唐朝的盛世》说：“唐朝自称为西凉李暹之后，近人亦有疑其为胡族的，信否可不必论，民族的特征，乃文化而非血统。唐朝除太宗太子承乾具有胡化的性质，因和此时的文化不相容而被废外，其余指不出一些胡化的性质来，其当认为汉民族无疑了。”这都是没有点名的，但其所指为陈，熟悉近代学术史的人，是一望可知的。其明引陈说而加以批评，则见于其《隋唐五代史》第五章《隋唐五代社会组织》论“风俗”一节，云：

近人陈寅恪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上篇谓唐中叶后，河北实为异族所荐居，三镇之不复，非徒政理军事之失，引杜牧《范阳卢秀才墓志》、韩愈《送董邵南序》为证。……陈氏曰：“据前引杜牧之《范阳卢秀才墓志》‘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句及此序‘风俗与化移易’之语，可知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若究其所以然之故，恐不于民族迁移一事求之不得也。”因详考安禄山之羯胡，并列诸节镇之为异族，及虽难质言，而可疑为异族者，以明其说。案李尽忠叛后，异族入处幽州者甚多。……安史乱后自尤甚。然谓其人之众，足以超越汉人，而化其俗为戎狄，则见卵而求时夜矣。韩公之文，乃讽董邵南使归朝，非述时

事。杜牧之云，则谓卢生未尝读书耳，非谓其地之人，举无知周公、孔子者，生因是而无闻焉也，岂可以辞害意？

其后文又详驳《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之说，以为陈氏之所论，“未免求之深而反失之”；而“隋唐风俗，实上承南北朝而渐变。旧俗之不可存者，逐渐摧残剥落，而新机即萌蘖于其间，此乃理势之自然，言风俗者不可不深察也”（其详见《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79—784页，读者可以参看）。据此之说，则余英时教授所辩的，在吕思勉那里，似乎也不能获得同情^[6]。我认为，吕思勉的为学，于“知大体”这一点上，和钱先生是一样的，他们都可谓之“通人”，则其意见略相一致，于现代学术的专门之弊，有所批评与针砭，似乎也无不可厚非，不值得大惊小怪。

五、指斥经生及其他

吕、钱二先生之足堪“共语”，除以上所拈数事外，可说的也还不少。例如指斥经生。如所周知，指斥经生的固陋，是钱先生的一个“癖好”，而吕思勉也曾认为：“如郑玄，遍注群经，在汉朝，号称最博学的人，而其说经，支离灭裂，于理决不可通，以及自相矛盾之处，就不知凡几。此等风气既盛，治经者遂多变为无脑筋之徒。虽有耳目心思，都用诸琐屑无关大体之

处。”（见《中国通史》第十七章《学术》）又其后文谈“诗乐分合”，认为：“其实凡事都到愈后来愈分化。吟诵的诗，和合乐的诗的判而为二，正是诗体的进化。”这与钱先生的说法，正可以同参。钱先生说：“诗、词、曲三者，始皆与乐一体。而由浑之划，初合终离。凡事率然，安容独外。……强欲并合，未能兼美，或且两伤，不克各尽其性，每致互掩所长。……诗乐分合，其理亦然。”（见《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版，第27页）吕思勉又论“纯文学”：“近人袭西洋文学的理论，贵纯文学而贱杂文学，这话固然不错。然以为说理论事之作，必是杂文学，必写景言情之作，而后可以谓之纯文学，则是皮相之谈。”（见同前）而钱先生向来擅长“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释文盲》），甚至想过“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作者五人》），所以，他的《管锥编》第二册第461页就说：“盖修词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文字游戏三昧耳。”据此种种，说钱、吕两家，有时“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应该是可以的吧。

六、馀论

至于钱、吕的为人，都是近于所谓“狷者”，不喜欢交结名流，而以寂寞自甘的。两家于此均有“夫子自道”。钱先生说：“独行其是，不顾人非，自娱其老，不期同好。立宗开派，觉

世牖民，既无此心，亦无此力耳。”（见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引，冯芝祥编《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一辑第18页）又自论其诗：“拙作数百首，么弦孤张，独唱自悦，雅不欲厕时贤之列。”（见彭鹤濂《钱锺书二首诗浅析》引，李洪岩、辛广伟编《撩动缪斯之魂：钱锺书的文学世界》，第2页）均足为证。有一次，钱先生在《与敏泽书》中，谈及与陈寅恪的关系，又说：“我和陈先生从未谈过话，二十七八年前，他忽然寄信给我夸奖《谈艺录》，并赠《元白诗笺》一本，我回信谢了。我和他的交往仅此。虽然他父亲和我父亲是有些交情的，但我一向不敢高攀名流，错过了向他请教的机会。”^[7]于陈寅恪尚且如是，于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吕思勉则也说：“予生平不喜访知名人士，人有愿下交者，亦多谢绝之，以泛泛访问，无益于问学修为也。”（见《自述》，《蒿庐问学记》第223页）又说：“章（太炎）先生有一句话，我最佩服。他说：‘与通人居，决不如与学究居之乐。’我并不愿和学究居，然见得所谓通人，我更避之若浼。我生平，不但不听见什么地方有通人，而辗转托人介绍，或者自己冒昧去求见；人家要介绍我去见通人，我亦恒笑而谢之。有时亦偶与通人相遇，则寒暄而已。关涉道德、事功、学问、文章之语，一概不谈。我非不知所谓通人者，自有其长处，然我有一个偏见，我以为亲炙某种人物，对于道德、事功，很有裨益的，因为这不是纸上的事，能与之居，或见其人，其获益自较读其书为大。若学问则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精深之理，繁复之事，岂能得之立谈之间？

若文章之妙，则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更与见面不见面无关了。我本太炎所云‘鰕生鄙儒’之流，‘随意钞撮’，不过‘聊以自娱’，对于学问文章，都无卓然自立之愿。事功自审非性之所近，生平更未尝有志焉，道德亦自愧未能立意进修。所以见通人，辄自远，倒因此而四面八方，都无雅故，说述评论，可以较为自由，这在近代的操觚之家，怕能如我者甚少，这倒足以自喜的。”（《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见《吕思勉论学丛稿》第405页）钱先生的话为世所知，而吕思勉的自述，似还少有人征引，所以，我不避“抄胥”之讥，捉置一处，以为知人论世之资^[8]。

（原刊《学林漫录》第18集）

注释

[1] 自1926年起，吕思勉即任教于光华，详见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蒿庐问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98—429页），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又参观傅宏星《钱基博年谱》第106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可是钱先生父子日记均已毁，吕先生的日记残稿，所存亦无多，所以两家交谊，蛛丝马迹，也难从考索。

[2] 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在抗战前，吕先生早已是一位在史学界负有盛名的学者了，胡适想请他到北京大学去。论理当时北大文科是全国头块牌子，而吕先生所在的光华大学则是排不上号的私立学校。

但吕先生拒绝了，理由是：光华的文学院院长钱子泉（基博）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离开光华，等于拆他的台，我不能那么做！”（《蒿庐问学记》，第148页）这个说法，严耕望颇信之，我则认为很可怀疑。吕曾多次贬斥胡适，见于文字，胡适不会不介意（其于柳诒徵即然，柳1921年作《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批评胡书，说“胡氏论学之大病，在诬古而武断”，至1932年，柳著《中国文化史》出版，胡即作书评，反唇相讥，说“柳先生是一位不曾受过近代史学训练的人”，云云。所谓报“一箭之仇”也），所以不大可能请他；即使不记恨，就以史学而言，胡适也是新派学人，于旧派如吕者，欣赏的可能不会很大。但吕、钱之交情，此节所记，应该还是可据的。又检联经版《胡适日记》，至始至终，未见有及吕先生处，则其于吕态度为如何，似乎可窥一斑。

[3] 钱锺书《与傅璇琮书》：“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丈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两处。”这个说法的“口头版”，又见傅璇琮《缅怀钱锺书先生》：“有一次在他家里，他就说：你的这本《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我一直放在身边书架上的；我的修订本《谈艺录》，说的都是古人，提到现代人的，只有两处，一处是吕思勉，一处就是你的这本书。”（《文化昆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4] 见《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35页、第175页、第186—187页。又同书第65页，论“商山四皓”事，以为“一望而知为东野人之言”，“四人之名，见《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东园公作园公，师古曰‘四皓称号，本起于此’，则《史记》不应有其名，盖后人所窜。用乃俗字，恐并非《汉书》元本，小颜无识，不知辨也。”吕先生屡云“史之不可信也久矣”，又屡云“秦汉间事，多恢诡如平话”；此亦其一例也。其以此事可疑，最有力的证据，为：“戚姬乃高祖为汉王后所得，高祖自为汉王至崩，不过十年，如意生即早，高祖末年，不过十岁，安知其

类己？”按：《史记·吕后本纪》：“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汉书·外戚列传》：“高祖为汉王元年，封吕公为临泗侯。二年，立孝惠为太子。后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据此，知如意之生，在汉王二年（前205）后，而高祖九年（前198），如意为赵王。十二年（前195），高祖死，如意不过十岁。故吕先生有此驳。但吕先生于“类己”一语，理解似稍狭，因“类己”不但可以指“行事”，也可以是“长相”，因貌“类己”而生偏爱，亦人情所恒有也。关于四皓，晚清陈衍亦尝有一诗，疑之，议论极可喜，云：“汉高畏吕后，本无易储志。无以谢戚姬，留侯窥其意。四皓乃贖鼎，优孟有故智。须眉皓白人，何处不可致。”（《咏史三十八首》，见《石遗室诗集》卷一）亦发人所未发。陈作此诗时，才二十二岁，已老练如此。又袁枚《咏史》六首之四云：“子房非正士，可传惟一椎。……野雉幸辟阳，夫妻义已绝。立贤不立长，殷周有成迹。胡为召四皓，为之张羽翼。老人见厚币，来如飞鸟捷。龙准木强人，伤哉为所劫。长陵骨未寒，杀子及其妾。北门夺军时，四皓骨已朽。借使木未拱，能安刘氏否？”（见《小仓山房诗集》卷五，又《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三《书留侯传后》，持说小异）。友人周运先生告，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九《四皓论》，早疑及四皓事，均可参观。

[5] 见牟润孙《陈寅恪与钱锺书——从杨太真人入宫时是否处女说起》（《海遗丛稿》（二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3—165页）

[6] 朱希祖《驳李唐为胡姓说》、《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亦反对陈氏之说，可以参看，见《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260页。

[7] 见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钱基博与陈三立有“交情”，其语不虚，事在1922年。陈三立《筒钱子泉》：“屡读大著，瑰异优渥，不仅三吴之文士，抑亦海内之通人也。并世有此才，足惊老眼！即以

文字论，如《孙宜人述》、《春申君里墓碣》诸篇，家常琐细，以大雅之笔出之，永叔、熙甫，有此情韵，无此雄奇。可谓前不见古人者矣。”陈寅恪寄给钱先生的信，其中夸奖的话，一定和他父亲差不多。又，《钱基博年谱》第76页引《钱基博一封书》，自述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上，见到梁启超、王国维，说：“博虽临二公座，然未接谈。匪惟无介，亦以学问贵乎自得。而博十年读书，粗窥本末，雅不欲依附时贤末光以藉矜重而为标榜也。博一生所以不大显名者在此，而博所以自立而信异日必一得当以不泯没终古者亦在此。”钱先生的“不敢高攀名流”云云，一定有他父亲的影响。

[8] 钱基博《太炎讲学记》：“余于当代名贤著书，无所不读，读未尝不深思；然懒晋接。亦不欲见其人，此其中亦有故。昔人云‘百闻不如一见’，我则以所见不如所闻。往往读其书，其辞斐然，其意卓然；而接其人，无威可畏，无仪可则，声气标榜，酒食征逐，口不道忠信，性或溺声色，不如读其书、不见其人之醇醇有余慕也。”（《子曰丛刊》第二辑）其所自述，与吕先生的话，精神上是相似的。又，关于性情癖好，还有一细事，也是钱、吕所共同的，即爱猫是也。据《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吕的爱好有五，其三是“爱猫”，并写过《猫友记》、《猫乘》（《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504—512页载其文）。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有一次我到十子街老宅去看他，他留我便饭，他家的猫爬上桌子，把他筷头上的菜打下来就吃，他也不生气，更未叱责，笑笑就算了。”见《蒿庐问学记》第148页。钱先生的喜欢猫，见《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一百六十五则、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并且也曾作小说《猫》。从性格上说，爱猫的人，多是偏于智者的，而较不近乎仁者，换言之，就是“独善者多，兼善者少”。

钱锺书与鲁迅

—

钱锺书与鲁迅终生不曾相识，当然也更谈不上把臂而谈、上下其议论。不过，假使他们真的有机会认识，以我辈后学浅见，必定意见相左而话不投机。我们知道，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曾写过书评批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未作正式响应^[1]。但鲁迅的性格却不同，若遇到此种挑战，必定要来争个明白。况且钱、鲁二人趣尚如此不同，脾气又都极其狷介，——哪能不互骋辩才、一争高下呢？所以，将两人捉置一处，作“截搭题”，人们往往强调二者之异，如黄维樑比较二家小说时，即谓：读鲁迅的小说，有如喝铁观音，入口略带苦涩，而回味则甘香无限；读钱锺书的小说，则如喝芬芳扑鼻的白兰地，入口就芳香四溢。读鲁迅的小说，如嚼橄榄，胜在馥味；读钱锺书的小说，则如大啖芒果，甘香多汁，入口而快感顿生。云云。^[2]这一节话固然说得十分波峭，令人解颐；但假如

不限于小说，就还可在黄氏语后添上几句：鲁迅是“玄虑之人”，近于仁者，志在入世，有担荷人类痛苦之意；钱锺书乃“明白之士”，属于智者，以高世之心，“观海之澜”^[3]。鲁迅之文，老辣精悍，有如汉廷老吏，定讞难翻；钱锺书之文，则句奇譬妙，有如东方正谏，时杂诙谐。二人性情与文风之别如此^[4]。

不过有时候，鲁、钱二人却也议论若合符契，居然有些“英雄所见略同”。以下姑举数事，以见其概。

二

首先是对金圣叹的批评。我们知道，金圣叹这位清初的文学怪才，在充满朴学空气的清代，除掉刘继庄、李渔等少数人外^[5]，并不受第一流人物的推崇，也难容其登大雅之堂。到了近代，他才时来运转，跟着白话小说一道走起红来，接受了当时不少大学者的褒扬。譬如林语堂，就把他封为“十七世纪的印象派批评大师”^[6]，流露的倾慕之言不一而足。又比如周作人，虽不曾赠此美谥，却也不止一次地贡其赞辞，在《小说》一文中说：“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7]又应林语堂之请作《谈金圣叹》，对金的文章亦极表欣赏^[8]。而胡适这位理性主义的大师，对金圣叹竟也十分倾倒。他一则说：“圣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9]一则说：“圣叹的辩才是无敌的，他的笔锋是最动人的。”^[10]关于金圣叹批《水浒》，则又说：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11]

到了晚年，他还念念不忘地提起，说《水浒传》是因为得到了“十七世纪文学怪杰金圣叹的大删削与细修改”，才成了“那部三百年人人欣赏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12]。把金称为“十七世纪文学怪杰”，似还不十分过分；后面又说：

杨定见百二十回本已是经过最后一百年的大文人仔细改削的绝好文字了。但金圣叹又大胆地删去了全书三分之一以上，削去了“征辽”、“田虎”、“王庆”的三大部分，真是有绝顶高明的文学见地的天才批评家的大本领，真使那部伟大的小说格外显出精彩！^[13]

“天才批评家”的徽号尚嫌不够，还要在前面添上“有绝顶高明的文学见地的”十一个字加以修饰！在胡适的意中，《水浒》之所以伟大，似乎全仗金圣叹的“大删削和细修改”。这种看法，鲁迅当然是大不以为然的。他对金氏的批评与以上诸人完全不同，准确说应该是大相反对。他不喜欢金的为人，对其小说评

点与删改也颇多指摘。例如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说金氏之七十一回本“惟于字句小有佳处”^[14]。而在《谈金圣叹》一文中，则有对金圣叹更为全面的批评：

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馀；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15]

又说：

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16]

不仅如此，鲁迅对林语堂等吹捧金圣叹也颇加挖苦，如在致郑振铎的信中就说：“语堂学圣叹一流之文，似日见陷没，然颇沾沾自喜，病亦难治也。”^[17]更可见其对林、胡等捧金的态度。

假如说鲁迅对金圣叹的批评夹杂了某些情绪，还不完全是就文论文，不属于纯粹的学术批评，那么，钱锺书的意见则冷静多了，不谓之正式的学术批评，是说不过去的。但他对金圣叹的评价，与鲁迅几乎完全一致。在《管锥编》中论《诗经·陟岵》时，引及金圣叹的《西厢记》批语，说他是：“小知间间，

颇可节取。”^[18]“节取”其说，却冠以“小知间间”（语见《庄子·齐物论》）的贬语，足窥钱锺书对金的整体评量。又论及金批《水浒》“鲁智深火烧瓦官寺”一回的“章法奇绝，从古未有”那一节时，云：

不知此“章法”开于《左传》，足征批尾家虽动言《水浒》“奄有邱明、太史之长”，而于眼前经史未尝细读也。^[19]

这分明是毫不掩饰地加以讪笑了。而于金圣叹之改窜《水浒》、《西厢》，说只是：“沿时弊而愈昌狂。”^[20]这些批评与前面所引胡适的话恰好相反，而与鲁迅的意见则恰相拍合。

三

其次是关于嵇康的批评。鲁迅对于嵇康的爱好，但看他费时下力去校《嵇康集》就可知道^[21]。在精校之外，鲁迅还撰写了《嵇康集序》、《嵇康集跋》、《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嵇康集考》等一系列考据文章。但鲁迅对于嵇康的评论却寥寥无几，其较为完整者，见于那篇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

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22]

这是就诗文方面而言的。关于为人性格和处事，则说：

大概是因为吃药（按：指嵇康）和吃酒（按：指阮籍）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吃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23]

因此：

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24]

这些批评牵涉到了阮籍。其实，历来批评嵇康的，往往都会带到阮籍。对此二人，轩轾每多不一。但大抵说来，右阮之说较占上风，这大概是从钟嵘以来形成的一个传统。《诗品》列阮于上品，归嵇入中品，历代无甚异议。其意虽主要在于论诗，但其实同时也论到人品的高下。如称阮籍“厥旨渊放”、“自致远大”，而批评嵇康“过为峻切，讦直露才”，就不全是就诗论诗。在后世诗文评中我们常碰得着相近之见。随手举几例：

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藻饰，想于文亦尔。如《养生

论》、《绝交书》类信笔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续。……
诗少涉矜持，更不如嗣宗。^[25]

嗣宗、叔夜并以放诞名，而阮之识，远非嵇比也。^[26]

阮公渊渊，犹不宣露，叔夜婞直，所触即形，集中诸篇，多抒感愤，召祸之故，乃亦缘兹。^[27]

说嵇诗“更不如嗣宗”，言外则嵇文也是“不如”。至于反对尊阮轻嵇之论，虽非绝无，但实鲜有。我所知道的唯叶梦得《石林诗话》中一节，有贬阮之语，以为阮籍为人不及嵇康。^[28] 论文则刘师培曾谓“嵇文长于辩难”，为阮所不及。^[29] 右阮左嵇的这种情形，还反映在两家集子所受的待遇上。早在六朝，就有颜延之、沈约两家替阮诗作注。自清代以还，于《阮嗣宗集》上化功夫的学者就更多，如顾景星、蒋师爚、黄节、华忱之、李志钧、陈伯君等，而《嵇中散集》相对而言则受冷落多了。除开鲁迅的校本外，就只有戴明扬一种。^[30] 这当然算得一个明显的对照。这个对照在当代通行的文学史里还见得出。但我们看钱锺书的对嵇康的评泊，则迥然与流俗不同，与其尊人钱基博氏的观点也相左，^[31] 而与鲁迅的意见再次拍合。《管锥编》中云：

嵇康《养生论》称“曾子衔哀，七日不饥”；欲成己说，不惜过信古书，亦通人之蔽耳。^[32]

这是指摘嵇康的，却称之为“通人”。“通人”在钱锺书一向是个不肯轻易许人的极高的赞辞，大抵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的“通人”意思相近。钱锺书极鄙薄经生、学者，而重文人、通人，此已为世所熟知，不烦细述。又于论范缜《神灭论》时云：

按精思明辨，解难如斧破竹，析义如锯攻木，王充、嵇康以后，始见斯人。^[33]

这是对嵇康文章的历史地位之衡定。置嵇于王、范二家之列，实前此所未有之评也。于此，鲁迅有知，想必是完全首肯的吧。比较嵇、阮，则谓：

阮、嵇齐名，论文阮似忝窃，当以诗挈长补短也。^[34]

比这更具体的是下面的一段议论：

阮籍《乐论》主乐“宜平和”，而讥世人“以哀为乐”，亦似嵇《论》（按：指《声无哀乐论》）。言“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然阮了无“析理”、“尽理”之功，故“解音”、“识音”不得望嵇项背，匪特让出一头地也。后世评弹之作，如黄道周《声无哀乐辩》、曹宗璠《驳〈声无哀乐

论》等，粗心易念，直蚍蜉之撼大树、螺赢螟蛉之侍大人而已。盖嵇体物研几，衡铢剖粒，思之慎而辨之明，前载得未曾有。^[35]

这里判断二人文章之高下，语气间大有不屑道阮之意；论嵇、阮处世之不同，则云：

嵇、阮皆号狂士，然阮乃避世之狂，所以免祸，嵇则忤世之狂，故以招祸。……避世阳狂，即属机变，迹似任真，心实饰伪，甘遭讪笑，求免疑猜。……忤世之狂，则狂狷、狂傲，称心而言，率性而行，如梵志之翻着袜然，宁刺人眼，且适己脚。^[36]

这与鲁迅论二人饮酒、服药一段，可谓笙磬同音，大可相互发明。其下复申之：

《与山巨源绝交书》云：“阮嗣宗口不议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明知故犯，当缘忍俊不禁。夫疾恶直言，遇事便发，与口不议人过，立身本末大异，正忤世取罪之别于避世远害也。阮《答伏羲书》河汉大言，不着边际，较之嵇之《与山巨源书》，一狂而浮泛，一狂而刺切，相形可以见为人焉。^[37]

议论精辟透彻，我们把来和鲁迅的意见比较，就发现其间虽有精粗浅深之不同，但二者之倾向却完全是一致的。鲁迅的话我们不妨看作钱的具体而微。顺便提一下戴明扬的校注。戴于嵇康集亦用功极深，但鲁迅以为其校取舍不当。曾在与台静农的信中说：“戴君今校，亦常为旧校所蔽，弃原钞佳字不录。”^[38]而钱在《管锥编》中也说：“近人《嵇康集校注》引焦循说‘略’通‘了’，复以‘了’通‘戾’，失之”^[39]。这个小批评似可看作是对鲁迅意见的一个小印证。

四

鲁迅所长主要不在学术，尽管在学术上确也戛戛独造、独树一帜；他一生最感兴趣的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解剖和批判。钱锺书的兴趣则主要在学术，不过，在沉酣学术的馀暇，他也常会将目光投向人间，并顺手把人世的虚伪搦上几个窟窿。比如在论释老相攻时，揭露二氏“以异己为附庸”的惯技，云：

教宗相鬭，于强有力而争难胜者，每不攻为异端，而引为别支，以包容为兼并（annexation）。^[40]

在论宋释契嵩攻韩愈时，作更进一步分析说：

盖辟佛而名高望重者，如泰山之难摇、大树之徒撼，则释子往往不挥之为仇，而反引以为友；巧言曲解，称其于佛说貌离而神合、心是而口非焉。纪德尝谓：虔信天主教者论文有术，于欲吞并而不能之作家则抹杀之，于欲抹杀而不得之作家则吞并之。……此术用途至广，固非佛教及天主教所得而专，亦不仅施于谈艺，勿待言矣。^[41]

最后一句，真是意味深长，言外有无穷感慨在。^[42]这种对世态人心的揭露和文化批判，在鲁迅的文章中俯拾即是。如《这个与那个·捧与挖》里就有：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43]

或者如《我的“籍”和“系”》所说：

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提高。^[44]

“压下去”、“压服”即是“抹杀”，“捧起来”、“提高”略等“吞并”。二人之意，若合符契！所不同者，鲁迅意在论世，而钱本论文，顺笔及之耳。

这些意见外，二人一致之处，当然还有不少。比如二人皆

深喜李长吉，皆极轻章士钊，皆曾讥扬雄以“蠢迪检柙”代“动由规矩”，以为是以艰深文浅易，皆认为《飞燕外传》笔致绝类唐人传奇^[45]，等等。限于篇幅，姑勿细论。

所有这些，已足够说明钱、鲁二人识见之确乎相通，非出我的穿凿附会，以上所述不过是稍通骑驿而已。而此种相通的背面原因，当然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不过这里不能展开，我姑且简单列举三点。第一，在金圣叹评价问题上，钱、鲁二人所以意见一致，不同于胡适、林语堂、周作人等人无保留的推崇，是因为钱、鲁二人皆为杰出的小说家，于文学尤其小说的领会，较之其他三人要深刻得多，故不很同意金圣叹的颇有浅薄之嫌的评点，而往往更宁愿去指出其不足处。第二，关于钱、鲁二人都喜欢嵇康，则似乎表现了他们性格上的某些相似，即为人的率直与狷介。有学者以为钱、鲁二人文章都曾受到魏晋文章的影响^[46]，其说未必可据^[47]，但可以说明二人喜欢魏晋是有据可查的。文章的喜好流露了他们性情的相近，反过来似乎也可以说，就是性情的相近决定了他们文章喜好上的一致。第三，钱锺书曾在《中国诗与中国画》里说，他的兴趣在“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47]，但此文后来收入《七缀集》，这句却删去了。从这件事似乎可以推见，晚年的钱锺书为学宗旨有了自觉改变，不欲再以文艺批评或文学自囿了。而他在批判人性、社会之际，却又与鲁迅不期而相一致，这就颇值得我们玩味深思。至于钱、鲁迥异之处，我当然也并未忘记，因为我所谓的相通，正建立在相异之上，假如没有相异，也就没有

相通，有的不过是令人感到索然寡味的雷同罢了。

五

最后该提一下钱锺书对鲁迅的看法。钱锺书与鲁迅终生不曾相见，因此，鲁、钱二人相互间的“对面批评”，也就无从说起。但幸好钱锺书对鲁迅的“单面批评”，我们还能看到，尽管少之又少，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钱锺书平生语及鲁迅，就我寡陋所知，见诸文字记载的，屈指可数。在《中国新文学源流》的书评中，钱说：“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的文学都是遵命的。”^[48]这里全无态度，可以不论。水晶《两晤钱锺书先生》记钱答语：

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他只适宜写 short-winded “短气”的文章，不适宜写“长气” long-winded 的文章，像是《阿Q》便显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 curtailed 才好。^[49]

钱在水晶的追问下评鲁，表面看似乎尚公允持平，实际上却是皮里阳秋。因为这“短气” short-winded 一词，原有贬义。在另外一个场合，钱说：“西洋文评偶然用气息，只是极粗浅带遣责性的形容词，不是单独中立的名词。譬如说气促的文章

(short-winded style)。”^[50]这是论文。又据李锐《黎澍十年祭》所记，钱在谈到胡适时，说“鲁迅那样批胡骂胡，且狠挖苦，但鲁迅生前，胡适从来没有讲过鲁迅半个不字”^[51]。这里是赞许胡的为人，但语间涉及鲁迅之处，却是颇致微辞。这是论人。最后是他的《“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讨论会开幕词》，称“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越多”^[52]，这是官样文章，不得已的应酬敷衍，也许作不得准。

（原刊《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注释

[1] 见刘衍文：《钱周之争平议》，冯芝祥编《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2] 黄维樑：《蕴藉者和浮慧者——中国现代小说的两大技巧模式》，见《钱锺书研究》第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3] 刘邵《人物志·九征》有“明白之士，达动之机”、“玄虑之人，识静之原”的话，实即仁智之别，此借用之。

[4] 又徐梵澄目鲁迅似老子，司马长风目钱锺书似庄子，捉置一处，亦一谈助。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我去拜访，值午睡方起，那时神寒气静，诚有如庄子所说‘老聃新沐，方将披发而干，熟然似非人’。”见《徐梵澄文集》第四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7页。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第二十七

章：“钱锺书狂在才气，汪洋恣肆，酷似古代的庄生。”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165页。

[5] 全祖望《刘继庄传》谓刘“生平极口许可金圣叹”，见《鮚埼亭集》卷二十八，《四部丛刊》本；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填词馀论》则称“读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又谓“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馀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见《李渔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

[6]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见《林语堂经典名著》第三册，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其他参看《论文·金圣叹代答白璧德》、《论语录体之用》、《金圣叹之生理学》诸文，见林语堂《我的话》下册《披荆集》，上海时代书局1944年版，第6—7页、第50页、第132页。

[7] 周作人：《书房一角》，艺文社1944年版，第13页。

[8] 见《苦竹杂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第16—17页。

[9] 胡适：《〈水浒传〉考证》，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页。

[10] 胡适：《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见《胡适文集》第四册，第365页。

[11] 胡适：《〈水浒传〉考证》，《胡适文集》第二册，第374页。

[12] 胡适：《与苏雪林、高阳书》（1961.1.17），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4页。

[13] 同上。

[14] 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15] 见《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27页。

[16] 同上。

[17] 鲁迅：《与郑振铎书》（1934.6.21），同上，第十二卷，第466页。

[18] 《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4页。

[19] 《管锥编》第一册，第212页。

[20] 《管锥编》第三册，第1069页。又参观《容安馆札记》第三十五则：“胡适之并不知袁中郎《觴政》，宜其以金圣叹之评《水浒》、《西厢》为卓识创论矣。”见《钱锺书手稿集》第一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5页。

[21] 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9页；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55页。

[22] 见《而已集》，《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11页。

[23] 同上书，第510—511页。

[24] 同上书，第512页。

[25]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9页。

[26]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页。

[27]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清乾隆十三年序刊本。

[28] 见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4页；明张燧曾袭取其意，见《千百年眼》卷六“阮籍巧附司马昭”条，上海进步书局。

[29]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见舒芜点校《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页。

[30] 叶渭清亦有校记，发表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五、九卷，1930—1935年，但未成书。

[31] 见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康正名辩物，颇核持论，而气

不齐，采不遑，意思安闲，只是以质率妙造自然；而不同阮籍之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而《三国志》本传谓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好言老庄，则有之矣；壮丽尚奇，窃未见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1页）这个见解与前引王世贞的话大致相近。

[32] 《管锥编》第一册，第239页。

[33] 《管锥编》第四册，第1421页。

[34] 《管锥编》第三册，第1083页。

[35] 《管锥编》第三册，第1087—1088页。

[36] 《管锥编》第三册，第1088—1089页。

[37] 《管锥编》第三册，第1090页。

[38] 鲁迅：《致台静农书》（1935.9.20），见《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19页。

[39] 《管锥编》第五册，第55页。

[40] 《管锥编》第四册，第1385—1386页。

[41] 《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3—384页。

[42] 这些话的意思早于《宋代的诗话》中说过：“诗人在批评的时候，碰见跟自己风格不同的东西，往往一笔抹煞，假如不能或不敢抹煞，准会把它的风格说成跟自己的类似。”见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86页。

[43] 见《华盖集》，《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40页。

[44] 同上，第82—83页。

[45] 见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谓鲁迅“所最好的是李长吉”，见《徐梵澄文集》第四卷，第381页；周作人则谓鲁迅于韵文所喜爱的除《离骚》外，“唐朝有李长吉”，见《鲁迅的青年时代》，第67页；钱之喜贺，读《谈艺录》第44—60页，即可自明。鲁迅之轻章

士刳，世所熟知，勿待烦引；钱之轻章，见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所引钱与吴书：“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编。吾老不好学，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弟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与多闻后生竟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胡适妄言唱于前，先君妄语和于后，推重失实，流布丹青，章亦居之勿疑。”所谓“胡适妄言”，指胡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所谓“先君妄语”，指《现代中国文学史》下编新文学（二）逻辑文一节。鲁迅讥讽扬雄，见《作文秘诀》：“我们的古之文学大师，就常常玩着这一手。……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就是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第612页）钱之讥扬，见王水照《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锺书先生》，“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例，扬雄亦其一（《鳞爪文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论《飞燕外传》，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9页）；《管锥编》第三册，第965页。

[46] 见胡河清《真精神、旧途径——钱锺书的人文思想》第六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7] 见《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48] 见《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49] 见沉冰编《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锺书在一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50] 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见《钱锺书散文》，第403页。

[51] 见《李锐诗文选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381页。

[52] 见《文学报》1986年10月23日。

武王《几铭》“口”非阙文证补

明钟惺、谭元春辑《古诗归》卷一周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钟惺评云：“读‘口戕口’三字，悚然骨惊，觉《金人铭》反饶舌。”谭元春评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皇皇’二字，郑重异常。”^[1]自晚明以来，钟、谭此书常遭到学者非议，这两条批语尤为“暴谑之资”，而铭中“口”字的是非，则为数百年来一公案。

清初周亮工于此大加讥评，其《因树屋书影》卷二云：“古逸书如《穆天子传》、《汲冢周书》类，凡阙字类作口。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阙文也。钟、谭目‘口’为‘口’字，友夏云：‘四口字叠出妙语，不以为纤。’伯敬云：‘读口戕口三字，悚然骨惊。’不知《几铭》与四口字何涉！可发一噓。”^[2]又其《与林铁崖》云：“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笔遂不顾所安耳。他且勿论，即如《穆天子传》、《汲冢周书》，凡缺类作口；武王《几铭》‘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缺文也。两君目‘口’为‘口’字……不知《几铭》

与四‘口’字何涉，岂三代时便学作钟、谭诗耶？即此已可笑，何况其他？”^[3]文字与前略同，口气则更加轻蔑。

近人大抵视周说为定论，即为钟、谭诗学作持平论者，亦认此为无可辩解之讹谬^[4]。有人论及明代的唐诗选本，也特地引及周亮工对《诗归》的这个批评，用以说明“明代学风空疏，且好以己意改窜古书”，说：“竟不知‘口’为阙文符号，读为口字，鲁莽灭裂，可见一斑。”^[5]明人学风空疏，自是无可讳辩，好以己意改窜古书，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此处所说的妄改，却并非不可翻的定讞，确切说来，错的还不是钟、谭，恰相反，正是以纠错自居的周亮工。

钱锺书先生于此有详确考辨。其《管锥编》历引清代学者之说，驳之云：“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诗归》评周武王《几铭》，以为四“口”字叠出妙语，周亮工、钱陆灿皆辨其谬。近见宋板《大戴礼》，乃吾邑秦景暘阅本，是“口”字，并非方空圈’；严元照《蕙橈杂记》：‘几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周盖未尝读《礼》。“口生听”作“口口生听”，则误也’；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八《再跋〈因树屋书影〉》：‘编录金石文字，遇有缺文，则以方空代之，而经、传不闻有此也。武王《几铭》载在《大戴礼·武王践祚》篇，历代相传；乃指数“口”字为缺文，可乎？’足息三尺喙矣。”^[6]据此可知，钱先生不以周、钱的非笑为然，而同意王、严、张三家之辩，其态度与措语，都是十分明确、毫不含糊的。

近人王欣夫亦有辩证，其说较钱先生为早，而所辩说则可

比观。王氏于其《文献学讲义》第四章第一节，论及“阙文和穿凿”，即引《诗归》“口”为阙文为例。王氏亦不以周说为是，不过未下明确断语，其于引王应奎《柳南随笔》驳周说后，复引卢辩《大戴礼记》注：“听，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又：“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而加以甚为谨慎之申说：“倘使这口形真是阙文而不是口字，那么，穿凿的应该是卢辩。在没有北周以前写本发现，没有可信的证据时，宁可保留它的原状。”^[7]又谓：“钟谭是文学家，他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认为是口字，而且这口字用得非常之妙。明人虽好窜改古书，也不能不问情由，硬加在他们头上。”^[8]这个说法似乎稍欠明清，但以《诗归》所录之铭，并非钟、谭“妄改”，则其为钟、谭辩，也是颇为明显的。

从王、钱二家考辨看，自不可再以钟、谭为“妄改”，而近人仍沿周亮工之误，其故当是未读王、钱之书。不过，细究王欣夫的辨说，此一问题仍有些许疑问，有待作进一步的考辨分疏。王欣夫于引王应奎《柳南随笔》后说：“王应奎所据是宋版，宋版本来不是完全正确的，何况口之于口，凡是刻板多容易互混。……王应奎只看见下面的注，不能提出更有力的证据也是读书的疏忽。不过铭的是几，而内容却强调了口，好像没有多大联系，虽则卢注补充了说：‘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这句话兜了一个圈子，究竟是不是正确？还有研究的馀地。”^[9]据此，王氏虽不以作“口”为钟、谭“妄改”，因为其文实自北魏卢辩注始；而王应奎之所谓“宋版作口”，亦

无作为版本证据的价值，宋版并非绝对无误，所以未必即为铁证；且口之于口，刻板多易互混，辨识也未必可保绝对真确。而其最主要之疑问，则为：“几铭”与“口”之间，缺少直接必然的联系。他认为卢辩注的那个解说，尚嫌迂回牵强，不足以弥“几”、“口”之罅缝。

钱先生的解释足祛王氏之惑。钱先生同样亦引卢注，辨析云：“按几固如严元照说，乃人君出令所依，故‘口’即言语；顾古人食虽据案，而《说文》曰：‘案，几之属’，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一一《几席考》谓后世以椅代古之席，以桌代古之几。《全后汉文》卷五〇李尤《几铭》云：‘昔帝轩辕，仁智恭恕，恐事之有缺，作倚几之法’，盖即《国语·楚语》上所谓‘倚几诵训’，故‘口’乃口舌之‘口’；又云：‘殽仁饭义，枕典席文，道可醉饱，何必清醇！’，则‘几’正同案，可据饮食，‘口’复为口腹之‘口’。口腹之‘口’，则‘生啗’者，‘饮食之人，人皆贱之’也，而‘戕口’者，‘病从口入’、‘烂肠之食’也。《易·颐》：‘慎言语，节饮食’，足以移笈‘口戕口’之两义兼涵矣。”^[10]揭橥“几”“口”之义，至为浹洽。钱先生的这个阐释，重点不在版本考索，而在义理的圆通无碍，这恰可以释王氏之惑。据钱先生所说，“几”与“口”之联系，厥有两点：一，“几”乃“倚几”之“几”，古人“倚几诵训”，其事与“口”相关，故“铭几”以慎“言语”；二，“几”又为“案”，“案”为古人据以饮食之具，故“口”又指“口腹”之“口”，诫“口”即是节“口腹之欲”。

如是，“几”、“口”之间，就不是缺少关联，而相反，正是严丝合缝、语义双关！

据以上的考述，《几铭》之“口”非阙文，当可以论定，不必再节外生枝了。但若于其首尾详加覆按，则知其间仍有待补之疏漏，而钱先生之所考，间亦有误。这一待补之疏漏，主要表现在版本上，即：《几铭》出《大戴礼记》，而严元照、张宗泰、王欣夫诸家，却不从《大戴礼记》版本作考，这是颇令人不解的。钱先生引张宗泰云：金石文字遇阙文，始用方空圈代之，儒家经传则不用此。而《几铭》载于《大戴礼记》，历代相传，并非金石或出土文献，故不必使用方空。这一判断自是正确的。但也甚难证实，因“说有易、说无难”，儒家经传从不用方空，实无证据证明。并且，张宗泰之说，又与王应奎凿枘不合。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一：“近予见宋板《大戴礼》，乃秦景暘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11]既云“宋板作口”，言下之意，则《大戴礼》当日之通行本，“口戕口”皆确作“口戕口”，不然，通行本若俱作“口”，王应奎也就不必远引“宋板”，只须径称“《大戴礼》正作‘口’字”，便可驳倒周亮工而雪钟谭之冤了。而王欣夫又继其后，以“宋版不尽可据”，持蓄疑待考之论，俨然一似《大戴礼记》真有“口”作阙文之事。而一考《大戴礼记》之版本源流，就知实从未有过“口”为阙文之说，有之，则自周亮工讥讪《诗归》始。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知明代《大戴礼记》通行本，十之九俱附卢注，白文本实极罕见^[12]。而卢注又为今传宋以前唯

一之旧注。其传本可考之最早者，为宋淳熙年间韩元吉刻本，元明刊本大都据其覆刊或重刊。其中通行于世影响最大的，则为明嘉靖十二年（1533）袁氏嘉趣堂刻本（《四部丛刊》据以影印）和万历程荣刻《汉魏丛书》本^[13]。据此两明本《大戴礼记》卷六《武王践祚》引《机铭》：“口生啗。卢注：‘啗，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啗，詈也。’口戕口。卢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14]知卢辩于作注时，所见之本，必非“口”作阙文；如卢辩所见“口”作阙文，则注必不云“口能害口”，“以言语为戒”；因卢辩之注，与阙文之间，实无任何关联也。由此更可推知，当日卢辩注《大戴礼记》时，所参考罗列诸本中，亦当无一“口”作阙文者，揆诸古人注书通例，经有异文，则注者必有所说。

又考清人专治《大戴礼记》者，有名于世者凡十数家，若戴震、孔广森、汪照、汪中、王聘珍、孙诒让等，其治学均以谨严不苟称，而其校注概未提及阙文之说。即以戴震校本言之，其所参校之本极为广泛^[15]，而其校语于“口生啗，口戕口”下，未列任何异文^[16]。又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六于“口生啗”后注云：“啗，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啗，啗詈也。注‘啗’有两训，疑记文本作‘啗生啗’，故卢意谓君有啗耻之言，则致人之啗詈也。王本‘敬’下多‘口口生敬’四字，恐后人所加。”^[17]“啗，耻也”后为卢辩原注，“注啗有两训”后为孔氏补注。其于“口戕口”后，则仅录卢注“言口能害口也。

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亦无任何校补。汪中《大戴礼记正误》校云：“口生诟，注可不慎乎。喜孙案：卢注此本各本有‘诟，诟詈也’四字，先君校去，与戴校聚珍本合。”^[18]于“口戕口”下，亦未出校。故知此处并无异文。汪照《大戴礼注补》卷六“口生诟”注：“原注：‘诟，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诟，案别本又有‘诟，诟詈也’句，一注两释，疑后人所加。”又“口戕口”注：“原注：‘言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集解：《太公金匮》：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戒，随之以身。几之书曰：安无忘危，存无忘亡。孰惟二者，必后无凶。照补：《书·大禹谟》：唯口出好兴戎。《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傅元《口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19]引《书》、《鬼谷子》、《口铭》等，以笺“口戕口”，亦未尝言其有异文。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六“口生诟，口戕口”注：“《少仪》曰：‘言语之美，穆穆皇皇。’诟，谓诟病羞辱也。《书》曰：‘惟口起羞。’戕，害也。《大学》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卢注云：‘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20]亦不及“口”为阙文之说。晚清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卷中“皇皇惟敬，口生诟”校云：“孔云：‘王本“敬”下多“口口生敬”四字。’严校云：‘《续笔》引亦有“口口生敬”四字。’案：洪、王本是也。此读‘皇皇惟敬口’五字句，‘口生敬’、‘口生诟’，皆三字句。诟与诟声同字通，言惟敬慎其口，慎则见敬，不慎则招诟辱也。”^[21]并皆不及“口”作阙文。

据此，则不难推知，清代治《大戴礼记》诸家，于武王《几铭》未尝睹“口”作阙文者，若其见有作阙文者，校注中必当有所说明。又揆之清人治经之法，诸家治《大戴礼记》，于版本亦必竭力搜求，而据此六家之所目睹，竟未有一本作阙文者，则谓传世之《大戴礼记》“口生聃，口戕口”固未尝有异文，当亦不中不远。细按周亮工所云，谓“古逸书如《穆天子传》、《汲冢周书》类，凡阙字类作口。武王《几铭》云云，不知《几铭》与四口字何涉”，则其意中实亦视《几铭》为古逸书，与《穆天子传》、《汲冢周书》等类齐观。据此，则又不难推知，周亮工本不知《几铭》出《大戴礼记》，为自汉以来传而未绝的经书，与《汲冢周书》等佚而复出者，原不可同年而语，徒以其为武王之铭，遂望文生义而生臆说，误以“口”为古逸书之方空。所以，周亮工的这个说法，虽其流传甚为广泛，但清代治《大戴礼记》的经师，却绝不引之以为据。

迨至晚清，又有俞樾、叶大庄二家，据孔广森疑“口生聃”作“聃生聃”，提出“口”为“口”、二“口”皆为“聃”之说。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五“阙字作空围而致误例”条云：“校书遇有阙字，不敢臆补，乃作口以识之，亦阙疑之意也。乃传写有因此致误者。《大戴记》‘武王践祚’篇：‘机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聃，口戕口。’卢注曰：‘聃，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聃，聃罍也。’孔氏广森补注曰：‘疑记文本作“聃生聃”，故卢意谓君有聃耻之言，则致人之聃罍也。’按此说是也。惟其由聃生聃，故谓之‘口戕口’。今作‘口生聃’，盖传写夺

‘哢’字，校者作空围以记之，则为‘口生哢’，遂误作‘口生哢’矣。”^[22]按俞氏治经多勇改，此一据注疑经之说，较孔广森更进一步，疑“口生哢”之“口”，本为“哢”，传写夺去而代以空围，但此与周亮工说，仍有本质区别：俞氏只以“口生哢”之“口”为阙文，而周亮工则以四“口”字皆为阙文。更为重要的是，俞氏疑传世之本“口”为空围，则其实已承认传世之本作“口”，其作空围者，疑不知佚于何时耳；周亮工则以传世之本本作空围，钟、谭二人不学无知，故妄改为“口”。盖亦以此故，俞氏虽于经有所疑，但并不引周氏为说，即不以周氏为是。而考俞氏之所疑，其于理实亦欠通，因卢注紧接经文之后，经文中夺去“哢”字，后人可以据注疑经，前人岂不可据注校经。若经文之“哢”漫漶难辨，校者可据其下注文“哢，耻也”，容易辨出经中“哢”字，而不致以空围代之。俞氏又著有《大戴礼记平议》，不用《举例》“口”为阙文之说，当以《举例》为举例以明理，可以得鱼忘筌，所重不在具体所举之例；而《平议》为解经之书，当谨严不苟，大胆假设之说，固当在摈弃之列。

又叶大庄《大戴礼记审议》卷一：“口生哢，口戕口。大庄案：孔氏补注：‘哢有两训，疑记文本作‘哢生哢’，故卢意谓君有哢耻之言，则致人之哢詈也。’若依孔说作‘哢生哢’，上哢训耻，下哢训詈，犹言‘耻生詈’，殊觉无义。此记本作‘口生哢，哢戕口’，上哢训耻，下哢训詈，上下相承，文同义异，古书多有此例。故卢注有两训，是其明证。‘哢，哢詈也’四字，疑本在

下文‘口能害口也’之上。‘口能’之‘口’亦疑作‘喏’。盖缘记文‘喏’字脱省为‘口’，遂以‘喏、喏詈也’四字与‘口戕口’意不相属，因移置于上文注末，而又改注中‘喏’字作口，以应‘口戕口’之义，不然卢君作注，何以有此四字，固为横分两义耶。汪氏《大戴正误》校去此四字，非也。今试重次之云：‘口生喏。注：“喏，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喏戕口。注：“喏，喏詈也。言喏能害口也。机者，人君之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如此则经注均无碍矣。”^[23]叶氏不以经学名家，其所假说推论，亦据孔广森《补注》而来。其与俞樾不同之处，则在俞所疑在“口生喏”，而叶氏所疑在“口戕口”，而仍只疑及一“口”字，与周亮工之说固区以别。至其移上文注入下文，实难逃蹈空轻率之讥，当不为乾嘉经师所许。

总之之说，即令俞、叶二家假说近是，而二家亦未有版本为据，又诸家校语概未著异文，是则《机铭》从未有“口”为阙文之说，则可大致论定。据此从可推知，上文所引严元照、张宗泰云云，谓周亮工未尝读《礼》，徒凭臆说而致讥钟、谭，可为事实。又据王应奎“宋板”云云，王欣夫“宋板亦不足据”云云，其所疑问，至此亦不复有意义，而钱先生所谓“足息三尺喙”者，则确可视为此案定讞。

钱先生考辨偶疏处，顺笔纠正。《管锥编》引《蕙棊杂记》谓：“几固如严元照说，乃人君出令所依，故口即言语”云云。不知此并非严元照语，而为严元照所引卢辩《大戴礼注》注文。

严氏《蕙榜杂记》原文较长，为便比勘，具引如后：“周亮工《因书屋书影》云云，……予按《大戴礼·武王践祚篇》：‘机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哂，口戕口。’卢景宣（辩）注‘口生哂’曰：‘哂，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又注‘口戕口’曰：‘口能害口也。机者，人君出令所依，故以言语为戒也。’周盖未曾读礼，强改古先王成语为阙文，而大书深刻，可称大胆。（‘口生哂’作‘口口生哂’，此则误也。）”^[24] 据此，知钱先生致误之由，是因笔记删节过多，于临文考辨之际，又未覆案《蕙榜杂记》，且又未检《大戴礼记》卢辩注，致误断严引卢注起迄。

《管锥编》又云：“武王器物诸铭，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五《题太公〈丹书〉后》始标举之，洪迈《容斋续笔》卷九继之。”^[25] 云云。按洪迈《容斋续笔》卷九“太公丹书”条云：“太公丹书今罕见于世，黄鲁直于礼书得其诸铭而书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读《大戴礼·武王践祚篇》，载之甚备，故悉纪录遗好古君子。”^[26] 又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云：“山谷以太公所诵丹书及武王铭，书于坐之左右，以为息黥补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写《武王践祚》一篇，以为左右观省之戒。”^[27] 据此，知钱先生之所云，亦本诸洪、王。或谓山谷标举《机铭》，其事至钱锺书始为考出^[28]，亦未为探本之论。又王书似亦本洪氏，王年代晚于洪，王生时洪已死二十年，疑王读洪书而著此条，钱先生不引王书，当以王晚于洪故。翁元圻注《困学纪闻》，未引洪书明其朔^[29]，后来张嘉禄撰《困学纪闻补注》，

此处亦无增注^[30]，是并当补引以纠其疏漏。

（原刊《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

注释

[1]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闵氏刻本，集部第1589册。又，明万历刻本“啗”作“垢”，后引周亮工《与林铁崖书》亦引作“垢”，所见当即万历本。

[2]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康熙六年刻本，子部第1134册。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校点本，第43—44页作：“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标点不妥。又“戕”作“啗”，误；“口生啗”作“口生垢”，则是周氏所据或为万历刻本。

[3] 见《赖古堂集》卷二十，《清人别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4] 王恺：《关于钟、谭〈诗归〉的得失及其评价》，《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5] 陶敏、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科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35—136页。

[6] 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55页。又《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一册引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后按云：“钟、谭《古诗归》卷一‘毛骨悚然’之评，数百年来笑柄，不图得鲁岩此说为张目也。”（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70页）

- [7]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86 页。
- [8] 同上。
- [9] 同上，第 285—286 页。
- [10] 《管锥编》，第 856 页。
- [11] 王彬、严英俊点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1 页。
- [12]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6—209 页。
- [13] 黄怀信：《〈大戴礼记〉传本源流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 年第 1 期。
- [14] 《四部丛刊》影印明袁氏嘉趣堂刊本，又明万历程荣刻《汉魏丛书》本。
- [15] 据其校语所及，有元至正刘庭榦本、明朱养纯本、沈廷芳《五礼经传目》本、袁氏嘉趣楼本、程荣《汉魏丛书》本、朱轼句读本、方苞评点本、傅崧卿《夏小正戴氏传》本、杨简《先圣大训》本等。
- [16]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 [17] 《彙轩孔氏所著书》本。
- [18] 《江都汪氏丛书》本。
- [19] 《清经解续编》，上海书店 1988 年影印本，第 3 册。
- [20] 王文锦点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05 页。
- [21] 雪克点校，齐鲁书社 1988 年版，第 214 页。
- [22] 《春在堂全书》本。
- [23] 清玉屏山庄刻本。
- [24] 清光绪十一年（1885）新阳赵氏刻本，又赵诒琛辑《峭帆楼丛书》本。钱氏所引颇有删节。
- [25] 《管锥编》，第 855 页。

[26]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3 页。

[27] 《四部丛刊三编》本。

[28] 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29]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道光五年翁氏守福堂刻本，子部第 1142 册。

[30] 《四明丛书》本。

后记

这个集子里所收的，是我近十几年所写、关于钱锺书的文字，它们十之六七，曾发表于一些刊物。高山杉、周运两位先生见到了，表示感兴趣，让黄晓峰先生转告我，说愿意收入他们的“六合丛书”。我平时杜门不出，于当代学人，认识的很少，周、高二位，也是素昧平生，对他们的欣赏，我感到意外地欣喜。所以这个集子的出版，首先要感谢他们。当年不嫌支离琐碎，愿意刊发它们的朋友，如俞国林、陆灏、黄晓峰诸位，追根寻源，也该致以谢意。

此外应该说明，趁这次編集，我把个别篇的文字，又作了少量修改；较多的情况，则是增补了新材料，附于各篇之后。这也是钱先生的老例，我“佞钱”多年，不免“东施之效”。

我读钱著的第一本书，是中华书局的《谈艺录》，那是1989年夏天买的。转眼之间，二十三年过去了，买书的那个下午，犹历历可记，而我却已渐入中年，二毛见于两鬓，不复是那个时空中的人了。钱先生五十馀岁时，读了赵秉文《除夜》

诗，还发感慨说：“十年前教授清华，读《全金诗》至此首，批曰：‘余明年四十三矣，讽之感不绝心。’今年五十二，更何以堪！”（《容安馆札记》第七百十九则）我现在的年岁，恰是钱先生所回首的十年前，于时光之“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自也不能“风幡不动”；不过，我更多的是愧悔，因为十几年来，忙于糊口之计，加上生性的疏懒，于读书问学，进境殊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希望从今以往，能持坚楫，抵挡住世间诱惑，专心“读圣贤书”。如此，庶几不过于不学，而为通人所笑；——钱先生笑桐城人：“舍姚姜坞外，莫非陋儒。”姑书于此，以为他日之券。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钱边缀琐

作者=王培军著

页数=253

SS号=13488846

DX号=

出版日期=2013.12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围城》中两个妙喻的来历

钱锺书小说里的几个典故

《也是集》的书名及其他

随手札

寒食帖考

庾信愁赋考

读钱偶笺

读《管锥编》札记

读《槐聚诗存》

钱边缀琐

钱锺书与钱穆、陈寅恪

钱锺书与余嘉锡的“撞车”

钱锺书与吕思勉

钱锺书与鲁迅

武王《几铭》“口”非阙文证补

后记